



双月刊 单月1日出版
2020年 第4期 总第193期

黄埔人生

52 黄埔老兵陈生华 / 张丽琴 蒲元

我的黄埔前辈

- 57 百年心迹证丹砂 斗雪寒梅耐岁华
——读祖父甘棠诗词旧作有感 / 甘小晶
- 61 我听父亲讲抗战 / 王大高

历史

口述历史

68 终生报效我的祖国 世代传承我的黄埔 / 欧阳纪声

黄埔往事

76 体现“亲爱精诚”校训的三件往事 / 张子忠口述 张治平整理

黄埔研究

78 叶剑英的港澳情 / 吴跃农

黄埔收藏

83 浅谈黄埔军校卫生与营养 / 单补生

黄埔日历

93 1926年3月24日，李济深前来黄埔军校参观 / 贾晓明



4 成都分校



34 他们为黄埔前辈画像



47 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



76 体现“亲爱精诚”校训的三件往事



黄埔军校 分校概览

黄埔军校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新型军事政治院校，被誉为世界四大著名军校之一。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谱写了壮丽篇章，受到亿万同胞的共同景仰，成为一代代中国人引以为荣、肃然起敬的金牌军校。

在黄埔军校的发展历程中，基于形势发展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先后开办了多所分校。分校的发展历程，一般根据黄埔军校本校校址变迁分为三个时期，即黄埔时期（1924年5月至1928年初）、南京时期（1928年3月至1937年7月）、成都时期（1937年8月至1949年12月）。在黄埔时期，黄埔军校先后开办了潮州分校、南宁分校、武汉分校、长沙分校。在南京时期，先后设有南宁、广州、南昌、武汉、洛阳、成都、昆明七所分校。在成都时期，适逢抗日战争期间，分校迁徙频繁，改为用序号表示，共设有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分校。这些分校培训了大批学生、学员，其数量大大超过黄埔军校本校。与本校一样，分校培训出来的学生、学员奔赴东征、北伐和抗日战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但由于种种原因，关于黄埔军校分校的专著、史料汇编等较少。为满足广大读者了解黄埔军校分校情况的愿望，本刊与黄埔军校同学会研究室合作，在特别策划栏目刊登黄埔军校各分校史料，展示黄埔军校分校发展历程和概貌，为今后全面、系统、深入研究黄埔军校分校历史奠定基础，为读者深入了解黄埔军校分校提供平台。



成都分校

成都分校开办于1935年秋，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嗣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由南京西迁成都，而被并入校本部。成都分校历史虽不长，但在黄埔军校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一、历史沿革

成都分校的开办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1934年秋，川军将领刘湘赴南京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中央政府支持刘湘统一四川军政，并向川军补助饷款械弹；刘湘则同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指导监督军务。1934年12月19日，蒋介石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参谋团正副主任，率参谋团一行200余人启程入川。1935年1月12日，参谋团抵达重庆。

为了控制和削弱川军，蒋介石让参谋团着手整顿。首先是缩编，各军师一律按现额缩减1/3，军费一律减发1/3，由此川军各军确立了新编制。1935年8月整编之后，又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兼团长。川军营长以上军官多被调训，训练中要求各级军官“拥护领袖，复

兴民族，忠党爱国”；蒋介石还亲自找旅长以上军官谈话，以示慰勉。同时，为了安置编余军官和局势发展需要，于是年10月，令李明灏在成都北校场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简称“成都分校”）。正如顾祝同在《成都分校同学录》序中描述的，“去岁，委员长蒋公，欲使我西陲各省军官，宏其造就，乃设分校于成都……四川夙称天府，国人视为民族复兴根据地，黔中亦多豪杰之士，诸君学成致用，无论戮力疆场，或运筹帷幄，其必大有造于党国也无疑”。

成都分校校本部设于北校场。《四川通志·城池》记载：成都城墙“高三丈，厚一丈八尺，周二十二里三分，计四千一十四丈，东西相距九里三分，垛口五千五百三十八，镗楼四，堆房十一，门四”。明清时代，成都城内有东、南、西、北四个校场。校场本是校射演武之所，乡试武闹设此，亦驻军队，供驻军演武操练之需。北校场较其他三个地位更重要，位于成都今青羊区内，原西、北两边靠城墙，东接洛阳路北口，南接江汉路和昆明路北口。沿城边约30米处有

护城河，再外延百米则是锦江支流（即北门大河）。满清末年初建新军，先后在北校场办过四川武备学堂、陆军小学、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军官学堂、陆军测绘堂。原川军将领均在此受过军事训练，如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刘湘、杨森、王缙绪、贺国光、李家钰等。北校场在清末民初时，其规模尚不算大，直至1935年开办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始，范围逐步扩张，把古五担山亦划入校址之内，附近五街皆易新名，原苦竹林街改名江汉路，丰豫仓街改名昆明路，观音堂街改名黄埔路，武担山街改名洛阳路，武备街（又名止戈里）改名白下路。

成都分校面南背北，紧靠城墙。为了演习进出方便，在背北的城墙开了一道城门，门洞呈拱形，门洞的长度为城墙的厚度，5米有余。成都分校主任李明灏为此门题名“存正门”，取正气长存之意，亦寓蒋校长名“中正”；副主任彭武扬则撰文《存正门命名记》。北校场东院建有军医院，东、西院之间面对大门修了一座观礼台取名为“中正堂”，堂前有一讲台，蒋介石

来校训话和军校平时集合训话都在此建筑前。

成都分校开办时，专门成立了一个建筑委员会，由副主任彭武扬负责。所有校舍的修建，都由一个美国人承包，人称“苏洋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成都话。为早日开学，迫于工期，校舍是利用北、南、西三个校场原有营房扩建的。直到学员入校，不但课堂都是临时搭的篷棚，还有1000多人住帐篷。当时条件极为艰苦，李明灏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第1、2期同学录》序言中详有叙述：“乙亥秋奉命筹备成都陆军分校，草创之始，百度艰难，先于城之西北隅，觅得陆军小学、武备学校故地，荒废已久，蓬蒿没人，尽败瓦颓垣，略存其想象，乃鸠工庀材，分修理、建筑两部分逐次进行，阅四月始得旧者新之，就川黔中所保送之编余军官中甄别能否，前后得6000人，区之为1、2期各占其数甄取之半数，先期入者居修理部分，以为新者少计日程，功而以2期居之，种种牵特工固之久不就，继于校之隙地，围以芦藩，支帐幕，为暂时起居讲习之所。”

成都分校共开办两期。1938年1月，成都分校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附属机构有：教育科之器材室、军械库、印刷所等，政训科之《党军日报》

社，军医科之医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由南京西迁。军校师生从南京出发，经九江、武汉、铜梁，于1938年11月到达成都，以成都分校的北校场为校本部，第三分校并入本部。至此，成都分校即告结束。

二、组织系统与管理机构

成都分校校长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兼任，教育长为张治中。分校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总揽全校教育行政事务以及校务工作。下设教育、政训、经理、军医4科（后改处），一个秘书室（后改科），军乐一队，卫兵一连（后扩充为练习营）。

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如下：

主任：李明灏（湖南醴陵人，保定军校9期、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副主任：彭武扬（江西萍乡人，保定军校1期），马嗣良（四川绵竹人，陆军大学5期毕业，曾任刘湘军官教育团教育长）。

教育科少将科长：李亚芬（湖北黄安人，保定军校6期毕业）。教育科下设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5个组，每组设主任教官1人，教官若干人。战术组在主任教官之下，又设首席教官1人，还有技术（劈刺体操）1组，设教官2人，助教若干

人。

政训科少将科长：任觉伍（四川灌县人，黄埔4期，复兴社重要骨干）。政训科下设两组：政治教育组，设主任教官1人，政治教官若干；训导教育组，设训育主任1人，训育员若干人。

总务科上校科长：柳漱风。

经理科上校科长：游大观。

军医院上校院长：戴筱农。

军校人事安排有两大特点：一是接近基层、直接掌握学员的队职官，多为黄埔生。二是形成重校别、讲排行、论班辈的体系。大队长多数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少数是黄埔军校1期生。大队附及队长多数是黄埔4期前毕业生，少数是日本士官生及高教班毕业生。队附和区队长多由黄埔5至9期生担任，余为高教班、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军官大队和团警大队的官佐几乎全部来自于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和各个地方军校毕业生。在交通训练班车务大队部官佐中，这一现象也很明显；而交通训练班本部官佐和土木工程训练班官佐几乎都具有地方普通大学、技术学校背景或者国外留学背景。虽然这是成都分校，但是来自成都的师资力量却非常少，以湖南、安徽、江苏、江西、上海、浙江、河北、四川、云南等省为多。军官大队官佐的正统色

彩浓厚，几乎清一色来自当时各个军校早期毕业生，而技术科目（特别是教官、助教）可以见到大量来自地方院校和海外学习背景的官佐。这些具有海外背景的官佐中，以在日本、香港学习者为多。官佐年龄从20岁到40岁不等，尤以30岁左右居多。

三、学员

成都分校招收的学员，从四川、贵州部队所保送的编余军官中，甄别选拔，前后得6000人，区分为1、2期，每期各占其甄取数之半数。从构成上看，学员生源地是四川省内的占九成以上，也有少部分来自贵州、云南、陕西、湖南、湖北、河南、广东、江西等省，其中以贵州、云南、陕西生源为多。从生源年龄上看，多数学生在20岁到30岁之间，也有18、19岁的学员，30岁以上的学员并不多，40岁以上的学员偶有见到，说明当时为了保家卫国，生源入口把关并不是特别严格。从学员所留的通讯地址来看，多数学员来自农村、乡场，也有一些来自城镇。

学员分设军官、团警、交通、土木工程4个训练班。每一训练班下设大队、队、区队。学员入校后，先经3个月一般教育，然后甄别分科。1、2两期共有军官班2个大队，6个队。团警班1个大队，5个队。交通班设车

务2个大队，6个队；驾驶2个大队，6个队；通讯1个大队，2个队；汽车修理1个队。土木班2个大队，6个队，每队有3个区队，第2大队包括一个40余人的屯垦队，系在凉山地区招收的彝族学员，他们均系彝族头人子弟，毕业后回原地担任要职。

1935年10月，第1期学员正式入学。按学校教育计划，各科受训时间均为1年，于1936年10月如期毕业。

1936年3月，第2期学员入校。3月31日，校长蒋介石飞抵成都，住进北校场校本部。次日，学校隆重举行阅兵式暨开学典礼。学员们提前早餐，全体穿上新发的黄呢军服和黄色钉底翻毛皮鞋，黄呢绑腿，戴白手套，集合整队开赴阅兵场，按规定次序由西向东站排横队。上午9时，校长蒋介石在李明灏主任、校务委员刘湘及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等十余人陪同下，走上阅兵台主持阅兵分列式。阅兵结束，校长和陪阅人员离去，受阅各队即分别回驻地。下午2时，大家又齐集“中正堂”举行开学典礼。李明灏报告筹办成都分校经过，蒋介石开始训话，大意是：成都分校1、2期的学员均是受过军事教育、带过兵、作过战的川军骨干，是整军编余下来的军官。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开办分校对学员们进行专业训练，要

大家发扬黄埔精神，建设国家，要牢记校训“亲爱精诚”等。蒋介石住宿在北校场十余天，其间对在校学员进行过两次“精神讲话”，反复强调：“立正时，要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猛虎袭于后而心不惊，做到‘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然后就可以以不变就万变了。”蒋时常检查学员寝室和内务，还进行过一次夜间紧急集合演习。

第2期学员按教育计划应于1937年3月毕业，当时因遇两种情况，各延期3个月，故于1937年10月毕业。第一次延期，是1937年3月至6月，蒋介石决定将第2期学员全部安置在四川。但刘湘不愿接收，软拖硬抗，拖延时间。第二次延期，是因七七事变爆发，决定将原本毕业后分派地方工作的2期在校学员中土木班之第2大队、交通班之车务第2大队和通讯2队，改编成军官班之第3、4两个大队，全部停止原学习之专业，延期3个月加强军事训练。

第1、2期军官、团警班的毕业学员，由重庆行营统一分派。军官班1期学员分派川军部队，2期学员分派抗战前线部队，团警班分派保安总队、警察局。1期土木、交通两班学员分派湘黔、成渝、浙赣、陇海、京沪等铁

路部门和川黔两省公路局。2期驾驶大队学员，大部分派交通2团，后来参加了滇缅路抗战。1期原分派京沪、陇海的学员，因铁道、公路为日军占领，他们中有的参加前线部队抗战，有的进入步兵、工兵专科学校及陆军大学参谋班等深造。

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1、2期学员1000余人于1937年9月18日，在成都外东九眼桥乘木船赴渝，在重庆行营分派到武汉、南京，到达之后再分发各部队。当时军官大队400余名同学于抵渝之第3日，即奉命乘轮船直航南京听候分派，抵达南京之第2日，即分派到上海郊区之第10军第1师（师长梁华盛）、第20军（军长杨森）及第1军第1师（胡宗南部）报到。

四、教学与训练

成都分校的学科设置和一切规制与当时位于南京的黄埔本校一致，是川黔军事人才集中训练的枢纽。

各科讲授师资，均有国内外专家，特别是土木、交通两班的教官中外国留学者居多。各班学习课程不胜枚举，如交通训练班通讯大队的学科有电学大纲，有线、无线电学，内燃机学，一般和专业英语等。操作有无线、有线电收发报机，电线高空架设，手旗通讯，回光通

讯，信鸽等；特别是中、英文符号的手发、耳闻、目睹要达成上机快速、准确，均非短期可能精通；同时还要学习军事、政治等。土木工程学习中，就涉及测量学、铁道学、道路学、材料学、施工学、河工学、制图学、力学及桥梁学、三角代数及几何等内容。军事学中，就有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射击教范、交通学、阵中要务令、夜间教育学、军队卫生学、步兵操典等。其他各班均有相应的课程和技术操作等。

分校教育不是一般注入式教育，而是与时代结合、启发式的教育，注重实施、不尚空口论文。

在《成都分校1期毕业纪念特刊》里，军官大队第1队学员冯恕谦写的《我对于军事学之心得及生活修养》中有这样的描述：

从前我在军事学校所学的，乃是战术、兵器、筑城、地形等大教程和若干小战范，当时因为年龄的关系，可说是只有一点印象而已，几年来的带兵作战，事事证诸书册，便觉得军事学的需要和兴趣了。军事学中关于战斗指挥之教诲的，有战术学；关于弹药火器之性能使用保存法的，有兵器学；关于地形利害之认识判断及军事利用的，有地形学；关于工事构筑及破坏的，有筑城学；关于射击教育之养成的，有

射击教范；关于架桥筑路及各种通讯技能的，有交通学；关于战阵之中一切勤务之指导的，有阵中要务令；关于夜间教育之指导的，有夜间教育学等。譬如，我们讲战术便关联到地形兵器，因地形不同，我们兵力的运用不同，兵器的不同，我们的战术也不同——未有无烟药以前，作战队形多半是用密集的；有无烟药以后，作战队形不敢密集而改用疏散队形了……敌人的筑城不同，我们的战术也因之而不同，我第一个心得，便是军事学课程众多，但是件件关联，无轻无重，总在我们的广觉精研，融会贯通耳。

土木工程一队周兆华所写的《我对于土木工程之心得及生活修养》中有这样的描述：

1. 测量学。因主用仪器之不同，分为测链测量、平板仪测量、视距测量、水平测量、罗盘仪测量、经纬仪测量；又因宗旨之不同，分为地形测量、工用测量、路线测量、导线测量。种类繁多，测设亦异，然对于仪器之原理、安放之手续、施测之方法、记录之簿式、简切之计算、差误之校正、地物之描画，大同小异，沟通之处甚多，果能神而明之，则各物间相互位置，得心应手，描绘咸宜，且施测迅速，误差甚少。

2. 铁道学。铁道为陆地交通机关之一，铺设轨道，利用机车，牵行车辆，供大量之运输，其设

施以安全为首要，故对于路线之测量、路基之建造、道路之铺设、轨枕之排列、轨线之选择、桥梁涵洞之设计、志号之设计，若不详细规划，动策万全，毫厘偶差，危险特甚，研究铁道者首宜注意及之，次方论细部之动作。

3. 筑路学。道路为往来必经之途，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孔氏已早言之，原交通有通塞、地价有高低、施工有难易，材料运输，亦不可忽视，故宜首作建筑费之概算，次决定道路之种类、选用之材料、施工之方法，再次定路面之宽度、路基之种类、构截坡度及继截坡度之大小，如是财力节省，而康庄实现。

4. 材料学。工程中之主要材料，为石砖、木、铜、铁、水泥、石灰、混凝土、水泥沙浆水、石灰砂浆，及其他粘土制品，欲使使用适宜，则对于各料固有之性质、组织之成分、受化学作用所起之变化，及其耐压力、耐剪力、耐挠力、耐拉力、弹性、劈性、韧度、硬度均一一详细了解，则结合支承，允无不当之理。

5. 施工学。施工即将砖石木钢铁等材料用之于建筑者也，概可分为砖工、木工、土工、隧道工、基础工、混凝土工数种，欲使损力节财，藏事易易，则对于施工之种类、施工之程序、工作优劣之比较、材料器具之使用，均应深切考究之，然后批欲导窃，

奏力砉然，运斤成风，郢不伤鼻。

6. 河工学。大禹治水而天下平，西门凿渠而民富足，与利去害，往迹昭然。故欲策治河之计划，必先知河流之通性，及地质流势之形状、水位、比降、流速、流量、流出量……

7. 制图学。图为美术之一，旁求可以得贤，按图可以索驥。而工程图则用之以设计者也，故对物体各部之形态大小及其尺寸材料，均须显示无遗，倘有疏漏，不画蛇添足，即刻鹄类鹭，欲破壁飞去难矣。

8. 力学及桥梁学。二者术理较深，理解难易，余对同平面上诸力之分合，桥台之功用，连接接合力之方法，与挠曲力、剪割力，工作应力之计算，粗有领悟，殊不澈底，不累述。

9. 三角代数及几何。在中学时代，均以它们学理艰深，鲜切实用，常置诸高阁。迨今旧本重翻，始了然代数运用之简切，点线面体之性质，边角相互之关系，大可以穷天地之终，小可以极黍粒之微，运变无穷，笔难殚叙。

综上数端，均属余之一得，至于生活如修养方面，我认为切要而不可忽者，厥有四端。

1. 须有科学头脑。时代迁变，花样日新，异创异思，纷呈万状，公输不能争其巧，墨翟不能神其用，加之材料之组织，物质之变化，建筑之结构，数理化学，关

系极深，倘无科学头脑，万难运用臻妙，翻新立一。

2. 须有缜密心思。工程建筑，结构精致，偶有疏漏，波及全功，须经周密思考。

3. 须有勇往精神。工程浩大，建筑基难，人力常需数十万之多，时间常延数十年之久，若劲气直达，愚公有可移之山，倘畏葸不前，精卫有难填之海，昔难马王后陵墓，先后达四十年始成，非有勇往精神，曷克竣事。

4. 须有健全体魄。工程师必需力而后成，果毅之魄力，即寓于健全体格之中，若廷羸之躯，而畏以千钧之重，是犹蚊虫负山，欲其胜任愉快，克底成也难矣，其他如廉介之自对，谨慎之将事，谦冲之律己，精刻之深究，在实习期间，亦必具之素养，夫然后投之所问，无不如意，方能作一工程界之骨干人员。

五、重要人物和事件

(一) 分校领导

李明灏(1897—1980)，曾任国民党师长、军长、参谋长、军校教育长、成都分校主任、武冈分校主任、97军军长、庐山分团主任。1935年9月，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主



任，为制止该校政训处长任觉伍准备密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400多人，他亲去浙江奉化找蒋介石辩护，设法保护了这批革命力量。1947年、1948年政治上失意，在江西等地住闲。1948年年底进入解放区。1949年后，先后任华北革大3总队总队长，湖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南民政部副部长，湖北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等职。

（二）管理机构负责人

教育科少将科长：李亚芬

政训科少将科长：任觉伍

总务科上校科长：柳漱风

经理科上校科长：游大观

军医院上校院长：戴筱农

（三）突出教员

马嗣良（生于1890年，卒年不详），四川绵竹人，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教官，后任四川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中将主任。

王家让（1914—1944），四川渠县人，国民党第13军辎重兵团少将团长。

（四）杰出学员

成都分校只开办两期，毕业生人数相对较少，在军中职位高者凤毛麟角。其中有：

杨本固（生于1909年，卒年不详），四川南充人，曾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3师少将师长。1947年4月在山东泰安被解放军俘虏。

周树德（生于1909年，卒年



/ 教育科少将科长：李亚芬。



/ 政训科少将科长任觉伍。



/ 总务科上校科长：柳漱风。



/ 经理科上校科长：游大观。



/ 军医院上校院长：戴筱农。

不详），四川合川人，曾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7军少将军长。

张扬明（生于1912年，卒年不详），湖南醴陵人，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少将处长。

杨振铎（1908—1950），湖北应山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湖北站少将站长。

周寿之（生于1911年，卒年不详），浙江杭州人，曾任国民政府杭州市警察局少将局长。

周建国（生于1910年，卒年

不详），浙江江山人，台湾“国防部”情报局行动室少将主任。

赵耿（生于1907年，卒年不详），浙江缙云人，台湾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室中将副主任。

（五）龚愚与战斗射击场

由于蒋介石重视军事教育，讲究制式教练，校务会议决定在北校场兴建一个占地300余亩的大操场，能容一个师的阅兵、举行分列式。在大操场西边还要修建一个战斗射击场。射击场由成都分校的一个队长负责设计、指导施工，他是仿照英国陆军演习场设计的，但只有标识散兵活动的各种活动靶，并无进行战斗活动的各种地形、地物的设备，故实际只能是个活动靶场。这个队长名叫龚愚（1907—1976），贵州婺川人，黄埔军校6期生，先后毕业于英国皇家军官学校和炮兵学校，留英期间即注意到英国军事院校十分重视师生的实战演习训练。1941年冬，龚愚离任炮兵55团团团长后，主办贵州扎佐陆军演习场，其规模宏大，地跨今修文、白云、息烽等县（区），西起修文县城，东经阳明洞、马家桥至扎佐，北起息烽县城和九庄，南达白云区麦架，成为抗战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陆军训练基地。众教官在此学习西方训练军队的先进经验，着力改进中国的军政工作，为中国抗战训练了大批陆军将士。

六、附录

(一) 官佐名单

军官第1大队部官佐

黄裳吉 上校大队长

张幼贤 上校大队附
第1队

曾庆集 上校队长

袁祉光 少校队附

张微之 少校区队长

王文枢 上尉区队长
第2队

曹铁城 中校队长

王光荣 少校队附

林典达 少校区队长

岑立潮 上尉区队

第3队

龚愚 中校队长

胡魁 少校队附

王泽普 少校区队长

王剑飞 上尉区队长

孙宝璠 中尉区队长

军官第2大队部官佐

杨之敬 上校大队长

刘瞩载 中校大队长

孔庆轩 上尉副官

第4队

李寿千 中校队长

吴觉然 少校队附

周醒寰 上尉区队长

吴凤翔 中尉区队长

王魁奇 中尉区队长

第5队

刘作垠 中校队长

刘觉吾 少校队附

伍鸿定 上尉区队长

张淳 上尉区队长

王秉文 上尉区队长

第6队

刘郁华 中校队长

贺知诗 少校队附

阚家仁 少校区队长

刘锐 上尉区队长

廖明达 中尉区队长

团警大队部官佐

王振敦 上校大队长

文广华 中校大队长

谭樑森 上尉副官

第1队

朱嘉誉 中校队长

刘承汉 少校队附

王去非 少校区队长

李兰洲 上尉区队长

龙襄 中尉区队长

第2队

王从龙 中校队长

吴玠 少校队附

黄锡彤 少校区队长

吴鸿泰 上尉区队长

周克修 中尉区队长

第3队

唐启琳 中校队长

黄道远 少校队附

陈腾辉 少校区队长

孙家骧 少校区队长

熊树蓉 上尉区队长

第4队

张继泰 中校队长

徐昌黎 少校队附

靳行素 少校区队长

邓星明 上尉区队长

李念曾 上尉区队长

第5队

谢崇阶 中校队长

刘赜 少校队附

朱灏 少校区队长

卢赞动 少校区队长

王敬之 上尉区队长

交通训练班本部官佐

程钟奇 少将班主任

魏军藩 少将总教官

胡玉川 副总教官

杨得任 上校班附

王德华 中尉副官

范秉直 中尉副官

晏国久 中尉副官

侯俊元 中尉副官

交通训练班车务第1大队部官佐

赵学浩 上校大队长

张仁才 中尉副官

王幼之 中尉书记

徐克健 准尉司书

第1队

胡祖介 中校队长

陈拔萃 少校区队长

罗炳垣 上尉区队长

苗仁杰 中尉区队长

第2队

欧阳横 中校队长

周景炎 少校区队长

胡松林 少校区队长

李尚武 中尉区队长

第3队
王公唯 中校队长
刘育仁 少校区队长
雷向源 上尉区队长
吴楚瑞 上尉区队长
交通训练班车务第2大队官佐
周惠元 上校
赵松云 中尉副官
第4队
熊禹疏 中校队长
李开雯 少校区队长
王醒民 少校区队长
邱泽寰 中尉区队长
第5队
周德光 少校队长
方冠寰 少校区队长
吴鸣举 上尉区队长
谢前驱 中尉区队长
第6队
柏林 队长
杨成骥 上尉区队长
李鸿机 中尉区队长

交通训练班驾驶第1大队部官佐
申自鑫 上校大队长
吴念王 上尉副官
第1队
刘貽净 中校队长
张震欧 少校区队长
侯怀穆 少校区队长
第2队
赖士漠 中校队长
钟世亨 少校区队长
李临民 少校区队长
吴德才 中尉区队长

第3队
张永锡 中校队长
吴希平 少校区队长
刘定权 少校区队长
李祖唐 少校区队长
交通训练班驾驶第2大队部官佐
唐克明 中校大队长
第4队
文蔚雄 中校队长
李煜 少校区队长
汪冠勋 上尉区队长
王寤 中尉区队长
第5队
袁鼎魁 中校队长
汪敷邦 少校区队长
刘觉先 上尉区队长
王子仁 上尉区队长
第6队
樊立杰 少校队长
曹师贤 少校区队长
李世元 中尉区队长
曹继魁 中尉区队长

交通训练班通讯大队官佐
唐保冲 上校兼大队长
卢运从 中校兼大队附
张炜如 中尉副官
第1队
夏尚中 中校队长
冯齿康 少校区队长
陈宗晋 少校区队长
周国藩 上尉区队长
詹景文 中尉区队长
第2队
董劲儒 中校队长

徐梁 上尉区队长
贺文喜 上尉区队长
孙振波 中尉区队长

交通训练班修理第1队部官佐
易珍瑞 上校队长
王中岳 中校区队长
李世果 中校区队长
王起 中校区队长
姜布南 少校区队长

土木工程训练班官佐
马嗣良 少将班主任
胡嘉诏 少将总教官
朱执钧 少将班附
彭先蔚 少校班附

土木工程训练班第1大队部官佐
于希贤 上校大队长
高维新 上尉副官
第1队
骆湘浦 中校队长
熊弼 少校区队长
李子楨 上尉区队长
孟昭毅 中尉区队长
第2队
彭令豫 中校队长
钟涛 少校区队长
李英伯 上尉区队长
何桐生 上尉区队长
第3队
卢惠修 中校队长
王耀远 少校区队长
朱梦麟 少校区队长
汤树藩 上尉区队长

土木工程训练班屯垦队官佐

余重华 中校队长

张育贤 少校区队长

刘文俊 上尉区队长

王家让 上尉区队长

土木工程训练班第2大队部官佐

曾广芬 上校大队长

牟弗荪 上尉副官

第4队

牟勉初 中校队长

刘高臣 少校区队长

张彬 上尉区队长

王俊明 中尉区队长

第5队

余量 中校队长

白祯 少校区队长

张清澄 少校区队长

傅光远 上尉区队长

(二) 张治中《成都分校同学录》序

《成都分校同学录》序

张治中

成都分校成立之后，许久我就准备亲往视察，但因为一病数月，体气尚未复原，至今不能如愿，现在接到同学录筹备会的来电，知道分校第一二两期的同学，毕业在即，一方面令我感觉时间过去的迅速，一方面又觉得没有机会和同学见一次面，不胜怅歎！

本校和分校，是一体的，虽然我们大家不能聚在一堂，可是

彼此的精神，却是完全一致的。自从十三年黄埔军校开办以至今日，在本校和分校毕业的学员生，数量已经不少，而在这十二年来，由于各期学员生的努力奋斗，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这里实有一种伟大精神的感召，就是我们秉承着总理所遗下给我们的教训，以及我们领袖——蒋校长所昭示我们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凡是受过本校教育的学员生，因为都能够表现出这种精神，所以在民族复兴的艰巨工作当中，才会树立唯一的光明的而且是稳固的基础。成都分校的同学，在校受教育的时间虽不很长，但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知道各位求学的经过，确是非常的良好，这是值得我们欣喜的一件事！因为发扬这种精神的干部，又增加了好几千人，对于革命的前途，正是一种光明的预兆。

现在大家快毕业离校了，就师生的感情而论，当然大家不免有多少惜别的情绪，可是为大家的前途以致全民族的前途着想，大家毕业的时候，都负着很大的历史使命而离开母校的，我们不应该徒然的惜别，我们应该想到如何才能够完成我们的使命，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给母校以莫大的光荣，同时也就是给民族以莫大的光荣，拿我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来报答母校，来报答领袖，这才是一种有意义的惜别。

我们知道，毕业不是我们事业的终结，而是我们事业的开端，不错，我们分校的同学，在过去已经建立了不少伟大事业的基础，当大家还没有入校以前，对于中国的革命，已经有过不少的贡献，但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比以往更加好几倍的危险，我们现在所负的责任，比以前更加好几倍的重大，未来的一切工作，比以往更加好几倍的艰难，因为我们民族的生存问题，现在已经到了最终决定的一幕，中华民族任何一分子，尤其我们任何一个革命军人，他的奋斗的决心，和他的奋斗的精神，就是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个大关键，我们的同学，恰好在这一个时期完成了学业，意义的重大，是可以不言而喻的，在今天我个人只有几句极简单的话，就写在同学录的前面，给我们负着继往开来的使命的同学们做一个参考。

第一、在求学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感觉得我们学业的成就，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们对于任何一种课程的学习，绝不容我们中途舍弃，也不容我们敷衍塞责，就可以得到很好成绩的，这一点是我们一个极宝贵的教训。由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白，假如我们想成功一桩伟大的事业，当然也得有这样的精神，所以我们此后应该牢牢地把握着自己心中的

信念，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主义和我们所信仰的领袖，同样地拿出锲而不舍的精神，以整个的头脑和生命贡献给自己的信仰，任何困难挫折，都不能一刻中断，然后才可以达到最终的目的，所以说：“有恒是成功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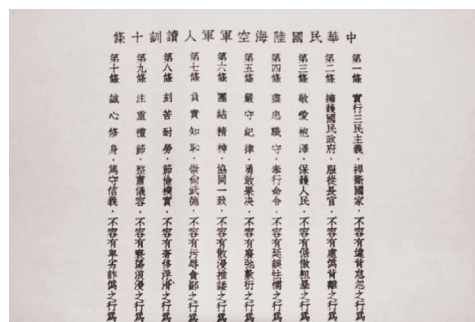
第二、在校内的时候，大家一定很明白地了解我们的校训“亲爱精诚”四个字的真义。学校是一个团体，我们所以维系这一个团体生命的要素，就是这四个字，大家毕业以后，在部队里面，依然过的是团体的生活，自然在部队里面，我们表面上是以纪律来维持部队生命的，但我们应该知道，纪律的使用，固然有一种具体的形式，而纪律的本质，则无论如何，不能超出“亲爱精诚”四个字的范围以外。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场合当中，我们无论对于任何一个长官，或一个部属，以及一切同僚，都不能不切实地守着我们的校训，都不能不根据这四个字来做立身行事的标准，这样才能得到纪律的效果，发挥“一致”的精神，维持和光大团体的生命。

第三、团体的行动，只有团体，没有个人，在校的时候，自己的荣誉，是建筑在全校荣誉上面的。出校以后，自己的荣誉，以至自己的生存，是建筑在全民族的荣誉和生存上面的，所以本校教育的最大目的，是养成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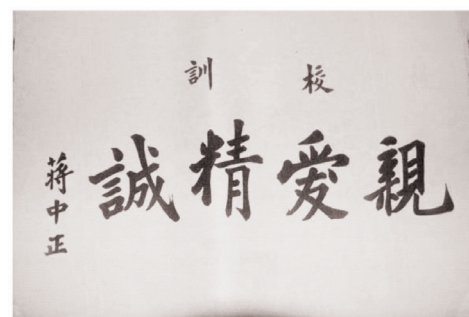
们公而忘私的精神，我们要发挥“亲爱精诚”的真义，也就以“大公无我”为先决的条件，简单地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处处不要忘记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利益，排除一切的私欲，才配谈到牺牲，古来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和中外一般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能为百世歌颂的原因，完全因为他们的劳碌以至牺牲，

绝不是为个人打算的，现在我们要切实负担复兴民族的使命，假如不能认清公的需要，不能拿整个民族复兴事业来做我们工作的前提，那么，我们不但不能成功个人的事业，而且民族的生命就会断送在我们的手上。

以上所说的各点，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是有终身用之而不能尽者。在伟大时代的前头，希望同学们努力！



/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军人读训十条



/ 校训。



/ 党员守则。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0年4—5月

□ 吴亚明

4月

国台办：世卫组织涉台问题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处理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日应询表示，关于世界卫生大会涉台问题，台湾个别媒体以讹传讹。驻日使馆发言人已发表谈话，对假消息进行严正驳斥。我要重申的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涉台问题上，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处理，舍此别无他路。

国台办：苏贞昌“台独”本性暴露无遗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日应询表示，最近，苏贞昌一再升高“台独”声调，其“台独”本性暴露无遗。苏贞昌如果一意孤行，继续挑衅、制造两岸对立，严重破坏两岸关系，最终只会把广大台湾同胞推向危险境地。

广州推出“穗康码”台胞实名认证功能

广州在健康码“穗康码”中推出台胞实名认证功能，保障台胞在穗工作、生活各方面通行便利。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搞小伎俩“以疫谋独”不会得逞

针对日前“驻捷克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与捷克经济文化办事处发表所谓“防疫合作联合声明”，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搞这些小伎俩，并不是为了台湾民众的卫生健康福祉，而是“以疫谋独”，其图谋不会得逞。

受惠大陆复工加速，台湾3月出口环比增长11.4%

台湾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8日公布，3月出口282.7亿美元，较上月增11.4%，较上年同月减0.6%。大陆和香港依然是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教育部：暂停2020年陆生赴台就读试点工作

教育部港澳台办负责人受访表示，综合考虑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两岸关系形势，决定暂停2020年大陆各地各学历层级毕业生赴台升读工作。对已在岛内高校就读并愿继续在台升读的陆生，可依自愿原则在岛内继续升读。当务之急要解决陆生返回台湾高校就读受阻问题，切实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外交部发言人驳斥美方涉世卫组织、涉台不当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日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涉世卫组织及涉台不当言论进行驳斥。赵立坚说，美方称国际社会未能得到台湾方面的信息，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没有人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

台湾在校学生人数创新低，教师高龄化趋势明显

台湾当局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少子化”冲击持续发酵，2019学年台湾地区各级学校学生总人数426万人，为1981学年开始统计以来新低，较上学年续减6.5万人，其中以高中减5.4万人最多，大专校院也减少3.2万人。

两岸公司与丹麦医药大厂签署新药授权协议

台湾合一生技、丹麦利奥制药、中天上海三家公司15日同时在台北和丹麦巴勒鲁普签署异位性皮肤炎、过敏性气喘新药FB825合作研发与商品化的

全球独家授权协议。

两岸医疗卫生专家举行抗疫视讯交流

江苏和台湾两地16日于南京和台北举行“苏台抗疫视讯交流”。两岸医疗卫生专家就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和公共卫生防疫等议题进行交流，希望为两岸抗疫提供更多助益，造福两岸同胞健康福祉。

台湾研究机构下调台经济成长预测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17日公布最新预测，将2020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预估值从去年12月发布的2.44%下修为1.03%。

受惠大陆复工，台湾3月外销订单不减反增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20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月台湾企业外销订单金额为40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3%，大幅优于预期。第一季度外销订单1042.4亿美元，年减3.5%。3月份订单增加主要受惠于大陆生产线陆续复工。

世卫组织否认台湾防疫部门曾就新冠疫情“发函示警”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0日回应有关台湾地区防疫部门曾向世卫组织“发函示警”的不实言论，强调台湾地区从未在邮件中向世卫组织“示警”新冠病毒“人传人”。

台军方检讨舰队“染疫”存在四大缺失，防务部门负责人自请处分

台湾“敦睦”舰队感染新冠肺炎引爆台湾舆论，台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严德发21日晚在记者会上公布这起群聚感染事件初步调查结果及首波惩处名单，指出海军存在四大缺失。他还称，已向台当局领导人自请处分，包括请辞，该负的政治责任绝对都会负责。

台湾失业率再走高，消费者信心指数创新低

新冠肺炎疫情对台湾就业冲击延续。台当局统计部门22日公布，失业率连续2个月上扬，3月失业率3.72%，较上月上升0.02个百分点；季节调整后失业率为3.76%，较上月增加0.06个百分点，创10个月以来新高。

福建自贸试验区五周年持续深化两岸合作

福建自贸试验区自2015年4月正式挂牌成立以来，在两岸产业、贸易、金融、人才等方面交流合作持续深化。截至2020年3月，累计新增台资企业2520家，合同台资67.9亿美元。

国台办：台陆委会关于大陆人口普查的说法歪曲事实、别有用心

针对有台媒报道称大陆第七次人口普查将要求大陆配偶提供在台家庭相关数据，台陆委会称这是侵害个人隐私权，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7日应询表示，有关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别有用心，企图破坏两岸关系。

上海：直播带货助台企复工复产复市

为了帮助上海台企加速复工复产复市，26、27日上海市台协先后举行了四场直播。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张简珍化身“带货达人”，与多位知名台商一起推介品牌、推销产品。

国台办评“台独”组织搞所谓“制宪公投”：是历史逆流，是绝路

针对岛内个别“台独”组织推动所谓“制宪公投”，已完成第一阶段联署，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8日应询指出，“台独”组织搞所谓“制宪公投”，其目的是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操作“反中仇中”必然沦为“反智”

针对民进党当局追随西方政客，无理炒作调查新冠肺炎病毒起源问题，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0日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编织各种谣言诬蔑攻击大陆，现在又公然与西方反华政客唱和，甘当棋子，进一步将其“以疫谋独”的丑恶本质暴露于世人面前。操作“反中仇中”必然沦为“反智”，只能徒增笑柄。

台湾下修第一季度经济成长预估，二季度形势更严峻

台当局统计部门4月30日公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民间消费不如预期，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成长率估为1.54%，比2月预测值1.8%减少0.26个百分点。

5月

台湾劳工团体向台当局提出四大权益要求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台湾劳工团体发起的“五一行动联盟”1日取消往年的游行集会，改为召开记者会，向台当局提出收入保护、职场保护、就业保护和工会保护四大权益要求。

台湾制造业2019年营收和利润双下滑

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5日发布的统计显示，2019年台湾制造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比上年都有所下滑，但是企业的研发投入金额和增幅均为近5年新高。

台湾防疫渐“松绑”，民众外出回温

截至10日，台湾连续28天无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在疫情缓解情势下，台防疫措施逐渐“松绑”，民众外出消费、观光等出现难得回温。

外交部：涉台谅解备忘录不是什么秘密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2日说，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不是什么秘密，台湾当局当前再次就有关备忘录“炒冷饭”，不过是其借疫情搞政治操弄的又一表现，也完全是徒劳的。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恶化两岸教育交流和陆生在台就读环境

针对台中原大学一名副教授日前在课堂公开散布歧视陆生、攻击大陆的言论，台陆委会及教育主管部门对其表示支持，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应询指出，正是这类言行及民进党当局的偏袒纵容，恶化了两岸教育交流和陆生在台就读应有的正常健康的学习环境。

台湾一私立大学停办，私校工会忧更多学校有倒闭风险

位于台湾嘉义县的私立大学稻江科技暨管理学院14日宣布将于今年7月31日停办，引起岛内关注。台湾私校工会表示，学生数在3000人以下、注册率低于六成的学校恐有倒闭风险。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台办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应对疫情统筹做好支持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资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台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十部门15日联合印发《关于应对疫情统筹做好支持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资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

外交部：台湾地区根本不存在所谓“国际防疫缺口”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5日表示，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广大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台湾地区获得疫情信息的渠道是畅通的，根本不存在所谓“国际防疫缺口”一说。

国防部：中方要求法方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项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15日就法方计划售台武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法方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项目，以免对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

湖南建立台胞台企法律服务平台

湖南省台胞台企法律服务平台合作搭建签约仪式15日举行，平台的搭建将有利于更好保障在湘台胞台商台企的合法权益。

福建颁发大陆首批面向台胞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6日，4名台湾同胞在福建省福州市取得了当地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包括公共营养师、芳香理疗师两类职业。这是大陆首批向台胞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昆山台资经济疫情下逆势增长

江苏省昆山市台资经济逆势实现新突破。1至3月，该市新批台资项目30个，增资项目14个，新增投资总额超10.788亿美元，新增注册资本4.283亿美元。

川渝携手共促台胞台企“向西”发展

重庆市台办与四川省台办签订了《深化川渝对台交流合作、促进台胞台企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川渝双方将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过程中，

共同为台胞台企向西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外交部：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提案问题不得人心

第73届世卫大会主席18日宣布此次大会不讨论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地区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9日说，台湾当局及个别国家在本次世卫大会推动涉台提案的图谋没有得逞，事实再次证明“台独”没有出路，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提案问题不得人心。

国台办发言人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5·20”讲话应询表态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0日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5·20”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应询强调，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台独”是逆流，是绝路。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给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

国台办：敦促美方停止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5月2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将其称为所谓“总统”，并吹嘘美台“伙伴关系”。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和美国一些政客向蔡英文发视频贺辞。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0日应询指出，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外交部：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国政府已告知国会可能将向台湾出售总价值1.8亿美元的先进鱼雷。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1日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李克强谈对台工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2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要坚持对台大政方针，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行径。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台独”、促进统一，我们一定能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国防部：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4日就美国售台武器发表谈话。他说，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台军售，立即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以免给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

福建 GDP 首超台湾，两岸融合发展现新机

权威数据显示，海峡西岸的福建省经济总量首次超过台湾。分析人士指出，这为两岸融合发展带来更坚实基础和更大发展机遇。

国台办：香港繁荣稳定不容破坏，警告民进党当局停止趁火打劫

针对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对全国人大涉港决定不断说三道四，对香港黑暴分子违法行径视而不见，扬言搞所谓“救援行动”，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8日应询指出，香港的繁荣稳定不容任何分裂

势力干扰破坏。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停止趁火打劫，拨弄是非。引黑暴势力入台只会祸及台湾民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栗战书出席并发表讲话

《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2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反分裂国家法》的重要作用，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国台办：《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年发挥重要作用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0日应询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人民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15年前，针对岛内“台独”分裂活动猖獗，全国人大制定实施《反分裂国家法》，这是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年来，在遏制“台独”分裂图谋、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广大台湾同胞福祉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诚品第一家24小时书店5月底熄灯，新店6月接棒“不打烊”

台湾第一家24小时营业的书店诚品台北敦南店31日正式关门，诚品信义店将从6月1日起接棒成为新的24小时书店。新的24小时书店有近17万种书籍和商品，是现在敦南店的1.8倍；书店面积近3300平方米，是敦南店的2.5倍；书店里将有台湾唯一24小时营业的唱片行和书店里的生鲜超市，打造一座“生活与昼夜阅读的博物馆”。

试析国民党两岸政策调整

□ 李立

国民党两岸政策经历了蒋氏父子的“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李登辉明统暗“独”的“两国论”；2000年至今，国民党历经连战、吴伯雄、马英九、朱立伦、洪秀柱、吴敦义、江启臣等党主席，两岸政策核心为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国民党两岸政策的调整与岛内外形势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本质上看，不同时期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均由历史因素与现实状况所决定，当然，决策者的个人因素也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综合各种因素的合力最终推动了国民党两岸政策的不断调整。

蒋氏父子的两岸政策

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国民党两岸政策主要内容是“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重新制定其新的“国民革命”任务，把“反共抗俄”作为主要内容，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反共”和“抗俄”展开，并提出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将之打造成蒋介石“反共复国”的基地。国民党“七大”指出，要巩固在台湾的统治，要利用民

众“反共”的心理，运用综合手段来“摧毁敌人”，并逐步构筑起“反共复国总体战”的基本格局。1969年，国民党“十大”强调推进“光复大陆”的政策，并加强对台湾的建设，以巩固台湾“复兴基地”的地位。

从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成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到1987年蒋经国去世，随着岛内外形势的改变，国民党逐步调整其两岸政策。蒋经国的两岸政策逐渐改变了“反共复国”的主基调，坚持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为原则，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其基本政策。随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政策的出台，国民党偏安拒和的本质日益凸显。国民党在一些会议上多次重申“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的立场，尽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表明国民党当局已放弃了使用武力统一的主张，但在与大陆关系上又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原则，不会以任何形式开展与大陆的接触和谈判，这表明国民党并无意愿以和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统一”。

总之，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两岸政策，与过去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复国”的两岸政策比较，其突出特点是放弃了“军事反攻”“武力统一大陆”的主张，强调运用政治手段的“和平”方式。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在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确立为其两岸政策的核心内容时，仍坚持“三不”立场来对抗大陆的“和平谈判统一”的方针。另一方面，与以往国民党主张“军事反攻”“武力统一”相比，此时的国民党两岸政策更加务实，“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政策强调运用政治手段“统一中国”。客观来看，在“统一中国”这个原则问题上，蒋氏父子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两者之间并无质的差别。

从“一国两府”到“两国论”

李登辉主政时期，国民党对两蒋时期的两岸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使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调整和转变，既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又受到李登辉政治倾向的影响。从本质上讲，李登辉主政时期两岸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分裂中国”。

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之初，继承了蒋经国时期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政策。在两岸政策的大政方针上仍然坚持对内反“台独”，对外“反共”的基本立场。1990年5月以后，李登辉开始鼓吹“一国两府”。“一国两府”的提出，说明李登辉开始放弃两蒋时期坚持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原则。

1993年，李登辉开始在公开场合否认一个中国原则，并打出“阶段性两个中国”的旗号，企图分裂中国，造成两岸关系严重恶化。李登辉宣称“一个中国”是将来的事，是追求的目标而已，现在的“中华民国”只对台澎金马拥有“治权”，所以最好的说法只能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以“中华民国在台湾”取代“中华民国”，说明李登辉放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在对外关系方面搞双重承认，推行其所谓的“务实外交”，图谋制造“一中一台”或者“两个中国”的客观事实。

1995年5月，李登辉到美国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再次公开否定“一个中国”。1999年7月，李登辉赶在卸任前迫不及待地抛出其追求“两个中国”目标的“两国论”主张：“海峡两岸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国民党当局的两岸政策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与李登辉个人的两岸关系立场有很大关系。李登辉上台后，特别是90年

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以后，国民党当局的一个中国原则立场开始出现变化，他们试图利用国际秩序重整的机会改变台湾在两岸关系中的政治定位，希望以与祖国大陆对等的“主权独立国家”的身份参与国际社会。

李登辉公然声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或者说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其分裂国家的本质彻底暴露。这一时期，以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提出分裂中国的“两国论”，集中体现了国民党两岸政策已经从统一走向分裂。分裂中国成为其政策的核心理念。李登辉的两岸政策严重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引起了两岸人民的反对，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不满，最终造成了国民党的分裂。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败给民进党，在台执政50多年的国民党失去执政地位。连战取代李登辉成为国民党主席。这一时期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主要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马英九继任国民党主席后，继续贯彻连战所确立的两岸政策，并且逐渐形成马英九时期的国民党两岸政策。之后，除洪秀柱任党主席期间进行的修正外，其他党主席几乎都是按照马英九时期制定的两岸政策处理两岸关系。

2000年国民党沦为在野党之后，两岸政策显得被动和消极。在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上，不提“两国论”，也不再提“一个中国”。在处理两岸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反复摇摆、模糊不清，导致两岸政策背离其自身的理想和价值。2005年，国民党改变其在两岸政策上摇摆的姿态，强调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展开两岸对话。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参访大陆，实现了自国民党败退台湾以来党主席的首次参访大陆。国共双方表示两岸应以“九二共识”为前提，逐步重启双方协商与谈判。

2005年7月，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他承认“九二共识”，但解释为“一中各表”；反对“法理台独”，但又不赞成“统一”，认为目前两岸没有谈“统一”的条件。同时，强调两岸应搁置政治分歧、推动经贸交流。马英九对两岸关系的立场是反对“台独”，但又坚持“台湾优先”，以台湾利益为重。经过不断调整，马英九逐步形成维持现状的中间路线，即“不统、不独、不武”的表述，称为“三不政策”。马英九两岸政策的实施，改变了陈水扁时期与大陆的紧张关系，对两岸关系具有缓和作用，两岸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向好。

2013年6月，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参访大陆时第一次正式

提出“一个中国架构”，“两岸在各自的法律上都是一个中国原则的”，两岸之间并非“国与国”的关系，用“一个中国框架”来定位两岸关系更合情合理。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发展，“一中架构”被越来越多的国民党人士所接受。国民党正式提出“一个中国架构”，说明在两岸关系上已经回到了对“一个中国”的认同上来，至于“一个中国”具体是什么，怎么去理解“一个中国”的涵义，这为两岸双方在未来的交流中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2008至2016年国民党执政期间，两岸基于“九二共识”重启半官方的制度化协商，进而建立官方的陆委会、国台办交流沟通管道，更于2015年实现了海峡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的历史性会面。从2008年以来，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台湾当局都积极致力于政治上的求同存异，推动两岸建立制度化经贸协商机制和加强文化交流，为两岸的政治互信营造了良好的环境。2014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接替马英九任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基本延续了马英九时期的两岸政策。

2016年，洪秀柱当选国民党主席。此前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参加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因提出“一中同表”主张引发党内外争议四起，直接导致“换柱风波”。担任国民党主席后的

洪秀柱对两岸政策有所修正，其“偏统”的政治立场获得了大陆的高度肯定。洪秀柱当选国民党主席后即明确表示，“希望国共两党继续秉持‘九二共识’，进一步深化互信、强化合作”。在与习近平总书记会面时重申“求一中原则之同、存一中内涵之异”，并再次强调“九二共识”的基础作用。

2017年5月20日，吴敦义当选国民党主席，其两岸政策备受各界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吴敦义，祝贺其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由于吴敦义选前多次发表极具争议言论，引发大陆高度关注，从对吴敦义当选的贺电中即可看出大陆对吴敦义两岸政策的疑虑。吴敦义在当选后给习近平总书记的复电中特别指出，在1992年双方达成“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于它的涵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的共识基础上，历经多年努力，推动制度化协商，签署多项协议，从紧张对立到和平发展，成效有目共睹，这就是表现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原汤原味，而不是简化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八个字。吴敦义并在复电中指出，展望未来，期盼国共两党持续深化“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化。吴敦义主导下的国民党两岸政策可谓与马英九如出一辙，颇有“马

规吴随”之意。

2019年，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韩国瑜表示，“以‘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再创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并在电视专访中再次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27年来维持和平的定海神针，他认为双方应在这个前提下，保持模糊空间，且不碰触红线。韩国瑜的两岸政策实际上也代表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所在。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当前国民党两岸政策分析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败选，于是党内就出现了要讨论两岸政策的声音，包括“九二共识”过时了、欠缺弹性、“断三通”，等等，把国民党的败选原因归罪于“九二共识”，这完全是搞错了方向，是急病乱投医。如果“九二共识”是导致国民党败选的原因，那如何解释2012年坚持“九二共识”的马英九打败了民进党的蔡英文？2018年坚持“九二共识”的韩国瑜能在台湾南部掀起“韩流”，赢得高雄市长选举？

事实上，坚持“九二共识”是国民党的优势而非劣势。正因为“九二共识”的存在，才有了后来的“汪辜会谈”；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先后参访大陆；甚至有了马英九时期的两岸“三通”，以及包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内的23项协议，所以，“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撼山易，撼‘九二共识’难”。只有坚持“九二共识”，才能处理好两岸关系，进而为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国民党如果抛弃自己的优势，可能会被作为“第三势力”的其他政党所取代。

2020年3月7日，国民党主席补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江启臣当选。选前，江启臣在国民党主席补选候选人政策辩论会上提出了他的两岸政策主张。江启臣表示，对于如何延续“九二共识”中的“搁置主权争议、求同存异、务实交流”的智慧，重新思考国民党的两岸论述缔造新的两岸信任基础，应该开放讨论、展开辩论，最后凝聚党内共识。也应尊重台湾民主，未来两岸关系的任何调整，须先争取台湾民意的授权，不是任何人能片面决定。当选后，江启臣在就职致词中，没有提到“九二共识”。江启臣的两岸政策态度，引发了国民党内的反弹。面对国民党内的反对声浪，江启臣表示，他并没有否决“九二

共识”，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要经过党内大辩论后决定。3月11日下午，国民党召开中常会，江启臣再次就两岸政策表达了他的态度。他说，两岸议题、“九二共识”一直是国民党很重要的议题，虽然国民党这次大选失败受到两岸议题影响，但“不代表‘九二共识’是有问题的”。江启臣还解释称，国民党的两岸论述不是党主席说了算，目前国民党内一直在沟通，改革委员会也有各种不同意见，因此，他目前不随意提出他的两岸论述，也不是说就职时不愿谈“九二共识”，而是等未来党内有共识，确定未来国民党要如何论述两岸政策，届时才会完整表述。显见，江启臣对当前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持谨慎、模糊态度，究竟何时提出清晰的两岸政策，有待进一步观察。

众所周知，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时，两岸关系濒临危险边缘，正是国民党的力挽狂澜，才让两岸关系重新恢复和平状态，而台湾民众也用选票表达了对国民党两岸政策的信任。马英九执政后，凭借搁置主权争议的“九二共识”，采“亲美、和衷、友日”路线，给了台湾和平喘息的8年。失去执政党地位后，国民党不但无法扮演两岸冲突的刹车皮，也渐渐失去对美国的话语权。江启臣当选党主席后不愿碰触“九二共识”，被外界形容为“拿香跟民进

党拜”。如此一来，支持民进党的自然不会选一个“山寨版”的民进党；不支持民进党的，也有民众党等虎视眈眈盯着浅蓝地盘的政党可选。国民党要想在台湾政坛占据一席之地，制衡民进党，就必须发挥其两岸议题的长处。所以，国民党继续坚持“九二共识”方为上策，否则，国共两党关系生变，国民党也会在台湾政坛走向式微。

江启臣要带领国民党走出困境，除了要有大刀阔斧改革的魄力之外，更要有对国民党自身和两岸关系结构深刻的洞察力。国民党发展问题的症结在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改革的关键在于能够真正面对现实，进行结构性改革，诸如争取青年支持、建立能够凝聚人心的论述、消解影响内部团结的负面因素等各个方面，均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获得发展的动能。

国民党虽然已经失去执政地位，但仍是台湾最大的在野政治力量，又有长期推动两岸关系的经验，这使得国民党有机会避免两岸关系的恶化，也应该有能力为已经逐渐冷却的两岸关系制造缓和空间，如果国民党能够积极发挥处理两岸关系的强项，展现其自身优势，势必会为未来的选举加分，为其东山再起补充政治能量。■

航母大科技 (上)

□ 石稼

2019年10月1日，作为辽宁舰航母主战装备的歼-15舰载战斗机亮相国庆70周年大阅兵。舰载机作为航母的刀锋，既是航母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也是航母大科技的集中展现。航母作为现代科技的结晶，是一个国家科技综合实力水平的重要标志，素有“一艘航母就是一座科技城”之称。航母建造因其科技含量高、技术要求复杂、涉及门类众多、科研试制和施工组织难度大等，把一些想建造航母的国家挡在了航母俱乐部的外面。

2007年3月，时任中国国防科工委主任的张云川在参加全国两会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正在研究建造航母的问题，立足于自己制造，并从技术上提出了设计和建造航母必须具备的五大能力——具备大功率计算机辅助工程设计能力、拥有大型试验水池和风洞能力、航母特殊钢制造能力、拥有与航母建造周期相匹配的电子设备和舰载机制造能力。而这五个方面，缺哪一点都玩不转。

对航母的科技化程度，军事专家张召忠有一个形象化的说

法：航母上的一颗铆钉就可换一辆奥迪车。这些被称为天价的铆钉都是用“钛”打造而成。钛是一种稀有金属，在自然界中存在分散并难于提取，其特征为重量轻、强度高、具金属光泽，亦有良好的抗腐蚀能力。由于其稳定的化学性质，良好的耐高温、耐低温、抗强酸、抗强碱，以及高强度、低密度等特点，被美誉为“太空金属”。一个小小的铆钉都需要如此繁琐的制造工艺，航母科技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中国特色的大系统与子系统

从目前已经公开披露的资料看，辽宁舰从空壳拉入大连造船厂到全副武装，如凤凰涅槃般入列中国海军，无论是作战单元武器系统，还是作战平台运转系统，都有着浓重的中国特色，为航母的进一步国产化积累了经验、探索了模式。

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副教授葛立德称：除航母平台这个“外壳”，其他所有的“瓣”都是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试航也由我们自己组织；辽宁舰的前身是前苏

联在乌克兰境内的黑海造船厂建造、由于国家解体而未能完工的“瓦良格”号，当时仅完工约68%，后来又遭到设备拆卸和故意破坏的厄运，只剩下相对完整的船体，没有动力装置，没有雷达、电台、舰炮等任何舰载武器系统，几乎就是一堆破铜烂铁，是靠几艘远洋拖船，费尽周折，才拖到大连海域的。

葛立德还进一步透露：大连造船厂承担了主要的改装工作，安装了全新的舰船动力装置，加装了大型多功能相控阵雷达、通信系统、近程舰空导弹、由小口径多管速射舰炮和火控雷达构成的近程防御武器等完整的舰载武器系统，全面整修加固了飞行甲板，自主设计并安装了舰载机起飞和降落所必需的辅助装置，加装了编队作战指挥系统。

辽宁舰和航母俱乐部中其他国家的航母虽然有个性上的差异，但航母作为现代科技的结晶，就其技术要求和作战功能等共性而言，没有太大本质区别，都是由一个非常庞大、非常复杂的“巨系统”维持运转。这

个“巨系统”需要的关键技术非常多，比如设计技术、舰机适配技术、舰载机技术、弹射技术、拦阻技术、武器技术、动力技术、钢板制造与焊接技术，以及其他配套的各种设施保障技术，等等。这些关键性技术，支撑着航母上大大小小的一级、二级和三级等各级系统。按照不同的功能和任务需求，划分不同系统。

比如，有的就将航母分为六大系统，即：航海系统、航空系统、空勤系统、机库系统、支持系统、自卫系统等。每个系统又包括若干个子系统。

航海系统包括：推进系统、导航系统、通讯系统、运送系统、海上探测系统、损伤控制系统、燃料储存系统、自卫系统等。

航空系统包括：弹射系统、拦阻系统、运送系统、作战人员准备系统、战机升降系统、人员操作系统等。

空勤系统包括：降落辅助系统、救援系统、燃油系统、氧气氮气系统、空中探测系统、停泊控制系统等。

机库系统包括：降落操作系统、甲板控制系统、机库控制系统、车辆操作系统等。

支持系统包括：停泊系统、货物操作系统、清洁系统、人员指挥系统、被动保护系统、弹药

系统、人员工作系统、电器系统、医疗系统、生活服务系统、人员训练系统、淡水生产系统、摄影处理系统、空调系统、人员编制系统、事故伤亡控制系统、润滑系统、人员调制系统等。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大系统和子系统，从性质上看大同小异，但具体到每个子系统和各个单元、零部件，又能感受到航母一些个性与特色。

在辽宁舰从裸装到武装的大事记中，我们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中国特色航母的大系统与子系统。以近程防御系统为例，2010年11月18日，辽宁舰尾部近防武器平台上的近防系统和近防炮已安装，这条信息透露出了辽宁舰近程防御系统的组成。近程防御系统是航母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战时被视为航母最后的“护身符”。

航母作为远洋海战的主要力量，其防御可分为三个区域，即外程防御区、中程防御区和近程防御区。所谓外程防御区，主要由舰载预警机、战斗机及航母本身及其护航舰艇上的中程防空导弹、搜索雷达等系统构成。当预警机和搜索雷达发现入侵目标时，可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变被动为主动，让战斗机和防空导弹进行拦截。

中程防御区主要以近程防空导弹及电子干扰系统为主，近

程防空导弹不能很有效地对低空、高速的反舰导弹进行拦截，而电子干扰系统也无法保证100%的干扰成功率，那就难免会有一些“漏网之鱼”突破前两道防线，这时航母就会完全暴露在敌方可视范围内而可能成为“活靶子”，这样近程防御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早期航母的近程防御系统主要包括100毫米以上对舰舰炮、20—30毫米高射炮及高射机枪。其弱点是：多为人工操作，射速低、精度低、毁伤能力低，不能给航母以有效的保护。之后，近程防空导弹被航母所应用，使航母的防空能力有所提高。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舰导弹的速度越来越快、隐身能力越来越好、自身规避能力越来越强，使防空导弹难以有效防御。于是近程防御系统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国纷纷着手研制新一代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用小口径舰炮发射高速密集炮弹来拦截反舰导弹及战机。美国的“火神”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荷兰的“守门员”近程防御武器系统、俄罗斯“卡什坦”炮弹合一武器系统、西班牙的“梅罗卡”近程防御武器系统等应运而生。

这些近程防御武器的突出特点：



/ 1130 型近防武器系统。

一是精确度高。在实战中，如果反舰导弹突破了外程防御区和中程防御区，那么航母的安危主要落在近程防御系统上了，这就要求近程防御系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精准拦截一切入侵者。例如美国的“火神”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就集跟踪雷达、搜索雷达和火炮于一身，提高了目标指示精度；俄罗斯“卡什坦”炮弹合一武器系统将跟踪雷达放在火炮炮架上，以减少船体其他部位对其影响，进而减少误差。

二是火力密度大。作为航母最后一道防线，其火力密度是十分重要的。射速的提高可以使近程防御武器系统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发射上百发炮弹。俄罗斯“卡什坦”炮弹合一武器系统将2座6管30毫米转管炮进行联装，

最大射速达到每分钟10000发。

三是毁伤力高。随着反舰导弹对航母的威胁不断增加，采用高新技术发展新型小口径弹药增强末端反导能力是发展趋势。为提高弹丸对目标的毁伤能力，国外进行了大量研究，开发了AHEAD弹、3P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等新型弹药，对导弹等空中目标的作战效能大大提高。如俄罗斯“卡什坦”炮弹合一武器系统中的6管30毫米转管炮采用30毫米触发引信高爆榴弹，弹丸命中后虽不能穿透导弹战斗部引发爆炸，但可以利用弹丸碰撞目标的动能和弹内炸药产生的爆炸波以及爆炸的碎片来毁伤目标，使导弹偏离航线。

四是探测跟踪手段先进。如美国Block1B型密集阵系统增加的红外前视仪，提供了可靠

的24小时被动搜索及跟踪能力，具有多光谱探测和跟踪能力，使密集阵系统对掠海飞行的目标有更高的对抗能力，从而提高了密集阵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对空作战能力。

辽宁舰航母装备的1130近防炮和红旗舰空导弹系统，无疑具备各国通用的航母近程防御系统的作战功能。据报道，1130近防炮是中国自行研制的一款11管30MM加特林式速射炮近程防御武器系统，装有11个炮管，2个弹舱。一次能够锁定48或更多个目标，最大火力为每分钟11000发，即每秒约166发。同时配有雷达、红外线追踪系统。这种自动化武器受雷达控制，可以自动向来袭目标射击，这种功能和20世纪70年代开发的美国密集阵系统类似，只要来袭的反舰导弹、飞机和其他武器接近军舰，近防炮就会迅速瞄准并用30毫米口径炮弹将靠近的飞行器击落。1130近防炮除了装备在辽宁舰上作为近程防御系统，也装备在了中国海军各种驱逐舰、护卫舰上，新建造的054A舰就换装了1130型近防武器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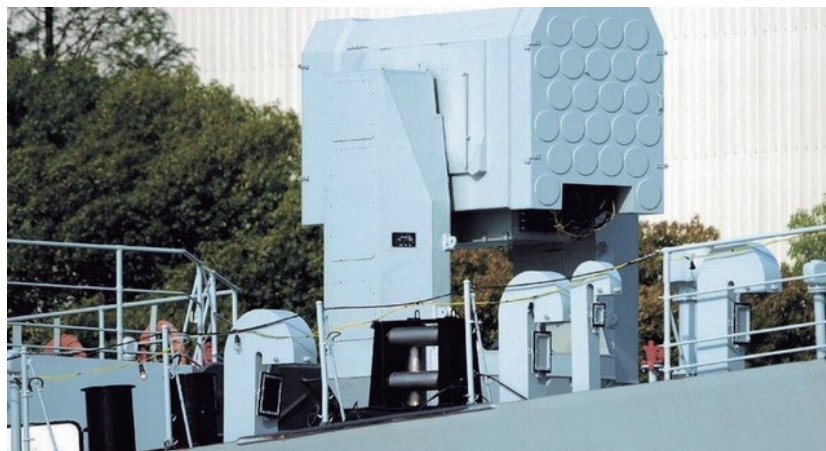
红旗舰空导弹系统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自行研制的舰载近防导弹系统，可有效拦截各种类型的反舰导弹，对付海上、空中和陆地对舰艇发起的饱和攻击。

据报道，辽宁舰装备了4座红旗舰空导弹发射架，每座有18发导弹。红旗舰空导弹系统采用一体化发射架，内含多个导弹发射单元，能在10秒内锁定目标，可以从舰艇和陆上移动装置发射，发射时可单发也可连射。能够在距离海面1.5米至10米的高度上摧毁目标，发射间隔时间不超过3秒。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它能保护军舰免受导弹攻击，还能配合“区域防御系统”使用。

该导弹系统在概念上和“拉姆”高度接近，采用的是被动射频加红外成像复合寻的制导技术，对亚音速和超音速反舰导弹均有很高的拦截概率。该系统刚刚推出时就被网友视为美国拉姆末端反导系统的“山寨版”，被称为各类反舰导弹的“克星”和各类舰艇的护身利剑。

2011年5月10日，“瓦良格”号舰岛前方相控阵雷达安装完毕，11日，舰岛后方相控阵雷达安装完毕。

报道称，辽宁舰共装有4块被称为“中华神盾”的346舰载有源相控阵雷达，4面天线前后左右布置在舰岛上，美国海军的“宙斯盾”还是无源的。346雷达由于采用更为先进的波束体制和信号高速处理系统，外界推测其至少可以探测到400千米处战斗机大小的空中目标，其多目标探测和跟踪能力很强，能有



/ 装备在辽宁舰上的红旗-10 舰空导弹系统。

效应对“饱和攻击”，四阵面的布置方式可以实现360度全方位覆盖。

除此以外，辽宁舰陆续装备的火控雷达、动力系统、舰载机助降装置菲涅尔双棱镜，等等，都既有武器装备本身的基本性能，也体现了中国特色，展现了中国海军的实力和水平。

军事专家、海军装备研究院某研究所研究员侯建军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称：“如果只是建造船壳，我国早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但航母上毕竟还有许多设备和系统是我国首次研制的，在许多方面还处于探索、实践阶段，没有规律和经验可循。”

多少个部门为航母忙碌

中国建造一艘航母需要哪些部门和条件，一直是一个谜。

2017年8月，中船重工董事长、首艘国产航母研制总指挥胡

问鸣在接受央视记者独家专访时给出了答案：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研制工作涉及532家配套单位，其中非军工的社会配套单位达412家，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科研院所甚至高等院校，达到了77.4%，军工单位仅占22.6%，我们国家，军工不是完全靠自己，也靠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国民经济、整个国家工业体系的配套，充分体现了全国协同和军民融合；航空母舰的建造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最高峰时在国产航母上工作的人员超过5000人，而为研制贡献力量的人员更是遍布全国各地，所以航母研制工作本身可以说是融合了全国的力量。

建造航母不仅有国家军工企业的力量，更有来自“非军工”的民间力量，这样的大协同，不仅有效地加快了国家制造和研发能力向重点装备成果的转化。这

些“非军工”的配套单位，也在航母工程的牵引下，实现了自身能力的全面提升。而通过航母工程突破的新技术成果，也将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实现应用。

一般而言，设计制造一艘航母，要经过放样、制造、加工、装配、安装、管线铺设、焊接拼装等很多复杂而繁琐的工序，需要大量精通各个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合作。以美国“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为例，其建造涉及1.6万家企业配合，一艘航母从开工建造到下水，一般需要5—8年的时间。

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工程现场总指挥刘征在接受《法制晚报》采访时表示：“国产航母建造工程量巨大，是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这艘航母的上万套设备涉及国内配套厂家532家，每天有3000人至5000人在航母上工作。”

显然，在胡问鸣、刘征看来，建造航母对中国而言，赢家不仅仅是中国军队，还包括建造航母所涉及的各个工业部门和企业。

航母作为国民经济产业链终端最具综合性的超大型产品，是多技术、多产业的集成与交融，凝结了一个大国几乎所有的

战略产业，体现了其强大的工业水平和能力。

对“瓦良格”号的改建工作，海军装备部的高级工程师莫立新估算：改建航母的工程总量相当于造10艘驱逐舰！如此大的工程，参与人员数量可想而知。

透过媒体公开报道中披露出的一些数字细节，就能强烈地感知到航母参与人员之多。

2013年4月19日，《解放军报》在《中国航母的幕后英雄》报道中，青岛航母码头建设部队的黄毅给出了一组数据：中国首个航母军港5年建成——水、电、气、油等保障设施完备，大型塔吊、万伏高压变电站、能量站、大型储油设施一应俱全。5年里，官兵们先后攻克了超大沉箱预制、水下安装等40多个世界性技术难题，创造了中国码头建设史上一个又一个施工“奇迹”。

该报道还对航母舰载机训练基地情况作了介绍：该基地是我国第一个航母配套工程，从开建到竣工，仅用了5年时间。该基地建设先后攻克37项技术难题，取得21项科研成果，其中7项填补国内空白、1项申请国家专利。据悉，自组建以来，该基地先后完成歼-15战舰阻拦着陆、滑跃起飞、寻舰绕舰飞行、首次着舰起飞等多项试验课目，出动人员10万人次，保障2700多架次飞行，保障优质率、良好率

均达到100%。

这些零星的数据虽然无法拼接出中国航母建设所需部门和人员的准确数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中国航母发展，需要很多很多的部门，需要很多很多的幕后英雄，也需要很多很多默默无闻的人。

发展航母对中国而言不仅仅是军备建设和维护海权，还可以航母建设为龙头，带动航空、动力、冶炼、机械制造、材料、机电、电子等重工业的发展，推动这些产业的转型升级。

正因为如此，通过航母带动军事工业发展，进而辐射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国家发展战略。美国的大型航母建设，可以带动数万家承包商的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而且航母的全寿命使用过程本身，还是一个持续拉动经济发展的过程。

据有关研究，在我国9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和396个行业中，航母产业由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化程度极高，对其中相当多的行业均有带动作用。

与制造航母相比，航母入列后使用、维护、保障等涉及的部门一点不比制造航母少。从世界各国大型航母部门设置看，大同小异，中国也不例外，主要包括行政、航空、安全、航海、作战、

动力、甲板、武器、维修、战斗系统维护等部门。

以美国“尼米兹”级巨型核动力航母为例，主要包括行政、航空、机务、宗教、甲板、牙医、动力、维修管理、医疗、作战、安全、训练、武器等部门，部门以下再设分部，载员达5600余人（包括3200人的军舰人员和2400人的海军航空兵人员）。

美国“小鹰”号航母设有作战、航空、航海、武器、轮机、医务、牙医、供应、安全和飞机中级维修等10个部门，每个部门配部门长和部门长助理各1人，下设若干分队。“小鹰”号上工作人员多达5480人，其中包括舰员2930（军官154人）、航空兵人员2480人（军官320人）、司令部人员70人（军官25人）。舰上配舰长和副舰长各1人，下设10个部门和若干个舰载机联队。

作战部门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组织战备训练、完成指定的情报搜集、鉴别与传送、对空中飞机实施作战控制、进行视觉与电子通信、实施电子战、提供气象与海浪预报等，下设作战训练、情报、通信、电子战、气象等分队，分别由作战官、训练官、情报官、通信官、电子战官、气象官等领导。

航空部门是其中最大的部门，占舰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强。主官是航空部门长，士兵们常常

戏称他为“航空老板”。“航空老板”在舰长的领导下负责保障飞机的起降、吊放、加油、装弹和飞行安全在内的空勤任务，其主要助手是“小老板”——航空部门长助理。航空部门下设行政管理与塔台分队、飞机起吊分队、甲板飞机牵引分队、引降装备操纵分队和加油与装弹分队，由飞行甲板官、飞机弹射官、拦阻官、机库甲板官、航空燃油官、装弹官、飞机起吊官以及行政助理、训练助理等领导。

飞机中级维修部门负责督促和领导舰载机的维修保养工作，保证舰载机联队始终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该部门由4个分队组成，即行政管理分队、飞机中级维修分队、机载设备维护分队和甲板支援设备维护分队，主要人员都是一些经验丰富的飞机维修与保养技术人员，人称“飞机保健医生”。

航海部门负责航母的航海安全与导航以及航海器材的管理与保养。

武器部门负责舰上武器的操作、维护和修理，进行反潜搜索和攻击，保管爆炸物品、导弹和核武器。

轮机部门负责所有推进器和辅机的运行和维修。

安全部门负责实施和协调航母和舰载机联队的安全计划，辖有1个50人的舰上陆战队保安

分队。

医务部门负责医治伤病员，进行卫生、健康讲座、指导战场急救。

牙医部门负责牙科治疗，进行口腔卫生指导，透视照相。

供应部门负责购买、接收、储存和发放物品，进行装备统计、零件修理、分配电影、并向舰上人员供应个人消费品。

另外，“小鹰”号航母上还编有2名随军牧师，负责鼓舞士气。

众所周知，“辽宁”号是从苏联未完工的“瓦良格”号航母改装而来的，前身是俄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2号舰。“库兹涅佐夫”号航母有舰员1300—1360名（军官200人），航空人员600—620名，旗舰指挥人员40名。该航母可载24架战斗/攻击机和6架直升机，那么至少需要飞行员在60人以上。

考虑到长期执行任务的可能性，飞行员的数量可能达到80—100人。如果是发展大型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所需飞行员的数量会更多。如果要发展出2—3艘航母的作战水平，仅仅舰载机飞行员就需要300名以上的储备力量。

从公开报道的数据看，辽宁舰全舰编制舰员1000余人，正师级编制，首批舰员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军官达98%，博

士硕士50余人。

2017年3月20日，“辽宁”号航母编队司令员陈岳琪在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专访时，透露出辽宁舰有2000多人：“一开始运作起来就乱套了，2000多人，一拉铃大家出操，通道都堵住了。”

对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数字，军事专家李杰也给出了一个数字：辽宁舰可搭载20余架固定翼舰载机歼-15，而一般飞行员与飞机的比例是1.5:1。

除了航母本身的人员和部门外，实际上，航母还需要大量的沿海岸基大型港口设施、海外基地与保障点为它提供配套保障与服务。

以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主要航母拥有国为例，航母需要一个战略母港，也就是航母的战略综合保障基地。在基地内，必须有航母靠泊补给休整的码头，还要有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综合补给舰、快速战斗支援舰等系列属舰靠泊的码头。此外，在附近还需要有机场等。

关于中国航母基地建设问题，目前互联网上炒得最多的是中国航母基地建在了三亚和青岛，这样一南一北的两个地方。中国国防部给出的答案是：“航母不是宅男，但不论是不是，总需要有个家。至于基地究竟建在哪里，需要综合考虑当地所处

的地理条件、人文条件、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作战需要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全面考虑。中国航母基地究竟建在哪？大家可以等着瞧。”一句“等着瞧”，让人期待不已。

中国舰载机

航母本身只是一个平台，对敌方进行远程打击的任务，终究还是要落到舰载机上来。

舰载机是以航空母舰作为起飞降落基地的海军飞机的简称。它以航空母舰作为海上浮动机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出去作战，战斗结束后又降落到航空母舰上来。它们在航空母舰上进行加油、装弹、充电、充气、



/ 辽宁舰列装的歼-15战斗机。

检查及维修等。

可以说，舰载机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一支现代化海军打击能力的强弱。没有强大的舰载机部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远洋海军就无从谈起。因此，舰载机是航母战斗力的直接体现，甚至可以说航母的一切作战行动都是围绕舰载机来展开，是航母当之无愧的“核心”。

从公开的资料看，歼-15战斗机作为“辽宁”号舰载机的当家大牌，横空出世后的几次亮相都引起世人关注。2009年8月，歼-15首次试飞成功。2012年11月5日，国防部网站正式发布了中国航母舰载机在航母上起飞的消息。11月25日，又公布航母顺利完成舰载机起降训练的消息，同时发布了飞行员戴明盟驾驶编号为552的歼-15舰载机在航母上的照片，这也是歼-15的照片首次向世人公开。新华网报道说，这表明解放军海军最终掌握了舰载机起降技能，航母和战机已经能够相互协同。

2013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歼-15总设计师孙聪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公开透露：歼-15目前正处于飞行员培训阶段，正在进行小批量生产。

辽宁舰最终选择歼-15作为舰载机是经过多次激烈讨论和论证之后的结果。

歼-15是在歼-11性能改造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初差一点使用歼-10进行改造，原因是歼-10不仅是单座，而且就其重量而言比较适合用来做舰载机，这样在航母上降落和起飞的难度降低很多。但歼-10的缺点是作战半径小，火力不够，如果要经过改装成为合格的舰载机，还需要解决非常繁琐的问题。而歼-11不同于它的单发作战，是双发战斗机，对地面攻击力强。但是由于那时候还没有成功采购苏-33，所以还不敢对它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版。

与意外获得“瓦良格”号一样让人惊喜的是，中国意外从乌克兰取得苏-33战斗机原型机中的一架(T-10K-3)。以该机为基础，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承担了新型战机研制的任务。

据称，为了节省研制时间，中国的歼-15直接沿用了苏-33战机的气动布局。在机体结构和材料方面，则是以苏-33原型机(T-10K-3)为基础(防腐蚀抗冲击结构、折叠翼、起落架等)，集成了歼-11B/BS的研发成果。

为了尽快形成战斗力，歼-15战机采用了与歼-11B/BS水准相同的航电设备，能够基本满足当前及未来数年内中国航母舰载机以夺取海上制空权为主的任务需求，也完全具备

强大的对海打击能力。正是在苏-33的技术支持下，并融合了歼-11B的技术，成功诞生了现在的歼-15。

俄罗斯《晨报》称，尽管歼-15战机外形上与苏-33相似，但是前者实际上有许多改进，特别是在飞机结构方面。

台湾《尖端科技》指出，歼-15融合了苏-33与国产歼-11B战机技术，还大量采用了复合材料，以降低战斗机重量，因而一般预估歼-15的空重、推重比、作战半径、武器载弹量与机动性能，都会优于苏-33。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认为，歼-15不仅在雷达、航电设备、武器方面与苏-33有所差异，发动机也不同，因为歼-15使用国产发动机，并会配备自行研制生产的射程可达400公里以上的鱼鹰-62反舰导弹，对美军航母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

脱胎于歼-11和T-10K-3原型机的歼-15(代号飞鲨，英文为J-15)，为重型舰载战斗机，在代际划分上属于三代机，装配有鸭翼、折叠式机翼，机尾装有着舰尾钩等舰载机特征，起落架强度高，前轮能够迎合类似美国海军舰载战斗机拖曳弹射方式，因为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弹射器起飞的问题。

对歼-15的作战性能，人民网有一段精彩的报道：“歼-15

是中国首代舰载战斗机，攻防能力突出，机动性优秀，对海对地打击能力强，能够发现并摧毁敌方海上大型移动目标。据介绍，歼-15战机配有30毫米机炮，可携带使用超音速反舰导弹、鹰击-62远程反舰导弹、霹雳-8/9近程空空导弹、霹雳-12主动雷达制导远程空空导弹、鹰击-91超音速远程反舰/反辐射导弹、鹰击-8空对舰导弹、KD-88远程空地导弹、飞腾-2型反辐射导弹以及‘雷石’系列制导炸弹等。”

对歼-15舰载机的作战性能，观察家们时常把其与美军航母装备的F/A-18E/F“超级大黄蜂”和印度航母装备的米格-29K作为类比的对象。

歼-15与“超级大黄蜂”，可以说是互有优劣。

“超级大黄蜂”舰载战斗机是美国海军最新型的战斗攻击机，由F-18C/D发展而来，E型为单座，F型双座。这款战机配有先进雷达和电子战系统，人机工程优良，且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配合AIM120导弹，超视距作战能力在第三代战斗机中应该还是比较强的。“超级大黄蜂”的定位是战斗攻击机，就机动性而言不及歼-15，但作为舰载机，其攻击性能比歼-15更强。就航电系统和空对空导弹而言，“超级大黄蜂”战机显然要比中俄

舰载机成熟许多。另外，这种战机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这些优势，能够弥补其机动性的不足。

在机动性能方面，歼-15比“超级大黄蜂”体积大，爬升率、作战高度、作战半径等攸关战机机动性的方面占有优势，如果飞行员技术相当，在空战缠斗当中，歼-15比“超级大黄蜂”战机有优势。但歼-15采用滑跃起降，载重必然会降低，燃料和武器不会满载，这会影响歼-15的实际战斗力。

就航电系统而言，2005年前生产的“超级大黄蜂”采用了APG-73雷达，之后的型号则换装了APG-79有源相控阵雷达。未来美国还准备设计内置式弹仓以提高隐身性能。歼-15继承了苏-33的设计，安装了IRST红外前视系统，称之为“光电雷达”。中国研制AESA有源相控阵雷达技术已被证实，但歼-15在现阶段采用AESA雷达的可能性很低。很明显，在这方面，歼-15落后于“超级大黄蜂”。

歼-15与印度米格-29K相比明显占优。

就机动性而言，歼-15战机所配备的是中国WS-10“太行”涡轮风扇发动机（其水平与俄罗斯的AL-31FN发动机相当），这款发动机的最大推力为132千牛；而米格-29K在换装

新RD-33的3M序列发动机后，其最大推力仅为87.4千牛，远远落在歼-15后面。

就航程而言，歼-15的最大起飞重量为33吨，最大速度为2700公里/小时，最大航程3500公里，最大作战半径是1200公里。米格-29K的最大航程为3000公里，作战半径1000公里。

在航电设备方面，歼-15采用的是基于MIL-STD-1553B双向数据总线的联合式航电系统；与歼-15同系列的歼-11B战斗机已经采用了先进的带综合特征的联合航电系统。米格-29K的航电设备仅仅只是以MIL-STD-1553B双向数据总线为基础。也就是说，歼-15非但不会处于下风，甚至会比米格-29K更加优秀。在武器挂载方面，歼-15为重型机，米格-29K只是一款中型机。歼-15的最大优势之一在于其挂载的灵活性，拥有8个挂点可以挂载重型武器，能挂载单弹重量超过4吨的超重型武器。米格-29K虽然有8个外挂点，但是连一个像样的重载挂点也没有。相关数据显示，米格-29K的载弹量只有歼-15的一半，也就是说米格-29K的战力只是歼-15的一半。

军事专家认为：歼-15作为一款重型舰载机，具备超音速性能优良、滞空巡逻时间长等突

出优势。因此，米格-29K很难打败歼-15。

歼-15战机作为辽宁舰的主力战机，与固定翼预警机、反潜直升机、舰载教练机等舰载机相互配合，形成联合网络作战系统，使中国海军首次在远海建立了完整的空战体系。

外国军事专家预测：未来，中国只要再造两艘与辽宁舰类似的航母，配备歼-15及其改进型舰载机，就足以改变亚太地区海上力量的对比，大幅巩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同时要看到，歼-15只是中国舰载机发展的开端，主要任务是为中国在未来10年内建立一

支随时可用的舰载机作战力量，同时培养出成熟的航母舰载机飞行员。随着歼-20隐形战斗机的发展，未来比歼-15体积小、性能更好的歼击机必然会加入到舰载机行列中来，以应对隐形歼击机时代的来临。

航母上的舰载机自然不止战斗机一种，通常还需要预警机、反潜机和通用直升机等。如果说战斗机是航母的主体，那么预警机就是航母的“关键少数”。1982年马岛战争时，英国海军就是因为没有舰载预警机，难以发现低空来袭目标，因此遭到了不小损失，后来不得不紧急改装预警直升机来应急。

通用型直升机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但却是航母舰载机群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通用直升机担负着搜救、运输、联络等各种杂役性质的二线任务，甚至在必要时还可以担负反潜和对舰攻击的一线作战任务，其中特别是搜救任务更是为舰载机飞行员保驾护航的。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定，只要航母进行舰载机起降作业，就必须先起飞搜救直升机，在航母附近的空中盘旋待命，随时准备救助因为起降作业失败而坠海的飞行员。这个规定如今已经成为各国航母的通行惯例，所以中国海军的国产航母也必然会配备通用直升机。■

我的黄埔情缘 征稿启事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一所黄埔军校承载着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感召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统一自强和民族伟大复兴，前赴后继、继往开来。2024年，黄埔军校即将迎来建校一百周年，为纪念黄埔百年，我会自今年起举办“我的黄埔情缘”征文活动。首届征文活动征稿启事如下：

征稿对象：征稿面向祖国大陆、港澳台海外黄埔同学和黄埔后代亲属，以及与黄埔军校有一定渊源的年轻世代。

稿件要求：文体不限，字数一般掌握在3000字以内。内容可以是我知道的黄埔历史、

我对黄埔军校的印象、我了解的黄埔人物、我心中的黄埔精神，等等。征文设一、二、三等奖及纪念奖。

截稿时间：2020年10月31日

邮寄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赵公口20号 黄埔军校同学会(100075)，信封上请注明“我的黄埔情缘”

电子邮箱：wdhpqy@163.com

联系电话：0086-10-58336360

黄埔军校同学会
2020年5月6日

他们为黄埔前辈画像

□ 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本不相识，却因为父辈（祖父辈）同是黄埔人而走到一起。共同的渊源、共同的标签、共同的兴趣，让他们聚在一起，从陌生到相识，从相识到相知。

为推动北京黄埔工作新局面，建立黄埔后代代表人士队伍，2019年，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先后走访黄埔同学和黄埔后代100多人次，深入20多个社区居委会和黄埔后代企业，进

行实地调研，摸清北京黄埔后代实际情况。在充分征询黄埔后代意愿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黄埔亲友书画兴趣小组、黄埔亲友合唱兴趣小组、黄埔亲友志愿服务小组和《北京黄埔》杂志黄埔亲友特约编委队伍。一年来，先后组织黄埔后代、亲友开展各类活动20多次，黄埔后代志愿者参与看望慰问黄埔老人30多人次。其中书画兴趣小组成员大多是黄埔后代志愿服务小组成员，

他们平时积极参与看望慰问黄埔老人活动，给黄埔老人带去其他同学的信息，以子女般的亲情慰藉黄埔老人。他们根据有关资料和图片为黄埔前辈画的人物肖像，在黄埔老人和黄埔亲友中得到一致好评。

2019年8月29日，由17名黄埔亲友参加的北京市黄埔亲友书画兴趣小组宣告成立。市同学会秘书长陈清在成立仪式上向大家介绍了成立兴趣小组的目



/ 北京市黄埔后代书画兴趣小组成员合影。



/ 认真准备。



/ 精心讲解。



/ 老师为小组同学示范作画。

的、意义，并向大家一一介绍兴趣小组成员，同时希望大家能够在兴趣小组中，认识和结交更多的黄埔亲友，加强同黄

埔亲友之间的联系，更多更好地服务黄埔老人，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促进两岸交流、推进祖国统一贡献力量。大部分

成员在此之前并不认识，但因为同是黄埔后代，都感觉到一种自然的亲近感。

兴趣小组成员有黄埔二代、三代和黄埔亲友，担任兴趣小组老师的王伟新，是黄埔15期生任传振的后代。小组成员多没有接触过绘画，王伟新老师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从培养兴趣开始，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他从画笔的种类与选择、透视关系、色阶等基础知识教起，并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辅导。在王老师的精心辅导下，大家进步非常明显。兴趣小组成员大多已过知天命之年，但是大家对画画充满了兴趣，无论住得多远，每次小组上课、组织活动，都风雨无阻，按时



/ 李筱松为父亲李济深(黄埔军校副校长)画的画像。



/ 鲁小英为曾外祖父徐向前(黄埔1期)画的画像(持像人为鲁小英之母熊陆丰)。



/ 陈淼为父亲陈德法(黄埔1期)画的画像。



/ 宋虹为外祖父李贤(黄埔4期)画的画像。



/ 熊陆丰为外祖母、徐向前之妻黄杰(黄埔6期)画的画像。



/ 宋虹为姨公苏善禧(黄埔6期)画的画像。



/ 张治彩为父亲张子忠(黄埔 17 期)画的画像。



/ 殷大卫为父亲殷显曦(黄埔 21 期)画的画像。



/ 钟亚琴为父亲钟汝轼(黄埔 14 期)画的画像。



/ 方宣宁为父亲方明(黄埔 16 期)画的画像。



/ 单补生为父亲单培新(黄埔 16 期)画的画像。

参加。大家都十分好学，除了积极向王老师请教外，同学之间也经常交流学习心得、互相提出意见建议。每次作业完成后，都有专人负责把每个人的作品拍成图片，发到兴趣小组群里，供大家欣赏、点评。

在2019年最后一堂课上，王伟新老师对大家说：“我们的学习也有一段时间了，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是不是该有个汇报了？”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随后开始热烈讨论：“我们拿什么汇报呢？”小组成员单补生（黄埔16期生单培新之子）提议说：“就画咱们的黄埔前辈吧！”记得早在兴趣小组成立之初，就有同学说：“好好

学习，将来为我们的黄埔前辈画像。”提议好是好，但是大家毕竟才学习了一些素描知识，实际操作也只是画了一些石膏模具、两次人物素描。以现在的水平给前辈画像？大家都纷纷摇头，表示不敢画。王老师支持大家给前辈画像的想法。他不停地给大家鼓劲，建议从对照自己前辈的照片开始。王老师还耐心地给大家讲解如何对照老照片，采取“打格放大画人像”的方法为前辈画像。在王老师的鼓励下，同学们信心倍增，精心选择前辈的照片，投入到为前辈画像的“创作”之中。

市同学会听说兴趣小组要在春节前组织一次作品汇报，并且要以给黄埔前辈画像为内容，很是支持，在第一时间购买了相框，准备用来装裱画像。

课堂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小组成员在课堂上画、在家里画。有的同学每天在微信群里展示进度、交流绘画技巧和体会、征求别人的意见。最忙的当然要数王老师了，每天都有很多同学向他请教，他总是热情地指导并勉励大家。

经过两周时间的努力，在课上课下反复琢磨、反复修改和王老师不断地鼓劲、指导下，同学们为前辈画的画像终于完成了。大家又把所绘人物的简介（姓名、生辰、籍贯、在黄埔军

校学习或任职情况、主要社会经历等）工整地誊写在画纸上，并注明本人与肖像人物的关系，签上本人姓名及完成画作时间，加盖书画印章，整理装框。

2020年1月10日是书画兴趣小组向市同学会汇报成果的日子。这一天，大家早早来到会议室，有序地忙碌着。没有写完人物简历的忙着誊写、没有完成落印的忙着落印。有的裁边、有的撕膜，有的装框、有的拍照，会议室内外一片忙碌景象。

陈清秘书长和同学会的工作人员看了书画小组的作品，给予由衷的赞赏，称赞他们为黄埔前辈画像的主意出得好、作品画得好。

画像里的黄埔前辈英气勃发，无比精神。这些画像是这些刚刚学习画画4个多月的黄埔后代悉心绘就，学员们感到这是自己的黄埔前辈最好看的画像，也为自己能亲手描绘前辈的风采感到由衷的自豪。

汇报非常成功，小组成员围在一起，热烈讨论。大家纷纷表示，自己能学习画画、为前辈画像，首先要感谢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搭建了这个平台，其次要感谢王老师的无私付出、耐心教授，有了他们，才能让黄埔后代们为兴趣而集合、因学习而快乐……

参加书画兴趣小组，除了


收获绘画知识和乐趣之外，还收获了家人般的亲情和温暖。书画兴趣小组成了黄埔亲友温馨的家，在这里，大家除了学习画画，还能经常看到“家里人”，通过他们及时了解黄埔老人的情况。这次成功的“汇报展”之后，大家还约定，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努力地练习，下一步要为北京市所有健在的黄埔老人每人画一幅肖像。

学员感悟：

黄埔14期钟汝轼之女钟亚琴：

这场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惨重的损失，也带来极大的机遇和改变。我们的线上书画课堂正是变革大潮中的一朵美丽的小浪花！市同学会开展的课程有了新花样、新创意，尤其是为纪念黄埔军校成立96周年而进行的学习创作，使我心里很激动，神圣感油然而生，同时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再努力！

黄埔18期方明之女方宣宁：

目前市同学会各小组的活动目的是团结海峡两岸黄埔后代，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活动的过程中，也把我们不少网盲领进了新型的网络课堂。像我这样的老大姐从前只会看看微信，现在也能与时俱进，学会了手机上很多新功能，开阔了视野，跟上了时代步伐！

（执笔：渠敬陶）

我为抗疫献晚晴

□ 黄忠汉

2020年1月，新冠肺炎肆虐武汉。孙春兰副总理率领中央赴湖北指导组走进医院和医务人员住地，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实地了解走访社区疫情防控情况和居民生活状况。全国各地的援鄂抗疫医疗大军奔赴湖北各地。白衣天使大爱无疆、无私忘我的精神令我深受感动。

为了不让疫情扩散，武汉实施了封城措施，三千多个社区以及农业村队全面管控。闭门在家的我眼看疫情造成居民生活难以保障，心急如焚，想为社区做些事情。我找到社区书记，说明了自己的心愿。书记满面笑容对我说：“您是90岁的人了，在家保养好，就是无声的抗疫。”我心中不甘：“战场上没有年龄的限制。我是黄埔军人，爱国家、爱百姓，是军人的信条。救亡图存碧血疆场是黄埔的责任。现在抗疫工作需要人手，我要为战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书记看我态度诚恳，意志坚定，说道：“您

年尊，每天坐班，为我们出出点子操操心，行不行？不要事必躬亲。”这样，我加入了抗击疫情的行列。

我所在的社区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全区396户、一千多人，60岁以上的占70%，其中不能行走的残病老弱占3%。社区封闭期间，购买米、油、盐、药品乃至领退休工资都需社区工作者代劳。居民每天吃菜的问题，也成了社区需要解决的一件大事。我主动承担了买物登记乃至发放到位的工作，将需要发放的物品分给志愿者，由志愿者送到住户家中。居民们对社区的服务给予了广泛的赞誉。

防控期间，社区志愿者舍小家为大家，热心为居民解忧，送菜、送米、送药、送工资，事无巨细，一律承担，深受居民爱戴，为了鼓舞士气，弘扬正能量，我同广大居民写了一封“向志愿者致敬”的感谢信，经社区广播站反复播放，更加激发了广大志

愿者为民服务的热情，也鼓舞了社区居民战胜疫情的信心。

我是一名黄埔军人，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始终牢记，在关键时刻，一定要为民着想，面对困难，冲锋在前。我组织社区共产党员向市防疫指挥部捐款，全社区28名党员共捐了4300元，金额不大情深义重。

在防控疫情期间，我邀请楚天教育电视台来社区采访，并将社区人员为民办实事的事例如实提供。节目播放后，战斗在一线的社区工作者深受鼓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抗疫工作中去。

目前，国内疫情虽有好转，国际疫情依然严峻，我当以爱国之心继续关注世界疫情，与周围同志团结一心，为人民的幸福生活、为建设美好的家园而继续努力。■

（作者为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武汉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常务理事）



罗瑞卿在抗大 (上)

□ 陈宇

抗大办学，是教育长罗瑞卿作为“军事教育大家”的光辉实践，也是他军事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页。他把他的黄埔经历与抗大教育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他用赤诚肝胆、满腔热血将功名写进抗大创业时期那段最艰苦也是最辉煌的岁月。他的军事教育成就与抗大伟绩共存。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亲自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说：“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黄埔——抗大，成就了罗瑞卿跨越两校的传奇人生。



/ 罗瑞卿。

教育长与“一窑元始天尊”

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有两所著名军校的大门照片成为了历史经典，在当年更是最为靓丽的招生“名片”：一张是当年由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国共合作建成的黄埔军校，大门上方的大字是校名“陆军军官学校”，门前两侧有对联“升官

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这张“名片”召集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国民革命精英；还有一张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抗大”，大门上方的大字是校名“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门后两侧是校训“团结

紧张，严肃活泼”，这张“名片”凝聚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儿女的抗日先锋军。罗瑞卿与这两所军校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罗瑞卿出生在川东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母亲从有预产征兆到把他生下来，经历了8天

时间。出生时，他的脐带像一条“武装带”披挂在身上，乡亲们惊讶地谈论这男娃将来是一个“武夫”。此话只说对一半，后来的他既习文，也尚武。家境殷实的罗家，送他读私塾、高级小学、中学。在报考黄埔军校时，罗瑞卿立志既要做一名好学生，也要做一名好军人；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加入红军，并成为中共最高军事学府的“教师爷”，文武兼备。

1921年，罗瑞卿就读于南充中学。在这里，他受到老校长、著名民主革命家张澜先生办学风格和进步思想的深刻影响，并与张澜之子结为好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一次，罗瑞卿见到来北京的张澜，历数自己担任闽西红军教导队教员、红军大学教员和抗大教员，皆有老校长培养之功时，毛泽东接过话题，称之为“青出于蓝，又寓于红”，妙语贴切而精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这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党中央决定以原红军学校、大学为基础，在陕北开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长县交口召开。毛泽东在题为《目前形势与



1936年5月，苏区党代会在延安召开，罗瑞卿（左三）与杨尚昆（左四）、聂荣臻（左一）等合影。

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他的战略部署是以创办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进而发展为面向全国的大学校，为抗日战争培养

干部。

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村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具体研究创建“高些的、大的”抗日红军大学问题。提出要吧抗日红军大学建设成像黄埔军校一样在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学校。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办抗日



1937年4月，朱德（前排左四）、罗荣桓（后排左七）与罗瑞卿（前排左三）、莫文骅（前排左一）、刘亚楼（前排左二）、张爱萍（后排左二）、苏振华（后排左八）等红军大学第1期第1科留延安工作的学员合影。

“红大”，就要像“黄埔”一样完成革命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说：办学校最重要的是选择校长、教育长和教员。红一军团作风雷厉风行，很能打仗，中央决定校长就由林彪来担任。教育长是负责做具体领导

工作的，十分重要。我们要选择一个像黄埔邓演达那样精明强干、雷厉风行的干部。罗瑞卿的演讲非常具有号召力，颇像邓演达，他是担任教育长的最佳人选。就这样，毛泽东特别“钦点”了林彪、罗瑞卿，分别担任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校长和教育长。

对于红军军事教育的重要性，担任过红军教导队政治教员、师政委、军政委的罗瑞卿自然很清楚。但是，他这时的心思不在办学上。多年后，他回顾

说：“红军到达陕北后，打了几个胜仗。刚好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我们都在想着到前方带兵打仗，突然说去当‘教师爷’，我没这个思想准备。”

毛泽东亲自约谈罗瑞卿，语重心长地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黄埔军校，它在国民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黄埔的学生是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成功领导了北伐战争。但到现在，革命任务还没完成呀！我们的红大就是要继承黄埔精神，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成为主导力量，继续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并对罗瑞卿说：“你与林彪都是黄埔弟子，这个学校你们不去办，谁去办？”

仅仅10天后的6月1日，陕甘苏区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现子长县城）米粮山上的旧庙堂前，红旗招展，歌声震天，“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第1期开学典礼在这里举行。庙堂前的空地上临时堆起一个土台，放上一张长桌，摆了几条木凳，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四周墙上贴着各色标语，整个典礼显得简朴、隆重、庄严。

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讲道：“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

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要我们艰苦奋斗。”一切从头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建校之初，校本部和第1、第2科的工作人员共有14人，专职教员仅3人。红大面临的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学生不果腹，学校无教师，更谈不上教学设备与设施。

红大校领导既是创建人、管理者，也是学生，但他们的职级都很高。毛泽东出任政委，亲自领导创建工作；校领导成员还有林彪、周恩来、刘伯承等。罗瑞卿在这几位领导的关心下，迈开了建校办学的步伐。

红大学员的职级也很高。红大第1期分为3个科，第1科共40人，红军名将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委。学员大都是红军师级以上干部，有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刘亚楼、陈光、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杨成武、谭政、周建屏、彭加伦、王平、耿飏、刘惠农、许建国、苏振华、张纯清、张树才、张经武、张达志、宋裕和、赵尔陆、贺晋年、郭述申、黄永胜、谭冠三、张文彬、杨立三、邓富连、刘鹏、吴富善、罗保连、贾力夫、莫文骅、符竹庭、童小鹏、肖文玖，还有朝鲜籍的武亭和越南籍的洪水，都是身经百战的著名战将。

罗瑞卿一身兼三职，他既是管理者——教育长，又是教育

者——教员，还是学习者——第1科学员。像他这样既是学校行政领导，又是普通学员的还有很多。命令一宣布，罗荣桓真诚地对罗瑞卿说：“教育长，你是我的领导……”话未说完，罗瑞卿说：“我首先是第1科学员，你首先是我的领导！”消息传出，毛泽东说：“红军里只有岗位不同，没有高下之分，大罗、小罗很团结啊！”

从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县做出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决定，到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具体研究创建红大，再到6月1日红大正式开学，前后只有23天，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的开办速度。

7月3日，国民党军第86师一部突袭瓦窑堡。鉴于瓦窑堡只有少量警卫部队，无力坚守，红大随党中央机关及军委各部撤出瓦窑堡，于7月11日迁往陕北的一个偏僻小县保安（今志丹县城）。红大移驻保安途中，路过保安县城外的一片破烂石窟，走在前面的罗瑞卿突然叫停，他在仔细观察了山坡上的十几孔黑黝黝的窑洞后，决断地说：“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开课。”校本部和第1科学员先以这座山崖上的荒山野洞为校舍，后到的第二、第三科暂时借住在1公里外的县城内。

保安县城很小，没有多少

空闲的房子，突然间来了这么多人，学员住宿成了大问题，第2、第3科领导找罗瑞卿诉苦。罗瑞卿和第1科的领导遍寻所住破窑洞不远处的荒山，发现山坡的石壁上高高矮矮地露出几十个蜂窝似的洞口，原来是几十孔已经废弃很久的旧石窑，周围稀稀拉拉地长着几丛酸枣树。一座倒塌多半的石窑旁边的石壁上，“元始天尊”几个字依稀可见。当地百姓传说这些石洞是供奉“元始天尊”的，但具体是哪个朝代开凿的，已无从考证，也没有人记得是否有人居住过。洞口边缘都已经风化剥落，洞内外积存着厚厚的羊粪、腐草和野狼吃剩的兽骨，人走进去，迎面乱飞出一群蝙蝠。近山根有两孔窑洞的洞口横七竖八地支了一些树枝木棍，已经成为附近老乡的临时羊圈。

罗瑞卿动员老乡把羊群迁走后，号召大家自己动手清理石洞和修路。兴高采烈的学员们把窑顶已经剥落的石渣清除掉，把窑洞内清扫洗刷干净，在窑洞口用石块垒上墙和门洞，再买来一些木料做成门。罗瑞卿选最大的一所石洞用作教室，抹上黑板，砌上石讲台，搭起石桌，搬来石凳。在用作寝室的比较小的石洞里垒上石炕，割茅草编成厚厚的草门帘挂在洞口挡风，并在窑洞之间平整好

道路。最后，挂上“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校牌。就这样，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以石窑为课堂和寝室、以石头砖块为桌椅、以石壁为黑板的大学校舍落成了。石洞里光线不好，就开设露天课堂，大家一起漫谈、讨论。

罗瑞卿在两年后的《抗大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回顾说：“学校第1期物质上的苦况，那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们没有必要的校舍，只有经过学生自己的劳动修补起来的几个破窑洞；他们没有任何教学设施，几块砖凑成的四方形台子，便是学生们学习的座位；学生们自己的两个膝盖，成为他们做笔记的唯一活动书桌。”

正式开学时，毛泽东在林彪、罗瑞卿的陪同下，参观了教室和宿舍。他拍了拍罗瑞卿的肩膀，表扬说：“你这个‘监工’不错。教育长嘛，理应保证教学设施齐全。”

毛泽东看着石窑里的全部教学设施，幽默地说：“你们走的是石头路，用的是石头桌，坐的是石头凳，写的是石黑板，住的是石洞，真成了石器时代的人了。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对红大全体学员和教职员工提要

求，打趣地说：“古人云，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你们要成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

仅几个月后的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随着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进入一个全面抗战的新阶段，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保安“洞中大学”的红大第1期学员200多人纷纷“下山”，担负起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罗瑞卿作为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工作组成员，赴西安折冲国共关系。在争取国内和平、组织对日抗战的关键时刻，红大第1期学员、教员发挥了重大作用。

红大的这一历史阶段，后来被称为“石窑办学”时期。学员被毛泽东称为“元始天尊的弟子”，朱德总司令则高兴地称之为“一窑元始天尊”。这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学校培养的第一批正式学员，成为党和军队的中坚力量。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授予元帅和将军军衔。

发布抗大招生简章

为适应红军直接对日作战，193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电令“中国人民抗日红军

大学”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或“抗大”。1月20日，校址由保安移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时间紧迫，红大的第2期即转为抗大的第1期，这也就是“红大无2期，抗大无1期”说法的由来。

抗大校部迁到延安清凉山下后，校长仍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由于学员数量的增加和学校的扩大，为加强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和建设工作。

3月2日，抗大举行第2期开学典礼。毛泽东亲临大会并讲话，勉励全校学员、教职员特别是知识青年努力改造思想，献身于抗战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事业。

红大第1期的学员主要是红一方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干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抗大第2期学员除了红一方面军生源，又增加了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国民党军的一些进步军官、进步亲属，以及全国各地来延安的青年学生。学员由第1期300余人增加到第2期的14个队1362人。其中，红军干部学员共753人。红一方面军的代表有陈赓、杨得志、姬鹏飞、胡



/ 红军时期，罗瑞卿(后排左一)与聂荣臻(后排左二)、左权(后排左三)、朱瑞(前排左一)等合影。

耀邦等；红二方面军的代表有余秋里等；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有许世友、倪志亮、王维舟、王建安、陈再道、洪学智、詹才芳等；女红军干部代表有贺子珍、康克清、蹇先润(蹇先任)、蹇先佛、李坚贞等。国民党军的一些高级进步军官，多数来自杨虎城和张学良部队。国民党将领家庭的青年中，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赵寿山师长的儿子赵元杰、女儿赵元炳。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日益提高，延安和抗大吸引了越来越多抗日爱国青年的关注，想

来抗大上学的人越来越多。针对询问学校情况的来信，罗瑞卿指示校部秘书逐一复信说明。不久，来信太多了，已经不可能每封都回复。罗瑞卿想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便召集宣传科长谢汉文、俱乐部主任谭冠三和干事陈鹤桥等，指示设计和印制抗大的招生简章，登载校歌、校风、校训和学校学习的课程。以后外地再有来信，除特殊情况仍需回复外，即寄一份招生简章。

罗瑞卿特别指示粉刷了原延安府衙门的校部大门口两旁墙壁，从警卫连找了两名身材魁

梧、长相英俊的战士在校门口站岗，再请来延安城里最好的照相师傅，拍摄了那张流传至今的抗大校门的照片。

校名“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和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皆出自毛泽东特别推荐的时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的舒同之手。舒同在长征路上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他是“标语口号”的拟定者，也常把“红色标语”写在乡村山寨的墙壁上。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很多爱国青年学生希望能报效祖国，准备参加国民政府组织的战地服务团。但赶到南京、武汉、重庆后，看到报名处冷冷清清，管事的人先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因为没有担保就不能报名。青年学生的满腔抗战热情得不到应有的回应，这让他们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延安与国统区和沦陷区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平等、民主气氛，以及“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使这座远在西北一隅的边陲小城，虽然物资匮乏，条件艰苦，却成为广大爱国青年一致向往的地方。抗大也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着众多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朝圣”般地涌来。每天，抗大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上百名新学员。为此，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还把培

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抗大招生简章，号召凡有志献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强健，无不良嗜好、暗疾的热血青年投考。

所有报名抗大的青年学生先到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接待室，接受初步的政审和身体考核。接待室房间一般都很小，房间里摆着一张桌子、几个凳子，两边的墙上悬挂着标语，青年学生们在此排队接受初步考核。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的工作报告中，有关“新生投考资格”一项这样写道：“来历清楚，有救亡团体或负责人介绍者”方可投考延安的各类学校。

为了顾及国共合作的大局，抗大对于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现役军人，或在国民党各级党政机关任职的官员及政治面貌、社会关系复杂、来意不纯者恕不接收。但也有例外，如陈慕华是国民党空军司令陈栖霞的侄女，她手持国民党空军介绍函、坐着小汽车来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工作人员见此情况，不知如何是好，立即请示伍云甫处长。伍云甫考虑到其叔叔支持国共合作，且在抗战中与我军协同作战，便立即批准陈慕华去抗大学习。

教员，是学校之根本。没

有教员办不成学校，有了教员，吸引不住人才，同样也建不成学校。当时，延安物质生活极其艰苦，除基本粮食供应外，每人每天只有3分钱菜金，只能吃水煮白菜。罗瑞卿找到供给部长杨立三想办法，对教员每月补贴2斤大米，最后发展到10斤，有时还能配发1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到了1938年，还给学员每月发1元津贴，而外来的专家可以补贴到10元。罗瑞卿强调：当领导，先当好后勤部长。他对教职员工的关心不仅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还吸引了知名学者艾思奇、薛暮桥等知名人士积极投身教学工作。

对习惯于指挥打仗的红军老干部们来说，办教育，一开始并不是人人都想得通的。他们更想到前线去，真刀实枪地同日军战斗。罗瑞卿起初也多少有这种想法。毛泽东针对这些老干部和教员不安心在抗大从事教育的问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活着在抗大教书，死了埋在清凉山。”话说得很明白，即要老老实实地在延安办学教书，哪里也别想去。毛泽东的教导，很快打通了大家的思想。罗瑞卿也坚定了献身教育的决心，并以身作则，用“死了埋在清凉山”的精神办学，以“活着干、死了算”的英雄气概，战胜了一切困难。（未完待续）

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

——记百岁黄埔老人、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夏世铎

□ 李攀

“期颐眉寿寿长春，满堂欢笑祝椿龄。”2020年4月21日，阳光明媚的午后。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姚素妹受会领导的委托，带着机关干部上门为我会理事夏世铎祝贺百岁寿辰。人逢喜事精神爽，当天，身着红色外套的夏老看上去格外精神，谈笑间依然儒雅有度，他思路清晰地为我们讲述满腔热血报考军校、舍生忘死参加抗战、赤诚丹心促进统一的往事……

难忘军校生活

1939年，抗战烽火燃遍整个中国。那时，正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夏世铎，亲眼目睹日军肆意轰炸，同胞血肉横飞、无家可归的惨状，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毅然投笔从戎，报考空军军官学校。夏老记得当时主持口试的负责人是黄埔1期毕业的王叔铭（时任空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处长），听到他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便问道：“你很年轻，来考空军，父母赞成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不分男女老幼，我有抗日之志，父母不赞成，但

也阻止不了我。”

1940年4月14日，是17期1总队开学典礼的日子，夏老记忆犹新。教育长陈继承亲自主持开幕式并训话，素有革命传统的血花剧社还为他们演出了话剧。在军校的两年生活中，除了日复一日严苛艰苦的训练，他还积极参加文艺活动，结识了同在一个总队受训的同学——夏天（原名夏克平，1920年出生于上海，演员，代表作品有《一江春水向东流》《羊城暗哨》《林则徐》等）。

1940年6月，成都校本部北校场举行庆祝校庆16周年大会。教育长陈继承、政治部主任邓文仪等出席大会。15期、16期、17期1总队学生全体参加。17期1总队表演了反映东北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敌的话剧《东北一角》。剧中女主角是一个东北的农村姑娘，因痛恨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愤而参加游击队，成为一名抗日战士。由于当时学校没有女生，经过一番推选，女主角最终由夏世铎饰演。他的真情表演感染了台下的学生，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收复失地”等爱国口

号，声音久久不能平息。夏天平时文质彬彬，一派书卷气，但在剧中扮演反派人物却活灵活现，把汉奸奴颜媚骨的形象展现得入木三分，引得观众纷纷高喊“该打！”不久后，他们又合作演出了话剧《在春熙路上》，揭露抗战时期一些不法奸商不顾人民疾苦，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的丑恶行径。在剧中，夏世铎再次男扮女装，饰演夏天的妹妹，通过这次合作，他和夏天的友情更加深厚了。

1942年4月14日，17期1总队举行毕业典礼。毕业后，希望去抗战最前线的夏世铎未能如愿，被分配至18期1总队炮2队担任少尉助教，协助区队长教授火炮（日式三八式野炮）操作。留校任教期间，有两件事给夏老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来军校参观，他所在的中队奉命表演步炮兵协同作战。演习场上，机枪声阵阵，炮火声隆隆，俨然就是一个真实战场。威尔基参观后深表赞赏，声称成都军校和美国西点军校可以相媲美。还有一次，美国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来到军校摄制

炮兵训练的纪录片。“那时我奉命指挥炮2队学生进行炮兵连运动队形变换的操练，看到有人在拍摄，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面貌更不一样了，浑身都是劲，这种经历多么的难得！”说到这里，他还特地提高了声音。教学工作中，他还善于探索和创新，军校在他的建议下分别设计建成了—个炮兵室内设计场、室外小型炮兵射击场和小型取法教练场。“这三个项目虽然花费不多，但十分有利于改进教学效果，为此得到了赞赏和表扬。”夏老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满脸自豪。

投身抗战洪流

1944年7月，夏世铎在陆军大学参谋班学习期满。由于他的学习成绩较好，班主任陆权中将原本安排他在参谋班任上尉教育副官。但他一心想上前线，婉言谢绝后随即填写了加入71军赴滇西前线作战的志愿。结果愿望又一次落空，他被分配到重庆最高统帅部的后方勤务部任参谋。分配名单公布后，后勤部部长俞飞鹏亲自接见他们并训话，鼓励他们做好后勤工作。当时，心有不甘的夏世铎情绪有些失落和激动，说道：“我报考军校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前线杀敌，留在后方不是我的志愿。”俞飞鹏听后顿时瞪大眼睛，注视着他，严肃地说：“前方和后方同样是

作战，只是任务不同，你的文化程度不错，在后勤部当参谋很适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必须服从分配！”

到参谋处报到，经副参谋长兼处长冯环中将面试合格后，他奉命负责第六、八两个战区的作战补给工作。当时，这两个战区的中国军队有几十万，与日军战斗频繁，枪炮、弹药、医疗器材等作战物资的补给任务十分繁重，必须紧密配合战区作战部署，稍有贻误都将影响前方战局。在后方勤务部工作时期，夏世铎完成前方作战补给任务达十多次。工作量最大的一次是1944年11月的黔桂战役。“当时日军在占领桂林、柳州后，以部分兵力进犯黔桂边境。11月下旬，日军相继攻占了独山、荔波、三都、丹寨等县，并有攻占贵阳、遵义等地之势，企图威胁重庆，情况十分危急，后方勤务部也进入紧急战斗准备。”

夏老对战斗的细节记得格外清楚，“当时我主要负责黔桂战区的作战补给工作”。当日军进攻贵州之际，重庆最高统帅部已急调汤恩伯赶赴贵州担任前敌总指挥，并调孙元良、张雪中、牟廷芳率部入黔抗击日军。当时集结贵州的中国军队已有15万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率部自广西撤退到贵州。同时，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0集团军

总司令杨森也率领几个军转移到贵州。为使这些部队能及时得到充足的枪支弹药、医卫粮秣等作战物资的补给，夏世铎与另一个参谋——黄埔14期毕业的杨铸九常常彻夜不眠，废寝忘食地坚守在电话电报机旁，听取战况汇报和前方急需供给作战军用物资的要求，及时拟出相应的作战补给计划，呈送部长、参谋长核批后，转送各有关单位和部门执行。由于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后勤补给任务，他被擢升为上尉参谋。

致力祖国统一

当年，一个个像夏世铎这样的热血青年抱着“救亡图存”的信念云集革命的黄埔，用青春和热血生动诠释了黄埔精神的真谛，谱写了一曲为国赴难的壮丽诗篇。如今，在改革开放、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又满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信念，将全部的光和热投入到促进两岸交流、增进同胞情谊、增强民族认同的工作中去，用“润物无声”的奉献精神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198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社会各界强烈反响。那时，已年逾花甲的夏老负责民进上海市委宣传部的的工作。有一天，他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对全市黄



/ 1985年3月,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长汪道涵(前排右五)会见出席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大会的全体代表。夏世铎位于第三排右四。

埔同学进行一次走访调查。酷暑难当也阻止不了他筹备成立同学会的迫切心情。他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逐一上门了解情况。有些同学的地址不清楚或已经发生了变动,他就去派出所沟通核实。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他便邀请17期同学许鼎和18期同学杨今等一起参加调查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他们共走访了几十位黄埔同学。每到一家,见到黄埔同学后,那种一见如故的同窗情、校友情油然而生。更令人感动的是,受访同学大多饱经沧桑、历经坎坷,但他们在言谈中,都绝口不谈生活上的困难,而是热切期盼上海也能成立同学会。访

问工作结束后,他立即写出一份《关于上海黄埔同学现况的调查报告》。不久,佳音传来,上级部门批准成立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1985年3月19日,包括沪、浙、闽在内的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出席并会见全体理事。党和政府对同学会的重视和关怀,令参会理事感到振奋和鼓舞。

“你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所处的境地,所有联系的亲友、同学,这方面你们有个很优越的条件,是别人不能得到的。你们可以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很好地去做这些工作。”邓颖超在黄埔

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一席话,一直激励着夏老为“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而奉献全部的光和热。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了200余篇文章,并著有《吴若安传》《李楚材传》《桑榆墨韵》《盛年不重来》等。在夏老的家里,至今存放着一叠叠略显泛黄的手稿,里面讲述了他的故事,也倾注着他的心血。每逢重要时间节点,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纪念座谈会邀请夏老发言,他都是欣然应允。有时为了写一篇发言稿,他要花上几天时间查阅资料。“年纪大了,有些时间和人名已经记得不



/ 2014年10月,夏世铎在东华大学进行爱国主义宣讲。



/ 2015年7月,夏世铎(左三发言者)为华裔大学生讲述抗战历史活动。

太清楚了,既然让我发言,就要做到每一个细节都确认无误。”夏老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感染着我们,让我们不由地赞叹: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他身体力行,走进校园与青年一代分享报考军校、参加抗战

的亲身经历,让抗战精神、黄埔精神滋养更多的青年人。2015年适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月,夏老应邀出席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市青年联合会、复旦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抗战英雄为华裔大学

生讲述抗战历史”活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近80位华裔青年座谈交流。“这些在海外出生的华裔青年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史实、中国军民为抗击日本侵略所付出的惨重代价等知之甚少。”夏老不无感叹,“有生之年,我做的最有意义的,就是像这样讲故事,分享我的人生经历,让更多的青年人对抗战历史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到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也让他们更珍视当下和平发展的环境,增进民族认同,携手开创未来。”

他积极奔走,广泛联系海内外黄埔同学和亲友后代,让黄埔情缘成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天然纽带。“60多年前,我在黄埔军校18、19期任教,有不少同学和学生后来去了台湾。这几年他们多次来信邀请我去台湾相聚。在我走得动的时候,我一定要去一次,既是为了了却心愿,也是为了促进祖国统一、联络同学感情。马上就能见到阔别60多年的同学和学生,心情太激动了!”2007年11月,夏老第一次踏上美丽宝岛。飞机上,他时不时拉开遮光板,面朝夕阳俯瞰余晖映射下的台湾海峡,心中想着:尽管两岸相隔几十年,可是我们两岸同胞的心却始终连在一起。有人想把两岸关系割断,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 2019年3月,上海市委常委郑钢淼亲切慰问夏世铎(左)。



/ 上海市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姚素妹(右)和机关干部为夏世铎(中)祝寿。

是永远办不到的!到台湾后,夏老顾不上旅途劳累,每到一处,就立即打电话联系黄埔同学,接待前来看望他的同学和朋友。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晚上,台北喜相逢大饭店见证了一场情谊浓浓的师生宴。台湾陆军官校19期同学会何通俊会长请夏老“训话”,言辞间充满了对老师的恭敬。席

间,大家深情回忆起当年在军校朝夕相处的时光,异常珍惜这份亲如手足的黄埔情缘,互送亲人般的美好祝福,言语间也流露出对祖国统一大业的炽热期盼。“今天,历史赋予我们两岸黄埔同学的神圣使命,就是要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继续发扬黄埔精神,坚决反对‘台独’,

共同努力奋斗,为祖国统一作贡献。”夏老难掩激动的心情,说出了两岸黄埔人共同的心声。随着年事渐高,夏老再次踏上宝岛的心愿未能实现。但每年新年前夕,他会如约为在台湾的同学、学生和友人寄上贺卡,一张小小的贺卡,寄托的是祝福、思念和亲人般的牵挂。夏老始终相信:一日同窗,终生不弃。经年岁月的风尘,尽管一点点地冲淡了黄埔同学昔日的辉煌,但从不曾削弱“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波涛翻滚的海峡,尽管一年年分离了本为一体的黄埔人,却分不开“天下黄埔是一家”的黄埔情。

“一个大门分两扇,进进出出一家人。一道海峡连两岸,世世代代血脉连。”两岸同根同源,这种血脉纽带是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断的,黄埔精神也是海峡两岸黄埔人抹不去的生命痕迹。今天,黄埔同学和亲属后代在黄埔精神的感召下并肩携手,将传承和发扬黄埔精神作为己任,共同讲述“两岸一家亲,黄埔一家人”的生动故事,共同承担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使命。“让‘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代代传承,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出更加光彩绚丽的篇章。”这是夏老一生的追求。如今,百岁的他仍行走在追梦路上……

黄埔老兵陈生华

□ 张丽琴 蒲元

陈生华，1922年出生于陕西乾县梁村镇的一个普通农家。6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教其识字，聪慧的陈生华一年多就可以一知半解地看《岳飞全传》《薛仁贵征东》和《三国演义》等书籍。后来，他从乾县高小毕业考入省立邠州师范学校。

弃笔从戎投身黄埔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陕西，三秦儿女愤怒了！正在师范学校读书的陈生华和同学们一起，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入街头巷尾，呼喊抗日救亡口号，高唱《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群情激昂中，心系祖国命运的陈生华萌发了参军的想法。

1940年初的一天，陈生华在报纸上看到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招生的消息，兴奋不已。不料，陈生华投考黄埔的想法，首先遭到学校范校长的反对，理由是他还没有毕业，其实是欣赏这位质朴好学的弟子，不希望他走上生死难测的战场。在家中，亲属们也是一边倒地不同意，他们的理由就直接得多——陈生华是



/ 陈生华。

独子。在那个十分讲究家里要有男丁顶门立户的年代，独子对于农家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刚刚18岁的陈生华意志坚决，最终，校长和教史地课程的文老师被他的报国情怀所感动，反而帮着他去做父母的工作。校长还表示，就算陈生华考上黄埔投身军旅，将来依然会给他发毕业证，这是老师对学生最大的嘉许。

陈生华与大约300人一起参加了招生考试。最先考的是语文，作文题目大意是“你为什么投考军校”。由于常常读报刊上的抗日文章，特别是在西安省立

二中曾经听过林伯渠作的抗战问题报告，印象颇深。于是，陈生华就把林伯渠演讲的一些内容，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结合自己的想法一气呵成地写了下来，40分钟的考试时间只用了多一半就交了个头卷。当时他没有注意，自己的答卷被考场的一位军官仔细浏览。考后不久，有人找到陈生华，领他见到了那位军官。这时他才知道，对方原来是军校政治部主任王超凡（黄埔4期）。王主任满意地说：“你的作文我看了，不错。就算你考不上，我想办法也要把你收上。”也不

知是真的考上了，还是有上级的关照，总之，陈生华如愿成为黄埔军校第七分校18期学员。后来，他的考试作文还发表在军校校刊《王曲》杂志上。

陈生华在军校就读于第22总队第3队步科。教学内容包括军事学科、军事术科、政治教育、普通学科等。其中，军事学科含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陆军礼节等课程。陈生华比较感兴趣的还有空军教范，主要学如何与空军联络，给空军布设信号等。军事术科含野外勤务、地形地物识别、单兵攻防、敌火下运动、射击、战斗队形、器械操等课程。政治教育含三民主义、总理遗教、军人武德等课程及相关文化活动。普通学科主要是英文、数学和理化。

当时学员的食物供应量是每人每天13两玉米面。由于室外操练课程多、消耗大，陈生华通常吃不饱。学校管理很严格，有时犯了错误会被打耳光，打的时候既不能躲闪，更不能对抗。

坚守潼关苦中作乐

1944年，陈生华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2营9连3排任少尉排长，团长周寰（黄埔6期）。

早在1937年秋，日军就进犯了山西，随后占领晋陕之间的重



/ 潼关城墙外战壕里的中国军人。

要渡口——风陵渡，并对一河之隔的陕西潼关发动猛烈空袭和炮击。为守住陕西的东大门，中国军队驻防潼关，修筑工事防御日军偷渡，还与日军隔河展开炮战。直至抗战胜利，日军未能西进一步，河防作战功不可没。

陈生华所部就承担着潼关一带的河防任务，他带领士兵驻扎在县城以东的三河口，担任防守北面日军侵犯黄河和警戒治安的任务。由于日军经常炮击，陈生华带领部队一面不断修整工事加强掩体，一面日夜监视黄河，防备敌军偷渡。其间，日军曾组织过数次小规模偷渡，均被防守严密的守军以机枪击退。敌船在黄河里转圈圈过不来，这被陈生华比喻为“下饺子”，大概是因为饺子最后会被吃掉吧。

组织训练也是排长的职责，

科班出身的陈生华原本对训练颇有经验。但由于师里常克扣军饷，士兵生活艰苦，加上许多士兵患病，所以大家整日里没精打采，导致训练难以展开。这让陈生华一度相当苦恼。

一天夜里，部队在黄河滩边挖筑阵地时，突然发现很多小煤块，真是意外之喜。陈生华率部把挖出来的煤块洗净挑到镇上卖，一次就得到120多元。他用这笔“巨款”买了几百斤麦面，蒸成杠子馍，让全排士兵不限量放开吃。此后，陈生华命每个班抽出一名老兵专门找煤。到了晚上，除警戒人员外，全排去挖煤运煤。半个月的时间，排里已有存洋1000多元。消息传开，他被称为陈财神。

这年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陈生华到黄河防线查哨，发现



/ 作者(左)采访陈生华(右)。



/ 作者在潼关河防碉堡遗址留影。

涨水后河滩上有鱼，他紧急集合部队捞鱼，同时规定凌晨5点必须撤离。日军似乎察觉到对岸有动静，天边刚刚泛白就连续发射炮弹，但此时陈生华他们已全部撤走。看到打在河滩上的炮弹，陈生华又让人返回去把炮弹破片捡来卖了250元。至于捞到的几百条鱼，也卖了不少钱。从此以后，陈生华又有了一

个新绰号——龙王。

因为“生财有道”，伙食办得有声有色，陈生华很快被所在的9连选为生活主任。中秋节，他买了一头肥牛、一头重180多斤的肥猪，还买了15包月饼、3担果品和各种蔬菜，让全连将士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度过了一个难得的丰盛节日。陈生华有钱但不浪费，在他的精心安排下，

士兵们吃得饱吃得好，患病的逐渐少了，为连里开展军事训练工作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这年秋天，全团组织军训比赛。副师长和参谋长为考官，师部军官监考、记分。考试分学科和术科，经过3天考试、2天阅卷，在参赛的60多个排中，陈生华带领的排位居第一。而他自己，也在100多位军官参加的个人比赛项目中拔得头筹。师团领导亲自颁奖，给他颁发了一枚模范排长奖章，一支金星水笔，并记大功一次。

血战晋南身负重伤

军训获奖后不久，陈生华随第3团渡过黄河前往山西第二战区，先后在运城、侯马、临汾等地与日寇交战。此间，陈生华还见过丁玲带领的八路军战地文工团宣传抗日、搭台演戏、发动群众，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11月中旬，第3团奉调临汾以南、侯马以东的冀城，9连被派往401高地防守。陈生华随部队急行军刚抵达目的地，工事还没修好，日军就已经发动进攻。日军先用飞机和火炮猛轰，然后一窝蜂地冲了上来。全连共打退日军4次进攻，但自己伤亡也很惨重。更不幸的是，连长被敌炮弹击伤，肠子外流。陈生华临危受命代理连长指挥全连。他一

面安排急救连长，一面重新部署，并派人向团部求援。正当此时，日军攻上了高地，双方展开肉搏战。陈生华身边的战友一一倒下，最后仅余10人。就在日军再次围逼过来的千钧一发之际，营长带援兵赶到，击退敌军，暂时守住了阵地。大家刚想松口气，日军炮兵又发动袭击。数枚炮弹在陈生华周围落下，他倒在血泊中。团长命令卫生队长不惜代价抢救。经过简单处理，陈生华被紧急转送到陕西华岳庙后方医院。

经检查，陈生华全身负伤10余处，其中受伤最严重的是眼部和大腿。一块小弹片打进他的眼角挨着鼻梁骨的地方，几乎贴着眼球，不取出来恐伤及眼睛，但这种精细的手术整个医院无人能做。右腿根部的伤情也异常严重，其中一处弹片距离生殖器官只有1厘米。医院条件简陋，没有任何止痛药剂，他疼得泪水直流。更糟糕的是，由于伤口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伤势恶化，医院认为必须锯掉右腿，否则生命难保。陈生华坚决不准，并拔出手枪拼死抗争。

情急之下，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军、师、团部各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很简单：“请救我性命。”孰料第二天清晨，军部就派高级军官来到医院。军官了解情况后，命令院长必须保住陈

生华5天性命，然后便匆匆离去。直到第三天上午，他带着3名医生和手术药品又回到医院，原来是去西安搬救兵了。接下来的手术中，医生从陈生华身上取出大小弹片18枚，其中两枚大如银元。但眼角的那枚小弹片即使是西安的大夫也不敢取，好在没有发炎，便一直留在那里。术后的陈生华治疗了将近1个月，才可以拄单拐下地活动，但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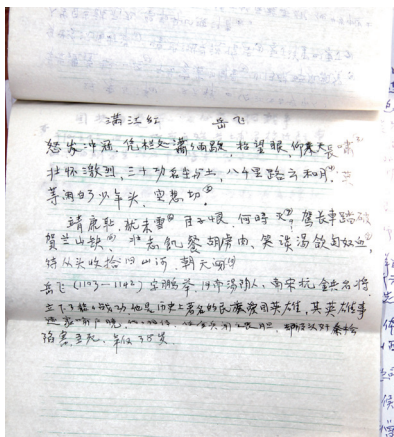
住院的日子里，陈生华接到好几封家信，家里还来了人，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家里还有30亩地，这次重伤侥幸没死，希望能够退役回乡。经此一劫，以后还能否留在部队，陈生华心里也确实在打鼓。正在这时，团长来请他吃饭，还拿出了很少见的白兰地酒。团长说：“国难当头，外寇入侵，半壁河山陷敌之手，人民处于水火之中，大丈夫值此境遇，是否应挺身而出，救国救民？”陈生华答道：“是！”团长又说：“我知道，你家人叫你回去结婚成家；你的老师还请你到他学校任军训教员，工资不少。我很珍惜你，抢先一步来见你。如你愿意，我准备今天就带你回团，升任9连连长，连里的官兵也都欢迎你。何去何从，你决定吧。”陈生华略略思考，表示愿追随团长，为国效力，两人端起酒一饮而尽。

返回部队后，陈生华成为一同分到第1军的40多名同学中首个当上中尉连长的。此时的9连因伤亡较大，已经调返陕西整训。后来师部成立了军事队，陈生华被任命为兵器教官。1945年初，他晋升为上尉。3月，陈生华随师开赴贵州赤水整训，并接受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检阅。

黄埔同学八旬入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很快，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开始，陈生华的心里感到非常迷茫，也越来越厌恶战争。1947年3月，在部队向延安发动进攻前夕，已经是少校营长的陈生华借口旧伤复发，毅然辞去职务退出军界，在西安暂住下来。

1948年6月，陈生华巧遇黄埔同学薛天明。谈起时局，两人都是连连叹气，后来，薛天明提起了共产党，陈生华流露出好感和好奇。两人越谈越投机，最后，薛天明提出可以设法联系共产党，甚至到延安去，陈生华欣然同意。没想到几天后，薛天明竟然真的拿到了某位高级干部所写的推荐信。两人手持推荐信到了陕西韩城的延安大学分校，经过审查批准后入学，陈生华被分到第2部。在这里，陈生华接触并了解了共产党，觉得跟着共产党才能实现自己当初报考黄埔时



/ 陈生华手书岳飞《满江红》。

救国救民的抱负。就这样，他萌发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先后3次递交入党申请书。

后来，陈生华经人介绍和教师吴美珍结婚。一年后，俩人被分配到宝鸡专署工作。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陈生华又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久，陈生华夫妇响应“当农民也是干革命”的号召，申请回乾县务农。

改革开放后，陈生华夫妇在家里养奶牛、栽果树，供养儿女上学。1984年6月，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徐向前元帅为首任会长。消息传到偏僻的乾县梁村镇，陈生华异常激动。1986年2月24日，他加入了西安黄埔军校同学会，后来还担任了乾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陈生华有不少校友在台湾，他先后向海外黄埔校友去信40余封，其中和袁朴、罗立本、蒋希瑶书信来

往最多。袁朴曾任第七分校办公厅主任，罗立本在台湾升至上将“总参谋长”，一贯反对“台独”。除了叙旧，回忆军校生涯外，陈生华在信中还介绍大陆改革开放的变化，呼吁他们回来看看，多为两岸和平统一出力。2008年，陈生华被评为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先进会员。

陈生华在当地逐渐成了名人。一方面，他读过师范，念过黄埔，打过鬼子，当过营长，上过延安，还当过干部，在当时的西北农村，这样的人不多。另一方面，陈生华急公好义、古道热肠，周围邻里有了矛盾纠纷，他去调解；村上修水塔，他和儿子捐了800元（当年，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后来村上修水泥路，已是八旬老翁的陈生华套上牛车给工地义务运送沙土，得到群众和施工队连声赞叹。

陈生华受乾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邀请，多次为当地中小学生义务演讲。一次，与关工委领导聊天，陈生华不经意说起入党的事。后者问他现在还想不想入党，陈生华说：“咋不想，共产党现在带着乡亲奔小康，好得很，怕就怕自己太老了，人家不要。”对方哈哈大笑，鼓励他继续写申请，还说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回家以后，陈生华便动笔写了申请书，还附了一份10多页的自传材料，交给梁村镇

老干支部。算起来，这是他60年间的第5份申请书。这次递交后很快有了动静，不久他就被邀请参加支部活动。2009年七一前夕，陈生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成为一个不小的新闻。在入党宣誓仪式上，陈生华——这位87岁的抗战老兵，举起右手郑重地说：“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半生的愿望。

2014年12月，黄埔老兵陈生华在家乡安详离世，享年92岁。

一转眼，陈生华去世已经6年多了，我的手机里仍存着他的手机号码。我曾4次到他家中拜访，他总是很自豪地对邻居说：“省城的少校来看我了。”如今，老人已去，但那一幕幕恍如昨日。在他家里，这位鲐背之年的老兵，向我们讲述他传奇曲折的抗战经历，展示他抄录的岳飞的《满江红》、丘逢甲的《春愁》和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在谈及钓鱼岛、靖国神社和慰安妇问题时，他还一脸严肃地说：“要是日本再来侵略，我还能打！”语如金石掷地，闻之铿锵有声！

最难忘却的是，他拉着我的手去摸他眼角留存的日军炮弹残片时，我怕碰疼他，手有些哆嗦，他却笑笑：“没事，只不过是一个铁疤疤（小铁疙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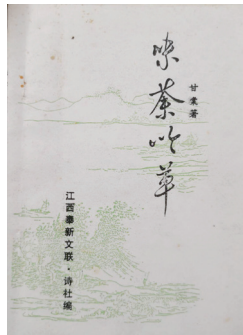
老兵不逝，浩气长存！

百年心迹证丹砂 斗雪寒梅耐岁华

——读祖父甘棠诗词旧作有感

□ 甘小晶

记忆中的祖父身型瘦弱，为人谦和、举止儒雅。就是这么一位看上去极为普通的老人，却参加过北伐、抗日、解放战争，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一生。祖父生前很少和我们提及他的戎马生涯和艰难岁月，当离开这个世界时，却只留下一本记录自己心路历程的诗集——《味茶吟草》。今天，我重读祖父的《味茶吟草》，在诗句中寻找祖父的足迹，追忆老人平凡而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并作此文表达对祖父的缅怀之情。



/ 甘棠所著诗集《味茶吟草》。

祖父甘棠，原名甘朝瑞，1910年7月出生在江西省奉新县。从小聪颖好学。据他回忆，“7岁由父课读，在启蒙阶段，于诸子百家，无不广泛涉猎”。少年在其外祖父胡莘农先生创立的稻云楼经馆研读。面对国家“频年祸结与兵连，盈野盈城几万（选自《忆军阀混战》）”的悲惨现状，少年的甘朝瑞心中充满愤懑，挥笔写下“何时宝剑出风尘，俯仰乾坤倍怆神。最是版图多破裂，治安有策向谁陈？（选自《感怀》）”。1925年，甘朝瑞15岁，他谨记其外祖父“吾不望汝成为惜玉怜香贾宝玉之人，吾只望汝成为投笔从戎立功异域班定远式之男子汉”的期望，怀着一腔报国救民的青春热血和崇高理想，进入广州大沙头第三军官学校步兵科学习。祖父当时的诗作记录了他离家从军时的心情：



/ 甘棠参加省参事室组织的调研活动留影。

离家苦况

（一）

平畴风送野花香，驿舍青青近夕阳。
天宇纵宽云路窄，故园虽好稻梁荒。
一帆春水辞家远，二月黄鹂绕树忙。
莫怨少孤为客早，还期投笔戍边疆。

（二）

孤苦初离骨肉亲，一灯如豆困愁城。
照人肝胆凭谁识，对月情怀共汝明。

战乱频仍鸡犬尽，征徭繁重死生轻。

寒风彻夜呼号急，似替民间诉不平。

1926年，16岁的甘朝瑞参加北伐战争，历任见习参谋、宣传科员、战地工作人员。他记录了当时的满腔激情：

北伐进军江西军次草山率成一律

负隅顽寇嵇天讨，枕畔龙泉夜夜鸣。

敢望功名垂竹帛，惟期水火拯苍生。

霜凝铠甲寒仍重，气奋风云垒悉平。

放眼九州一囊括，战无不胜岳家兵。

18岁，甘朝瑞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炮兵科学学习。这段光荣岁月成为祖父一生重大的转折点。

投考黄埔军校赋言志诗两律

(一)

远游粤海学兵戎，立志疆场耀武功。

漫道痴顽童子气，敢追英勇党人风。

一枝秃笔终何用，十载寒窗负素衷。

但使长缨能假我，此身合是万夫雄。

(二)

笔走龙蛇亦枉然，书生乌足以擎天。

文章救国徒虚语，铁血兴邦正茂年。

滚滚江流来继往，茫茫人海后争先。

旌旗如画帆如织，黄埔风光分外妍。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祖父曾经是瞿秋白的学生。瞿秋白牺牲后，他用诗词表达了心中巨大的悲痛和对先生无比的崇敬：

悼念瞿秋白先生

听课羊城忆昔时，重瞻风采痛陈尸。

恩仇敌友难争辩，后世千秋自有知。

杀身不灭英雄气，怒目道张国土魂。

读罢遗篇私堕泪，是非功罪有公论。

这一系列诗词表达了祖父从一介书生转变为报国军人的心路历程。在此后的求学、军务、农作、参政的岁月里，祖父遇事每有感悟，即诉诸笔端，赋成辞句，以抒胸怀。

1931年，21岁的祖父从南京军校高级班毕业，任陆军第9师司令部上尉参谋、炮兵营营副。抗日战争时期，祖父担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机要室上校组长，转战福建、江西、陕西、贵州等地。以下诗篇表达了祖父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

战我军奋起抗日初战告捷纪之以诗

秋风辽沈久沉沦，又见东南起战尘。

幸喜旌旗扬我武，早将焦土厉斯民。

纵横勾践八千士，慷慨田横五百人。

颈血沸腾思一溅，鸿毛宁比泰山轻。

1928年日寇造成济南惨案愤慨之余，率成两律

(一)

誓扫胡尘卫我疆，岂容日寇肆猖狂。

国仇不报生何益，血债成堆定要偿。

尝胆卧薪终雪耻，厉兵秣马必平羌。

有兹七尺顽躯在，决与倭奴一较量。

(二)

快效前驱杀倭奴，愿吾同志莫踌躇。

国仇未复心难死，大厦将倾奋起扶。

忍见齐东沦浩劫，岂容异类占名都。

头颅掷去沙场上，胜似庸庸作懦夫。

抗战胜利后，祖父在国民党军队从事作战训练参谋和后勤工作。他越来越看不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厌恶政界的争权夺利，痛恨军官之间的尔虞我诈。1949年11月，祖父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取得联系，由贵州晴隆出发，率领一个拥有美制裁重汽车48辆的加强车队和两个武装兵连，星夜兼程到达昆明，参加卢汉部队起义，受到刘伯承元帅的接见和表彰。后来，祖父在人民解放军二野4兵团担任文化教员等职。1950年5月1日，入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随后分配返赣。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同志鼓励他返乡务农，积极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祖父有感于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流逝，以诗抒怀：

五十生日书怀

(一)

生无足贵死无奇，已误黄金少壮时。
晚景幸承红叶荫，清流难洗白圭疵。
闭门待赎歧途罪，读史常怀没世悲。
五十年来回首处，南柯旧梦太迷离。

(二)

垂老心情万念空，但期红色九州同。
道真未必无多助，众富方知不独穷。
且喜儿曹能树立，深知群众是英雄。
田头垅畔春常在，笑语相亲爱老农。

“文革”期间，祖父受到冲击。大字报贴满了床头，但祖父脸上从没有流露出丝毫怨气，甚至和蔼地嘱咐正在打闹嬉戏的我们不要调皮弄破了大字报。年幼的孩子不懂事，有时对着大字报大声朗读。如果念对了上面的字，祖父还会点头称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父的历史问题得到解决。1981年，他当选奉新县政协委员。1986年，被任命为江西省人民政府终身参事。祖父的脸上有了越来越多的笑容。这是，我们才知道到祖父原来是这样一个人了！但是，祖父在我们面前依然不愿多谈他的过去。我们追着他问时，他总是摆摆手，神色凝重。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参加北伐时，战马都比我人高，我拼尽力气才能爬上马背。那时还不到17岁，多少人在我身边倒下，能活到今天，我是幸运的！”祖父的话带给我深深的震撼。

重获新生的祖父欣逢祖国盛世，陆续创作了许多诗作：

终于可以发表的诗

(一)

瓜田李下妄猜疑，三字沉冤信可悲。
莫善独身劳传训，幸存完卵慰生离。
睽睽众目焉无视，渺渺余怀自有知。
起义归诚何所事？寻求真理是心期！



/ 甘棠(右)参加省两会,作者前去看望并合影。

(二)

五岳踏遍愿岂赊，但期璞玉更无瑕。
天崩地塌惊奇变，水秀山清哭有涯。
廿载行藏留洁白，百年心迹证丹砂。
灵魂深处应无疚，斗雪寒梅耐岁华。

寄赠省参事室同人

抱膝长吟日，老年独处时。
我身非我有，天意只天知。
风雨千番梦，河梁五字诗。
同仁皆挚友，肝胆复奚疑。

祖父曾经在南昌求学，时隔60年后，他到南昌参加江西省政协会议，并来到我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居然发现这就是他早年的旧居。回忆60年的沧桑，祖父和我都百感交集。



/ 1993年，甘棠（左四）夫妇与后辈合影。



/ 甘棠与曾孙合影。

重过南昌旧居有感

久历风霜鬓未丝，蓝桥旧梦记依稀。
千家巷口春如故，孺子亭前月照谁？
预识虎头非贵相，又伤鸳侣阻归期。
两华离合成陈迹，历史难书第二碑。
祖父当选省政府参事后，经常到全省各处考

察调研，还到了他曾经参加北伐和抗日的战场。他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欣然提笔记下：

德安小憩感事

昔年抗战此淹留，南渡长贻赵宋羞。
今日卫星腾宇宙，百花争艳不知秋。

祖父有很多亲友旧部在台湾，他积极参与对台工作，为祖国统一事业尽绵薄之力。他还撰写了不少珍贵的文史资料，受到奉新县委、县政府的多次表彰。我们都为祖父感到骄傲和自豪。

祖父的表弟廖绵浚是台湾著名的水土保持专家，他发明的“廖氏山边沟技术”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推广到世界各国。两人少年时代就有非常深的感情，因战争离乱，兄弟俩一别数十年。上世纪80年代末，廖先生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将号称水土保持神草的“百喜草”种子带到江西。兄弟俩也得以重逢相聚。当晚，祖父兴奋地赋诗两首：

喜晤廖绵浚表弟

（一）

当年抗战走西秦，惜别依依夜话亲。
庾岭梅花传言早，渭城杨柳寄情深。
倚闾已负慈亲望，报本常怀故国心。
难得蜚声联合国，传经送宝有斯人。

（二）

屈指分离五十年，故园重聚两安然。
真诚坦率情如昨，富裕繁荣别有天。
邻舍欢腾迎远客，弟兄团聚展吟笺。
台澎骨肉炎黄胄，统一中华共着鞭。

2003年1月1日，祖父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享年93岁。在他的一生中，始终矢志不移地为国家统一和民族昌盛贡献力量。至今，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我眼前。作为后人，缅怀他最好的方式，便是重读他的诗作，认真审视自己能否像他那样，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听父亲讲抗战

□ 王大高

2016年12月1日凌晨3时，我的父亲王昆岭于永济市蒲州镇花园村家中与世长辞。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来自北京、西安、太原等地的有关领导、朋友和花园村村民为他送行。山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长路支前宣读了徐向前元帅长子、解放军某部中将徐小岩从北京发来的唁电。唁电中写道：“王昆岭同志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并竭其一生为国家建设事业奋斗不息，堪称后人楷模。王昆岭同志身上体现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远大理想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父亲过去很少向我们提及他在抗战期间的经历，直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2005、2015年，两次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后，他才打开了话匣子，讲述他的抗战故事。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年事已高，对眼前的事常有遗忘，但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他却是如数家珍。讲到激昂时，站起来挥舞拳头；讲到悲愤时，几度哽咽。他讲得最



/ 2015年9月4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播放的王昆岭行军礼的特写镜头。

多的是当时的战事和他的战友，很少讲到自己。只有当我们问及时，才讲一点。在此，我把父亲讲述的内容和他生前写的自传，整理成文，作为对他的怀念。

千里投军

蒲州王家曾是名门望族。先祖王凤三是前清举人，在京城为官。因在家休养期间，帮助黄河沿岸灾民为减赋与当地官府抗争而受到民众拥戴，并被当地村民立碑纪念，人称“王举人碑”。后因社会动乱，家道衰落。父亲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四，幼时聪颖好学。因家中人多地少，13岁时，经表兄任万青介绍，只

身渡过黄河到陕西省平民县（现为大荔县）第一高小敲钟打杂，半工半读。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人群情激愤，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抗日组织。平民县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18岁的父亲担任宣传干事。1938年，时任52军军长关麟征秘书的王伯珍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回家探亲，当地召开欢迎会并请他演讲。父亲参与了欢迎活动的发动和组织。欢迎会上，王伯珍讲了日军的暴行，讲了抗日战场的惨烈，还讲了关麟征将军决心以身报国、誓死抗日的英雄情怀。父亲听了十分感动，热血沸腾，立即找到王伯珍要求



/ 2010年,王昆岭向王大高讲述抗战经历。



/ 2015年9月,山西省在太原市文化宫举办山西抗战老兵《民族脊梁》摄影展,在王昆岭的照片前,抗战老兵行军礼致敬。

投军参战。得到应允后,与王伯珍的兄长一起踏上征程。他们先到河南,得知52军经徐州会战后已划归第六战区,开赴江西瑞昌作战。父亲赶到汉口,遇见由前线往来运送伤员的汽车,随车来到阳新找到部队。当时,关麟

征因台儿庄会战有功刚升为32军团军团长。父亲由秘书引见给关麟征。面谈后,关麟征说:“这小老乡,又没打过仗,就留在司令部吧!”随即手令父亲任军团司令部参谋处准尉司书,负责文书信件整理。因军训刻苦,工

作认真负责,性情耿直忠诚,又写得一手好字,父亲很得关将军赏识。不久,调任关将军上尉侍从副官,执行关将军外出开会和检阅部队期间的外勤任务。之后被保送到贵州遵义参加译电员培训了3个月,回来后成为关将军的机要秘书。后来又担任了司令部少校参谋。先后随关将军参加了武汉会战、湘北会战、长沙会战、文山保卫战、远征军第一方面军赴越南对日作战等战役。

参加武汉会战

父亲参军后,立即随关麟征将军投入了对日作战。当时,关麟征将军正指挥3个军与由九江向武汉进攻的日军展开激战。在瑞昌、阳新之间,日军第9、27两个师团日夜轮流猛攻,均被击溃,部队坚守40多天,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但52军伤亡极为惨重,奉命撤至湖南补充整训,其余部队由第五战区汤恩伯部接防。后来我部又在金牛镇构筑预备阵地,与日军激战10余日,掩护汉口军政和民众安全撤退,汉口失守,武汉会战结束。

父亲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当时不到19岁,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但作为司书,在记录关将军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也切身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可以说,我开始真正认识到什么是战

争，什么叫你死我活。说实话，刚开始也有些害怕，但受战争气氛的感染，恐惧之心日渐消除，最后只想着怎么抗击日寇，收复失地。关将军渊博的学识、豪爽的性格，尤其是他临危不惧、有勇有谋的大将风度让我十分钦佩，加之他对我的信任和关怀，使我下定了决心要追随他报效祖国。”

参战长沙

父亲第一次直接上前线作战是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开始的长沙会战，是二战在欧洲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势。当时的关麟征已升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划归薛岳任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开赴湘北参战。第52军作为主力军驻守新墙河一带，与驻守长安桥一带的79军、驻守湘阴一带的37军共同负责对岳阳方面侵华日军的防御。

秋日的湘江上战云密布。9月中旬，日军抽调第6、32、106师团主力等共约10多万人，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

在湘北方面，集结在岳阳地区的日军第6师团与奈良支队，约5万余人，从9月18日开始向新墙河北岸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我52军奋力抗击。23日，日军在

炮兵、航空兵协同下，八次强渡新墙河未果后，施放毒气瓦斯，再次强渡新墙河。52军损失惨重。25日，52军奉命向汨罗江南岸转移。27日，第九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调集6个师的兵力在福临铺设伏，重创日军。29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分在石门痕再次遭到伏击。30日，我军又向驻守永安、上杉、石门痕的日军发起猛烈反攻。10月1日，日军开始撤退，我军连续追击，收复了汨罗、新市等处。14日，双方回复战前状态。第一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时人称之为“湘南北大捷”。

此次战役中，日军集中了10万兵力，伤亡达2万人，未达到歼灭第九战区第15集团军的目的，反而遭到我军有力阻击、侧击，损失惨重，匆匆撤退，士气大挫。

从战前布防、构筑工事、演练，到战后休整总结，父亲追随关将军参与了长沙会战全过程，经受了战火的考验。父亲回忆，历时40多天，他和关将军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安心饭。阵地前，战士们互相用刺刀理发；机关枪枪管打红了，战士就尿泡尿给它降温；负重伤的战士疼痛难忍，就向自己开枪……许许多多这样的场景让他永生难忘。其间，52军防线曾被日军击破，我军一部被日军包

围，通讯中断，失去联系。关将军十分着急，便让父亲带领一支小分队去寻找。父亲穿过日军防线，找到我方驻军。了解到战斗十分激烈，阵地几次失而复得，我军伤亡过半，急需增援。父亲只身再回闯日军防线，步行一天一夜，深夜返回我方防区。途中因实在走不动了，就摸进一座庙宇内，推开土炕上睡着的一排国军说：“挤一挤，让我也睡一会儿。”天快亮时，父亲被冻醒，一看炕上炕下全是国军士兵的尸体。父亲起身返回司令部，向关将军汇报前方战况。关将军立即派兵迂回增援，接应前方部队突围。后来，父亲多次说：“我是真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入滇御敌

1940年，关麟征率54军开往广西柳州划归第四战区归张发奎指挥。当时，日军已占领越南，除切断我方越南方向的国际补给线外，还企图由越南向云南进攻。父亲所在部队组建远征军第一方面军奉命经柳州、桂林、昆仑关，日夜兼程地由广西开赴云南滇越铁路以南的八寨、马关、麻栗坡一带，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有效地抵御了北犯日军。司令部驻扎云南文山。

父亲还和我说起过当时发生的两件事。一是他们长途跋涉到昆明后，由当地政府安排住

宿。第二天，日军飞机对昆明进行轮番轰炸，有一颗炮弹恰好落在父亲的床上，但幸好没有爆炸，父亲幸免于难。当地政府赔了父亲60块钱补偿损失。二是，一位蒙古商人敬佩关将军的抗日功绩，赠送了两匹蒙古战马给关将军。父亲曾指着关将军骑马的照片对我说，另一匹由关将军指定由我乘骑，两匹马都由我管。关将军对这两匹马非常喜爱，每匹马每天还要喝一桶茶。

一块银元

在文山驻扎后期的一天，第9集团军特务营副营长护送一位在越南向中方投降的日军少校到司令部。关将军指令交由父亲接收并与父亲同住一屋。当时日语翻译十分缺乏，这位反战少校帮助我方做了很多工作。父亲和他同吃同住，关系十分友好。相处期间，他教父亲学日语，父亲教他学汉语，关将军还请他俩吃过一顿饭。1个多月后，美军得知这位少校曾在南海一座小岛上服过役。这座小岛上有日军一个很大的军火库，但地形复杂，十分隐秘，美军飞机几次轰炸都未见成效，便向我方提出将这位少校移交他们。临别前，父亲与少校依依不舍，互赠礼物。少校拿出自己仅有的一块日本银元送给了父亲。后来，他们失去了联系。“文革”期间，抄家之风



一元面值的日本银元。

盛行，父亲忍痛将在军队时期的衣物和照片销毁，但始终珍藏着这块银元。上世纪80年代，一位日本的记者得知此事，提出用一部日本相机换这块银元，被父亲婉拒。父亲说，这块银元使我认识到，日本不仅有侵略者，也有反侵略者，也有帮助中国抗日的好人。两国人民都希望和平。

黄埔铸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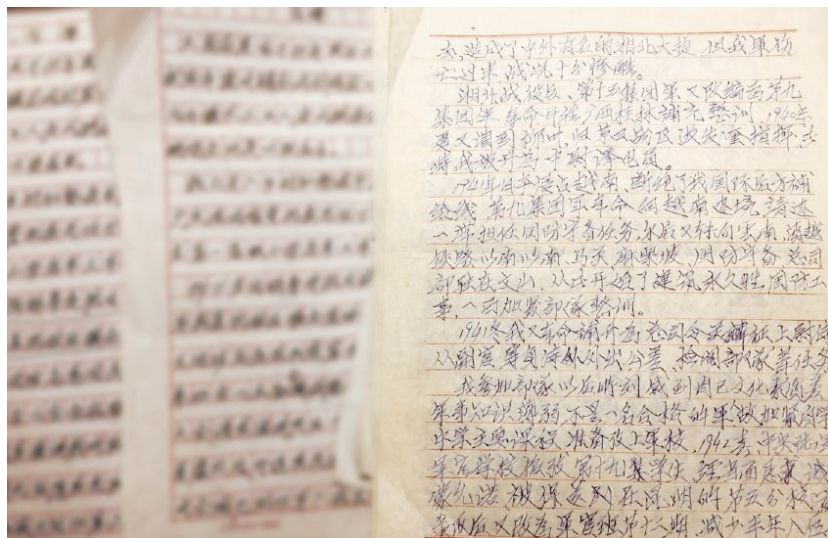
上世纪50年代，父亲在自传中讲道：“我参加部队以后，时刻感到自己文化素质差，军事知识薄弱，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故抓紧自学中学主要课程，准备上军校。1942年，黄埔军校招考第19期学生，我向关将军恳求离开部队去应考，承蒙允诺，并被录取。”关将军还出面保送父亲到黄埔军校五分校（设在昆明）军官训练班第12期学习。因学员都是部队保送来的军官，故免去了半年的入伍军训，直接进行了地形学、通讯学、攻防战、野外勤务、多兵种指挥学、班排连团训练科目等。教官除了中方教官外，还有不少美籍教官。

在校期间，父亲还参与了由教官李希杰主持的《测图实施计划草案》一书的编写工作，并担任第27小组副测手。父亲的同期同学中，既有国民党党员，也有共产党党员，学员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父亲坚定的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就是在这里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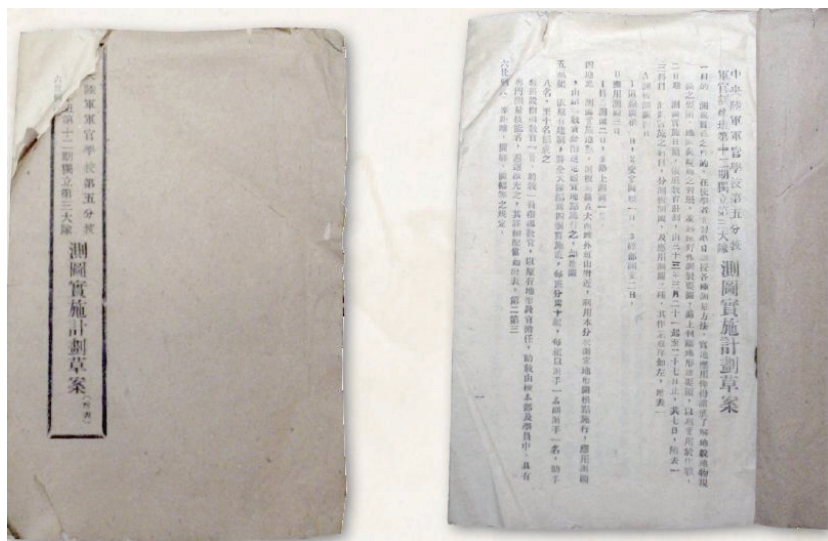
2009年，我到云南昆明参加有关活动，参观了曾是黄埔军校五分校的“讲武堂”。在现场与父亲通电话时，父亲兴奋地告诉我，大门对面的高台是长官训话的地方；左手一排小楼是教室，他在第一个教室的第二个窗户下就座；右手一排小楼是宿舍；学校后面是武器库和学员吃饭、洗澡的地方；学校对面是翠湖，是学员课余时间散步的地方；沿惠通路向西，惠通寺是当时集团军司令部的驻扎地，不远处的惠通旅社当年是关麟征的住宅……听着电话那头父亲兴奋、自豪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他一身戎装，正和一群黄埔学子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我走来。

战友情谊

父亲晚年时，十分怀念曾经在抗日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经常说起，有些战士牺牲时连姓名、籍贯都不知道。父亲当时从军时是从陕西去的，改革开放后，香港、台湾的黄埔同学曾多



/ 王昆岭的自传手稿。



/ 王昆岭在黄埔军校时期参与编写的《测图实施计划草案》。

次到陕西找他。后来知道他是山西永济人，便直接找到父亲当时所在单位普救寺管理处。

和父亲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关麟征将军的女婿，在香港政府消防局供职的柯大澍先生。他们互相通信十多年，从未间断，直至柯先生逝世。2005年，我率绛州鼓乐

团赴新加坡演出。途径香港时，受父亲之托，到香港九龙新围街柯先生家中拜访。柯先生及夫人非常激动，热情招待，并赠送了不少东西让我捎给父亲。柯先生满怀深情地说：“你父亲救过我两次。一次是我工作失误，关将军要重罚。你父亲说情，我才被免了重罚，调出司令部到部队

当了团长。另一次是我在部队生病住院，急需一种特效药，但凑不够买药的钱。恰在这时，你父亲准备请假到城外看我，得知情况后，赶到医院，拿出自己刚发的全部薪水和临走时关将军让从账房支出的一些钱，买到了药，治好了我的病。在当时，那可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我回家后，对父亲转述这些事。父亲说，第一件事，他记得清楚。第二件事，他早忘了，这次一说他才又想起来。

柯先生还曾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开玩笑说：“你还记得在行军中你因病坐担架，病好了也不下担架的事吗？”我在翻阅整理父亲的信件时，看到了这句话，忙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大笑说：“我当时确实有病，但身为机要秘书，随身携带着重要文件，必须紧随关将军一起行军，便由当地政府派民工用担架抬着我行军。中途我感到好一些了，要求下来步行。但民工死活不让我下担架，他们说你不坐担架，让我们长官知道了，不但要扣掉我们的所有工钱，还要重罚我们。这时，我让柯大澍上来坐，他不敢，因无病坐担架要受到军法处置的。没想到，他到老了还在拿这件事开我的玩笑。”父亲还说，那时他们才20出头，又都是单身，朝夕相处，亲如兄弟。柯大澍身高一米八几，

篮球打得好。有一次因打篮球误了开会，差一点被关禁闭，还是父亲给他打了圆场。父亲当时佩戴的是一把德国造手枪，柯大澍想要，父亲报告关将军也给他配了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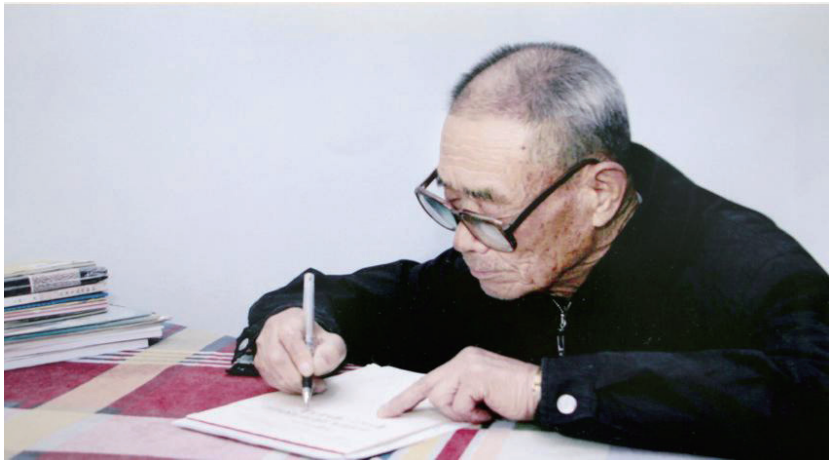
受降

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所在的25师奉命由马关、麻栗坡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父亲被任命为先遣参谋，以中方联络员身份率领一个营兵力，向河内进发，负责与日军接洽安排受降事宜。途中遇到法国军队阻击，他们认为越南曾是法租地，应由他们接受日军投降。父亲当即坚决还击，双方交战了一个多小时。后来，通过喊话，法军举白旗投降，部队顺利到达河内。与日军接洽过程中，作为中方联络员，父亲对日军联络官的无理要求和傲慢态度，义正辞严地进行了回击，捍卫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尊严，促使日方按中方要求在美国军舰上签订了交接协议。

还未等到受降仪式正式举行，父亲所在部队又奉命乘坐美国军舰在海上历时7天7夜，赶往东北，经山海关、锦州，到葫芦岛接受日军投降。之后，又进入沈阳与苏联军队共同接受日军投降。此时，因长期战乱，市区内土匪众多，社会治安十分混乱。经中苏双方洽谈，成立了中



/ 黄埔军校五分校(昆明)旧址。



/ 王昆岭九十多岁时仍笔耕不辍。

苏军警联合稽查处，双方各出一支部队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父亲担任中方代表兼办公室主任。经过紧张工作，打击了市区内的各种土匪势力和日军残余势力，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率部义归

1946年，父亲奉命回原部队，担任25师辎重团团长。此时，内战爆发，部队内部的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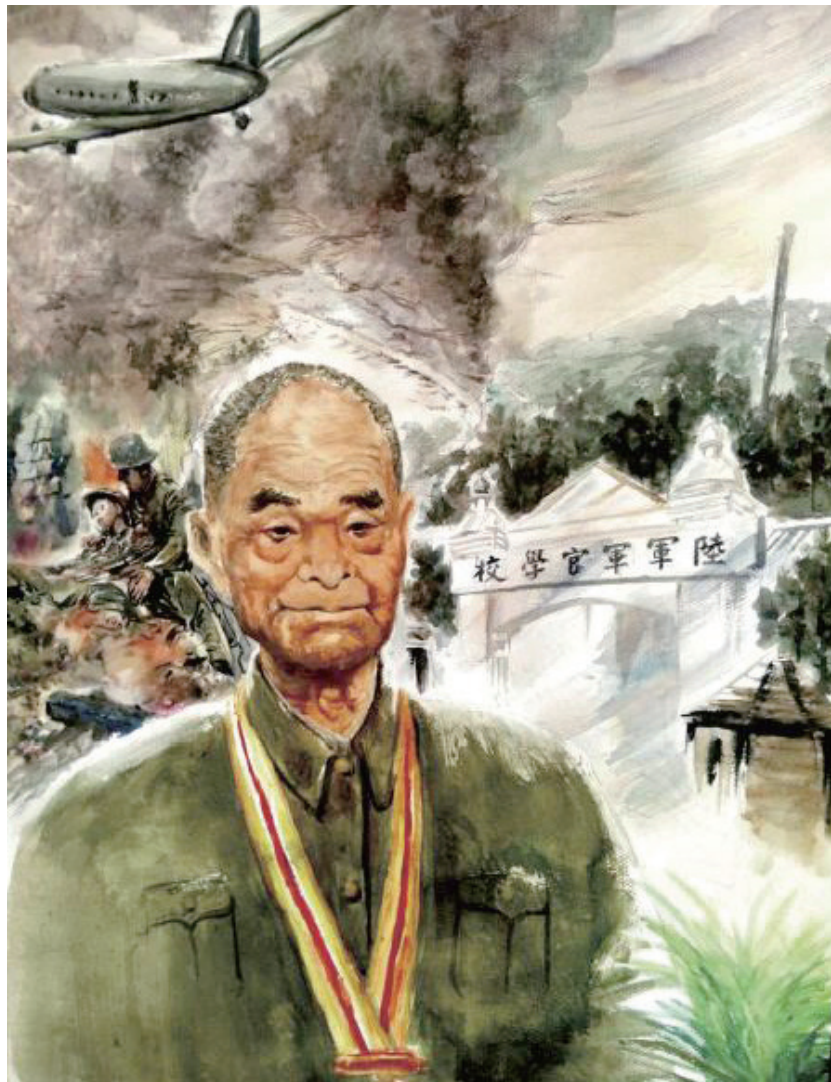
内战情绪很浓。父亲与解放军某部苏部长取得联系，约好因势利导逐步做好部队的起义准备，待条件成熟后举行阵前起义。不料，后来突然听到消息，要调他进城任师代参谋长。父亲十分焦急，唯恐部队失控，起义落空。在与苏部长联系后，他托辞未去就职。1948年，父亲在配合曾泽生率部起义时，将整团兵力全部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

后来，听说我的奶奶因长期思念儿子哭瞎了双眼，父亲思乡心切，谢绝了解放军的挽留，于1950年回到了山西永济老家。至此，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军礼情深

2015年9月3日，父亲佩戴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穿着整齐，早早坐在床边等着观看阅兵式实况转播。当画面上出现宏伟壮观的阅兵场面时，他热泪盈眶，面色凝重，默默地举起右手行军礼，久久不肯放下。9月4日，这个军礼在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中作为特写镜头向全国播放。这也是父亲生前的最后一个军礼。在此之前，山西省有关部门曾推荐他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去北京出席阅兵式和山西省在武乡举行的相关活动，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其间，山西省在太原市南文化宫举办了《民族脊梁》山西抗战老兵摄影展览。父亲的照片被悬挂在显著位置。展览期间，不时有抗战老兵和现役军人在他的照片前行军礼，表示敬意，其场景被多名摄影家用镜头记录下来。

每次回忆抗战经历，父亲都反复说，往事不堪回首，但又很难忘怀。我们饱受战争之苦，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爱国。当祖国有难



山西著名画家靳双院为王昆岭所作画像。

时，不能各顾各，一盘散沙，而是要挺身而出，精诚团结，为国效力。因为只有国家独立、稳定，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好。今天，我们生活幸福了，不要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今天的我们无论遇到多大困难，甚至受多大委屈，但一想到他们，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父亲生前非常关注全国和山

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情况，他床前摆放的全是《黄埔》杂志，每期必看，有些文章还反复阅读，多有感慨。父亲还十分关心台湾问题，每天必看中央电视台的《海峡两岸》。他说：“国家一定要统一，也一定会统一，搞‘台独’，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我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祖国和平统一啊！”■

终生报效我的祖国 世代传承我的黄埔

□ 欧阳纪声



/ 欧阳纪声 90 岁留影。

欧阳纪声，字太保，号树之，生于1927年9月，湖南省宁远县平田村人。黄埔军校22期炮科毕业，

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军队、地方从事文宣、教育、水利资源管理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任巨野县政协委员、常委，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自幼认知有祖国，初具一颗爱国心

1927年9月，我出生在地处湖南一隅的平田，平田虽然是个小地方，却是当年少有的宣传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理想的小天地。1933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便跟随老师读“总理遗嘱”，唱“三民主义”。1937年卢沟桥事变，

我们平田龙溪小学全校师生在校长欧阳旭初的带领下开展抗日活动。1944年秋，长沙失守，衡阳告急，为保家卫国，平田自发组织了抗日游击队，我与家兄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的对敌斗争。在参加抗日斗争的过程中，我深刻理解了孙中山先生临终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含意，从“爱我祖国”到“保卫祖国”的意识更加明确。

我的家乡平田有一位历史名人欧阳振声，对我欧阳氏家族，特别是对年轻人的思想影响很大。

欧阳振声（1881—1931）早年留学日本，1906年加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并参加武昌起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避居上海。1947年我曾到上海，见到他的长子欧阳维一。欧阳维一说，他父亲虽未公开反蒋，却常到北京与江西等地活动。还叮嘱维一，在他去世之后，一定把他母亲送回平田祖居地养老，不要留居上海、南京，并告诫膝下四个儿子不要在“蒋家朝廷”为官。欧阳振声的四子欧阳维钧，在平田龙溪小学担任我少年时的政治课教师。据闻：



/ 湖南省宁远县平田村。

维钧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郴州市政协副主席。遗憾的是我离家之后，再也未见到这位教导过我的恩师，实在可惜！还有一位住在欧阳维钧先生家斜对门的本家兄弟欧阳维骞，湖南大学毕业，早年投身北伐军，也因受振声的思想引导，后离开军队从事金融工作，任湖南省银行总行代理行长等职，并于1949年秋末参加程潜、陈明仁的长沙起义。1928年4月—1929年5月，我村有6名青年受欧阳振声爱国理念的影响，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

保家卫国投黄埔，弃暗投明走正途

众所周知，黄埔军校原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门两侧的对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为“革命者来”。考取黄埔军校，无疑是当年向往革命的莘莘学子的崇高理想。抗战期间，我目睹日本鬼子的残暴行为，再加上从小受欧阳振声的爱国理念影响，因此毅然决然投考黄埔。

1948年初，我们南京考区的百余名录取生沿长江溯流而上，经重庆抵达成都双流，编入第14中队进行入伍训练。5个月的基本训练结束后，我被编入炮兵第3中队，入驻成都市内西校场，全力学习炮兵技术，包括

各类火炮的不同结构和射击原理，还有方向盘、经纬仪、剪形镜等的操作技能。此外还要学会骑马和汽车拉炮。政治课每周都由专任老师授课，其教材是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至于蒋介石所写的《中国之命运》则只在临毕业前学了某些章节。

训练期间还学习了粗浅的战略战术，如古代的“围魏救赵、暗渡陈仓”和当年校长关麟征所倡导的“蜈蚣队形”。课堂上只讲怎么打仗，不讲跟谁打的问题。学习期间，有两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在北校场看了一场话剧，剧情是表达在某一农村实行互助合作，共产共收，日出同劳，日落同息，其用意是向我们宣传这就是不自由的共产主义。不知他人如何想法，可对我这个曾遭破落地主迫害的穷小子来说，这样互助合作，有吃有喝，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岂不是天大好事，何乐而不为？还有一次是为我们放了一场电影，说的是“胡宗南占领延安”，按常规说，既然是攻防之战，必然是炮火连天，硝烟迷漫，但在银幕上只见胡宗南率领他的部下在街道上来回巡视，无非是显示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俗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懂点战略战术的人就知道这是共产党主动撤退，否则，胡

将军哪有那么大的本事，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夺取延安？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而已。

22期学生训练共达14个月之久，大家在关麟征校长教导下，虽严肃也有紧张，讲纪律也有自由，求团结不交私友，学业正规也颇活跃。每逢星期日，我不是逛公园喝茶，听摆龙门阵，就是进川菜馆要盘鸡杂炒雪里蕻。

1949年2月，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之后，准备百万雄师过大江之时，被封锁信息的四川成都宣布了军校22期特种兵科学生毕业。有关毕业分配之事，那时我考虑得十分简单，认为可自找门路，自寻安身立命之地，我就可以回到湖南老家享受天伦之乐。谁知身不由己，竟由学校分配，命我到重庆第7编练司令部学兵团当见习官。到学兵团之后，先到四川省江安县招募学兵，将高小毕业以上的青年，培训为合格的班长，充实国军。5月，回四川铜梁进行培训，我依然按照在军校的方式，本着服从命令、关爱士兵、同甘共苦、纪律严明的原则要求他们。到山上挑煤，士兵们挑多少，我也挑多少；有的学兵患病，我掏钱为其买药。对我来讲，身为黄埔人，应有黄埔情，这都是“黄埔校歌”所提倡的“莘莘学子、亲爱精诚”应有的作为。

6月，我任排长，认识第3营营长莫须，他约我到家闲聊，原来他也是湖南老乡，桃江县人。当知道我家在湖南永州，颇有相见恨晚之感，越谈越近乎，越交越知心。说到解放军攻势勇猛，势如破竹，当时有人传言：那是共军逼迫老百姓打前锋，国军不忍杀害老百姓的原因。他笑着对我说：“你能相信这些话吗？如果平民百姓这样去当炮灰，谁还去在后方支援解放军？”还有一件事，即重庆市发生大火，又传出谣言说是共产党的人在自来水管中灌进了石油造成的，他仍然持相反意见，说：“这才是胡编乱造。”闲谈中他只谈他的看法，我也没考虑他的身份，只知道他是好营长、好上级、好老乡。他还嘱咐我：一定不要直接与解放军面对面交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告诉我，必要时到四川宜宾的72军副官处谋求一条新的出路。

1949年9月，学兵团整编，我被编入第8连，任命为代理副连长。不久，副连长去了“代理”二字。11月，重庆解放，解放军向川西南快速进军。学兵团第8连划归134师，从璧山向宜宾逃跑，我便趁此时机，连走带跑，日夜兼程，奔至宜宾参加了起义的72军，几天后奉命移师江安，又到了我原来招募学兵之地。

在江安驻扎时间很短，72

军又开赴富顺。不久，解放军代表团进入72军，改造这支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当时有许多谣言，我起初并未理会，但人多嘴杂，胡编乱造者多了，对人就有了影响，甚至连我两位同期同连的同学也有些疑惑了。我决定脱下军装离开，回江安找学兵李楚樵和张哲，找个工作另谋生路。谁知刚解放的江安城，连本地人没有地方安排，哪有我这个外来客的栖息之地？几天后，传闻罗广文领导的第7编练司令部起义后，正驻扎在资中县，我灵机一动，回想起在学兵团莫须营长跟我说过，他有一位老乡，又是他的老友，姓韩，在第7编练司令部任处长，我何不到资中去找韩处长，再通过他见到莫营长找个工作。

我离开江安，沿沱江而上，途中遇见船民苏老三，边走边谈，才知道他是资中县人，因川南军区正缺粮食，他正接受从资中往泸州的运粮任务。他的帆船停在富顺，要找一个帮手替他拉缆，才能逆流而上。这种机遇对我来讲真是千载难逢，便自告奋勇，替他拉缆，他则在船上掌舵扬帆。到了资中，我既帮他摆渡，又帮他办理运粮手续，他则帮我打听第7编练司令部的下落，但依然没有消息。从此，我也死了这条心，跟着苏老三为解放军运送粮食，既为苏老

三家增添一个劳力，又可为人民解放军做件好事。

当我与苏老三经过富顺城时，我让苏老三上岸往72军驻地看看有何动静。他到富顺街上转了一圈，回到船上告诉我说：“72军已张贴‘通缉令’，布告上有你的名字。”还说：“只要抓到你，立即处以极刑。”这下真把我吓出一身冷汗。第二天一早，我和苏老三换了位置，他拉缆，我掌舵，直到资中。把粮食装上船，并办好运粮手续与证件，立即从资中出发，顺流而下。同船有两位中年妇女，还有一位押运员，姓吴，虽着军装，却无八一帽徽和胸章，看样子是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工作干部。路上，我从三位乘客的闲谈中知道了不少事情，如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特别是，他们还谈到起义部队改造成人民军队的有关政策。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决定，到了富顺一定设法投奔解放军代表团。船到富顺，按计划休息一晚，趁他们上岸购物之时，我向苏老三说上街去买点东西，跑到富顺城对岸的233师警卫营，找到22期黄埔同学李景行，要他把我介绍给驻该营的解放军代表团的指导员。一位解放军战士把我带到富顺城里总部所在地。3天之后，我被送到学习班参加学习。不久，整个学习班又搬到隆昌县与军政大学

(又名教导团)合并。

通过学习,我的思想豁然开朗。学习中,我积极发言,热烈讨论。学习之余,我又办了墙报栏,鼓励大家写心得,谈体会,使整个教导团热火朝天。两个月后,第3区队胡区队长告诉我,教导团首长打算把我召进人民解放军,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愿望,当然同意,便坦率地说:“我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领导愿意吗?”胡区队长微笑回答:“早就知道你是黄埔毕业生,没有问题。”就这样,我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南军区后勤部教导团政治处任工作人员,在政治部张光道主任领导下,到基层参与起义战士的学习与改造工作。军大结束后又到后勤政治部宣传科任宣传员。在此期间,我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充分发扬黄埔人的爱国革命精神,发挥我的聪明才智,兢兢业业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在信任中奋力报国,在质疑中克难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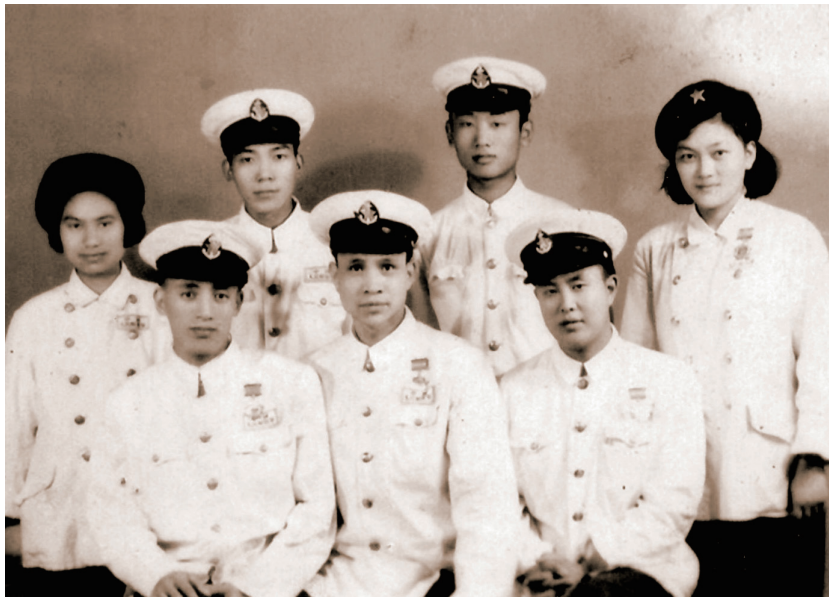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川南军区正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0军,我被调入第10军后勤部总医院第二医务所当文化干事,协助指导员宋燕开展全所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部队从泸州市新招了不少青年男女,充实医院护理人员队伍,从泸州沿

长江而上,经三峡到武汉,改乘闷罐火车到达河北定县学习军事技术。意想不到的是我这个“文干”倒成了“武干”,大家都知道我是个黄埔生,秉文习武,操枪投弹,训练新人,我又有了用武之地。部队医院在定县两个月左右,又开拔到河北昌黎准备接收伤病员。我除了做好全所医护人员的宣传鼓动工作外,还做伤病员的安置工作,进病房、出墙报、写号外、教文化。我从1951年初到1952年2月的一年间,曾三次用书面报告的形式向领导申请到抗美援朝最前线参加战斗,我那时二十四五岁,没有结婚,父亲在家有哥嫂伺候,无后顾之忧,既可实现报效祖国的最高理想,又可显示黄埔健儿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最大决心,遗憾的是没有获得上级批准,只得服从领导,在医务战线上,救死扶伤,鼓舞士气。1951年底,我获得了第10军后勤部颁发的“人民功臣”奖册,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我这个黄埔人的奖励。这本小册,如今依然保存在我身边,它就是激励我继续努力、奋勇向前的推进器。

1952年5月,为加强中国人民海军航空兵建设,在青岛市沧口飞机场原有海军航空学校的基础上,扩建一所海军第二航空学校,负责培训地勤人员。我所在的后勤医院二所全部调到海军

第二航空学校卫生院担负全校的医护工作。我则调到政治部宣传科的文教办公室当文化教员。由于当时的海空军干部多来自工农兵,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在教学上十分困难。我建议将学员分成初中班与小学轮训班,我负责两个班的数学教学。这段时间的工作非常辛苦,在我工作史上创下三个第一次。一是第一次任两个不同班次的数学教员;二是以半年时间完成一年的教学任务;三是天天要忙到晚上12点才睡觉。不仅每天忙于备课、改作业及课外辅导,我还成了校长和部长们的老师,每周抽两个下午,专门为校部长们(约10人)讲数学。更有意思的是,我还被胡校长与校务部的倪部长请去为其子女辅导数学。由于我在教学上取得的突出成绩,1952年末,得到了“人民功臣”的称号。

1953—195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大发展,因训练设备的改进,学员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我于1953年初调入训练部文化教研室。我的任务是要保证一年内学员从小学数学水平达到高中水平,也就是说一年要学完5年的课程。经过努力奋战,我实现了这一目标,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父亲那年63岁,因病给我发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家照料,我始终没有请假还乡,最终父亲因病去世。我腿



／ 欧阳纪声(前排左一)在海军二航校。

间长脓肿，手术之后，医院安排我卧床一星期方可拆线，我连一天也未休息，坚持备课、讲课，心中只想到这正是考验我这个黄埔生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耽误学员一分一秒。我的事迹，被二航校附近的华新纱厂知道，邀我到该厂去作经验报告。1953年及1954年两年我都被授予“人民功臣”称号，连续4年获得军功荣誉。

我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冲击，离开海军第二航空学校，转业到地方工作。1956年底，我与20余名转业海空军干部，由巨野县县委组织部张英才副部长率领，来到菏泽巨野县任职。我被安排在县教育局任视导员。张英才副部长要我向部队申诉纠正

“历史问题”，否则对我日后的工作不利。我向海军司令部写了“申诉书”，请求平反。不久，接到海军司令部所属的航空兵部回函，告诉我，已责成二航校认真复查，予以甄别。大约在1957年6月，我正式平反。尊敬的胡鹏飞校长写信鼓励我，称我为同志，对我离军表示遗憾，并说当时如果他在学校，是不会叫我转业的，既已离校，则希望我继续发扬爱国革命精神，努力工作，为地方作出新贡献。

在山东巨野工作期间，对我这个黄埔人既有信任者，也有质疑者。

1957—1958年我任教育局视导员，当时有两个人对我的信任和帮助，令我难以忘怀。一是人

民武装部政委孙宪耕。他只要下乡视察，总要我陪同，帮他整理材料，对我关怀备至。二是教育局局长赵慰农，在他的领导下，我大胆地进行改革创新，认真落实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同时向老师们讲解凯诺夫和冈察洛夫教育学，借以提高教师的教育水平和理论能力。我几乎走遍了全县92个高小，连一些单班小学也留下我的足迹。

1958年，我到胡垓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吃住在贫农胡文柱老两口家中，把每月24斤口粮交给大娘，跟随他俩整整一年吃糠咽菜。那时，双庙公社党委刘书记，把我这个黄埔人当作共产党员使用，每次公社党委开会总是通知我参加，回村再召集4个生产队正副队长与会计传达。我与4个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在二坡沿开垦了约10亩撂荒地试种水稻，每天推水车达10个小时，共花了160天，眼看稻谷结出了金黄色沉甸甸的稻穗，估计亩产不下800斤。这件事不仅惊动了巨野县农业部门，连正在试种水稻的济宁市金乡、鱼台县也派人到我们这小小的胡垓村水稻种植现场学习参观。

1959年11月，我的家庭状况发生变化。与我一同转业到巨野工作的老战友的妻子，把她的同学王大蓉介绍给我。王大蓉的老家是四川广安，从小父母离异，

12岁时即成孤女，凭自己双手劳作工读，读到小学毕业。1958年考入梁平县文工团，正式成为自食其力的文艺宣传工作者。一年后，山东省巨野县组建县级文工团。她于1949年10月，从四川梁平调到山东巨野文工团，既当老师又当学员，那年她21岁。我俩于1959年11月结婚，因我的“历史问题”，她从县文工团调入缝纫厂。1960年初冬，妻子也被下放到农村当农民，我们夫妻二人带着刚满月的女儿来到田庄公社李庄村，生活极度困苦。天无绝人之路，不知哪位好心人把我家的事告诉了县长尹铁军，这位关怀百姓的好县长告诉我，他要与我同骑自行车，到田庄公社看望我的妻子和女儿。第二天，我把县长接到家，妻子欢喜得掉下眼泪。这件事被李庄村民传为佳话，无不称赞这位不摆架子的好县长。更令人高兴的是，村民们再也不把我一家视为外人，有的送红枣，有的送花生，村保管员送给我半袋小麦，村会计送给我30斤粮票。1962年冬，我第二次平反之后大蓉母女也获准回城，住在县一中对面的马庄。

自1960年初，我在文教局既任视导员又兼文化体育干事，将工作做得有条有理，从不因别人的误解而烦恼。别看巨野是个贫穷的小地方，但手球、乒乓球、田径等均在菏泽地区名列前茅，



/ 1996年，巨野县黄埔会员合影。

茅，以致省体育代表团都到巨野做表演。文艺工作更为突出，60年代初编演的戏剧《巨野教案》不仅在鲁西南出了名，甚至在全省山东梆子剧团中也被视为典范。

1962—1964年，巨野县委宣传部部长李昌之和副部长刘炳坡，命我负责举办“阶级教育展览”。我深知阶级教育的必要性，在我县文艺队伍中挑选了书写、绘画、播音、讲解、灯光等专业人员作为助手，将展览办得有声有色。为了扩大宣传效果，刘副部长还带领大家下公社驻地展览，时达年余。

1964年末，刚刚做完“阶级教育展览”的收尾工作，县科委联合农、林、水三部门又要合办“农业展览馆”。领导者是县科

委主任李本德，他知人善任，对我这个黄埔人信任有加，把布置农展馆的事务都交给我来主持。我没有辜负领导的信任，把农业展览馆的布展任务圆满完成。嘉祥、郓城、成武等附近县都派人来参观取经。

1965年秋，我被调到第五中学当教师。

1970年6月，我遭逢变故，痛失爱女。不到10岁的女儿欧阳萍为救落水同学溺亡。马庄男女老少，无不悲伤痛惜，纷纷赞扬萍儿品德好，小小年纪知救人。

改革开放金光大道，广阔天地任我飞翔

1975年落实政策，我调到县政府水利局。1987年调水资源办公室。在此期间，我在工作上改

革创新，逐渐成为全菏泽市知名的水资源管理人员。

在水利服务事业上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是依法治水，依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巨野县实际，草拟了《巨野县河道管理条例》和《巨野县水资源管理条例》等法规性文件。我还招用了5名巡护人员，对全县管理的五大河系进行巡视监察，我负责工程管理期间，县河道的水利设施均完好无损，60万棵堤树郁郁葱葱。为打开依法治水局面，我紧紧依靠县人民检察院，对破堤建窑、毁林取土等事件严肃处理，并组织实地宣传，提高当地群众的守法观念。

二是实事求是地转换治水思路，探索开源新途。我意识到在治水思路，巨野的治水方针必须调整，也就是将过去的“以井保丰，以河补源”，转换成现在的“以河为主，井河并用”，这才是治水正道。

三是扩展治水用水的目的和视野。我认为过去把水利只看成农业的命脉，而今天则应视水为生命之源、地球之本，要以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命质量作为奋斗目标。

四是科学开发利用水资源。鉴于巨野县水利系统的技术人员科技水平有限，经我申请，1990年，山东省水利厅派遣省水文



/ 1999年，欧阳纪声夫妇在家中合影。

地质勘测队，到我县打了数十眼深达300米以上的深井进行探测，虽然未发现适用的地下水源，但此举功不可没。这番考察不仅明确了巨野地下水现状，并且为1992年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帮助我县制订《巨野县水利建设长期规划》打下了坚实基

础，特别是对日后开发“巨野龙固煤矿”提供了不少地质方面的依据和信息。

由于我坚持依法治水，转换治水方针，扩展用水视野，实施科学治水，巨野水资源开发利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拦蓄地表水所建的“宝源”饮用水



/ 2004年,巨野县成立黄埔联谊会。

库和灌溉用水的“大野”水库相继流入全县近100万百姓的家中,大部分农田可浇上河水,促进了农副业丰收。

1981年,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我和其他三位学长相继进入巨野县政协当上了委员,我还担任了常务委员,昔日的黄埔学生,今日荣登人民政协参政议政。从1981至2002年的21年间,我连续担任了5届县政协常委。75岁时,又接任巨野县老年科技协会常务理事。在政协工作的这些年,我得了三次优秀提案奖,据县政协邵庆慈主席当面告知,我的所谓政协委员先进事迹已列入山东省《政协委员风采录》,这充分表明巨野县领导对黄埔学生的信任和重视。1981年,水利

局办公室主任动员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早就有此愿望,当然高兴万分,递上了我的入党申请书,经上级党委批准,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由于对党忠诚,年年立功,在水务事业上有进取、有创新,此后的12年中,经常被评为全县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1992、1993年被评为山东省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山东省水资源管理优秀科技人员。

1989年5月20日,我参加了在济南召开的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会理事及菏泽地区黄埔联谊组副组长、巨野县黄埔联谊组组长,此时我已62岁。迄今30余年来,我县黄

埔会员为发扬黄埔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我们在省同学会组织的会议上作典型发言,还与河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进行交流,介绍经验。2010年起,我组自行召开学习座谈会,请来退休的老领导与我们共学共议,连续8年。直到2018年,我已91岁,因患了椎间盘突出症卧床半年,学习座谈会暂时终止。

时光荏苒,我的祖国历经千辛万苦,经过改革开放,迎来了今天的繁荣富强。我也和我的祖国一样,经历坎坷人生,享受到如今的幸福生活。回想自己坚持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为党、为国、为人民付出的血汗,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欣慰。■

体现“亲爱精诚”校训的三件往事

□ 张子忠口述 张治平整理

无法标价的情谊

1942年4月15日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重庆军委后勤部担任少尉见习官。到部队报到后，我住在旅店等待着正式的通知。

一天，我在街上遇到入伍时第一队的同学祝源治（分科后他被编入炮兵科，我被编入辎重科），这样的不期而遇，使得我们两人都兴奋异常。

当他得知我还住在旅店时，便问我：“身上带的钱够花的吗？”问话的同时，他已经把钱掏出来塞入我的手中，经我再三推阻后，他才把钱收回。当我回到旅店，店老板就递给我一封信，并且说是我的一位同学求他转交给我的。

我满怀疑惑撕开了信封，里面竟然是几张大钞票，这些钱足够我一个月的生活开销！

望着这来自黄埔学友的关爱，我呆呆地愣在那里，几张钞票有价，黄埔校训“亲爱精诚”这四个字，却无法用“价”来计算，无法用“价”来衡量！

从那以后，我接受过工资、接受过奖金，任何形式的钱在我看来都如同过眼云烟，没有在



/ 黄埔军校时期的张子忠。

脑海中留下什么痕迹，唯独学友的资助使我没齿难忘，连同黄埔军校“亲爱精诚”的校训，使我感动一生！铭记一生！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对于学友送给我的那份挚爱，我一直想“投我以木桃，报之与琼瑶”，但几十年过去了，这一愿望始终埋藏心底，没有机缘得以实现。

迷雾之中见精诚

1944年，我由西康去成都回校工作，西昌部队安排我搭乘一辆大货车，途经海拔千米的冰雪大山栗子坪。当时大雾迷漫，天色已晚，突然间，从后面传来

几声枪响，并伴有“停车检查！”的喊声，我赶快叫司机停住了车。

这时，几个军人拦在车前大声斥责道：“都到了检查站为什么不停车？”当时我是车上唯一的军人，情急之中连忙向他们解释：“在大雾弥漫中，根本看不清楚‘停车检查’的牌子。”就在这时连长来了，不容分说就下达了卸货检查的命令。我走上前向连长解释原因……这时，连长发现了我胸前佩戴的毕业纪念章，立刻把目光盯在我的脸上：“你是军校的毕业生？”“对，我是17期的。”他马上兴奋地说：“那你可是小老弟啦！我是14期的……”说话间，这位连长又招呼车上的人：“大家都别走啦！今晚就住下吧！天黑雾大路上危险啊！”并且招待我和司机吃饭。第二天吃完早餐我们上车时，他又给我们送来路上吃的水果。

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我已记不起这位连长的名字，但是这段亲爱精诚的“雾中情”，却使我永记心头！

一场风波告平息

1945年，我家住在成都东

胜街17号，隔壁19号住的是川军将领唐世尊，我家的对门是设有豪华舞场的沙利文饭店。

一天，门口传来嘈杂声，有人叫喊着：要把偷电的人找出来。而被指控偷电的人正是我家旁边的一位经商的山东老乡，他错把自家的电线接在了饭店的电线上，因此引来了事端。虽说是刚刚接上的电线，可店方却以为他已经“偷电”几个月了。


面对气势汹汹的店家，这位山东老乡有些害怕，因平日里和我父亲有过交往，于是恳求我

父亲出面排解调和一下。

我父亲是黄埔军校的武术教官，为了息事宁人，他直接去找了唐世尊的太太，因为和她虽然不熟，也算有过见面之交。见到唐太太后，得知饭店经理在黄埔军校高教班读书，父亲于是来到北校场校部，见到了这位学员兼老板，双方本着诚意平息了纠纷，这位学员说：“有亲爱精诚的校训在，就不会有隔阂产生！”

没过多久春节到了，一天早上，唐世尊来我家登门拜访，

并口称：“张教官乃我堂弟的老师！”并把他身体不好的小儿子带来，让我父亲收为门徒进行武德训练。

“天下黄埔是一家”，黄埔师生在“亲爱精诚”校训的教导下，不管走到哪里相互之间都保持着情谊和信任。海峡两岸同是炎黄子孙，同根同族同血脉，我相信，两岸的黄埔人在“亲爱精诚”精神的感召下，一定会团结一致，推动祖国和平统一早日实现。

“我的黄埔前辈”主题征文启事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黄埔军校是一个传奇，黄埔同学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今，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旧址早已没有了往昔金戈铁马、沙场点兵的情景，我们的视野中也越来越难寻觅到黄埔师生龙腾虎跃的身影。但是，这些黄埔前辈叱咤风云的威武雄姿，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救国救民的爱国情怀，却从来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为了永远铭记黄埔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激励后人在新时期继续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推动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本刊特开展“我的黄埔前辈”征文活动。

征文主题：记忆中的父辈印象(包括您所了解的父辈的主要经历和贡献，最难忘、最感动的故事)，父辈身上体现出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好品德等，结合父辈的人生经历谈对黄

埔精神的思考、感悟和传承等。

征文对象：海内外黄埔亲友后代。

征文要求：文章字数不限，要求内容真实，生动具体，情感真挚，可读性强。来稿时请提供父辈历史照片1至3张，家庭照1至2张，作者本人照片1至2张，父辈和作者的个人简历以及作者联系电话、地址、邮编、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请有条件的作者尽量提供电子版稿件，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我的黄埔前辈”。手写稿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号《黄埔》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75

电话：58336325 58336358

联系人：曹燕

电子邮箱：hpzzs88@sina.com

叶剑英的港澳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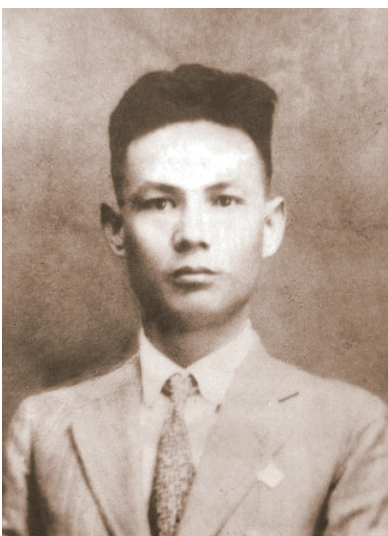
□ 吴跃农

叶剑英，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国新的历史时期功不可没的开创者。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叶帅与香港、澳门有着很多的交往和联系。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年也是叶帅诞辰（1897年4月28日）100周年纪念。

香港出洋又回还

中学毕业后，因家中贫困，叶剑英到省城、北京或上海去读书的愿望难以实现，便决定去南洋谋生。1916年，叶剑英的父亲找到一位“水客”，带着他乘船到了香港，转上了去南洋的轮船，经过十多天的飘泊与奔波，来到马来亚怡保。在马来亚，叶剑英先后做过英文打字员、小学国文教员。然而，心怀理想的叶剑英立志报国。是时，传来云南都督唐继尧派人来南洋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就学的消息，叶剑英随即报了名，顺利通过考试，被录取。1917夏天，20岁的叶剑英坐船回到香港，再经越南海防、河内，取道滇越铁路前往云南。

不管是去国赴南洋还是归国奔云南，香港对于叶剑英来说



／ 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的叶剑英。

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是他最初走上社会的出发地。

初到云南讲武堂，叶剑英是兴奋的。他在给弟弟叶道英的信中表示，胆识和军事技能是前驱，文才和谋略是后盾，文才武略，他决心兼而具之，可以为国一展英雄之志。为此，他将自己的名字“宜伟”改为“剑英”。

这时，唐继尧已渐渐暴露出背离孙中山的意图，叶剑英决定，毕业后去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此，他经常与同学在“两广会馆”聚集，用自己的坚定信念去鼓舞那些一时悲观的同学。

他豪情满怀，作诗曰：

月满危楼花满园，
花前月下宴王孙。
频移杯影浑忘醉，
几次琼香对笑论。
兴爽春衣沾露湿，
情高秋思落诗魂。
更怜良夜嫌更促，
把剑长歌气压轩。

为了追随孙中山先生，叶剑英在1920年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粤军。然而，当时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孙中山貌合神离，孙中山一时竟指挥不动陈炯明，在粤军自身受到威胁时，陈才勉强接受孙中山的意见，班师回广东。是时，叶剑英初露军事才干，他以南洋华侨身份，只身前往汕头到桂军内部作策反工作，之后，又奉命前往香港、江门对桂系部队进行策反，为粤军攻下广州立下功绩。

两广统一后，孙中山命令“北伐”，以图统一中国，叶剑英被举为孙中山的随员，跟随孙中山到桂林。之后，叶剑英又护卫孙中山巡航珠江，先登“宝璧舰”，后改乘“永丰舰”（即中山舰）。叶剑英指挥卫队向叛军开火，并起草了“讨陈”电文，在

孙中山蒙难的55天中，叶剑英始终忠于职守，近随孙中山，保护孙中山，表现出对革命的耿耿忠心。

香港香洲志弥坚

1922年8月，陈炯明把持广东军政大权后，公然反对孙中山，孙中山只得经香港去上海，叶剑英也暂避香港。

这是叶剑英第四次到香港。

到香港后，叶剑英找到先期到港的同事，与粤军华侨陆军学生救国会的同志一起，奔走串联，向粤籍同学、海外华侨以及香港社会贤达、爱国人士揭露陈炯明的叛徒嘴脸。在香港，叶剑英保持着与孙中山的联系，派人去上海晋谒孙中山，听取孙中山对他们在香港进行革命工作的指示。孙中山要求叶剑英在香港设法向南洋华侨募集捐款，支持北伐。接到孙中山的指示后，叶剑英即予以执行。他联系了老同盟会员、著名侨胞邓泽如及一大批在海外的云南讲武堂同学，号召捐款，得到热烈响应，一笔笔捐款由海外寄达香港，叶剑英一一登记在案，并派人护送给北伐部队，这对北伐部队无疑是雪中送炭。

北伐军攻克福州后，孙中山将入闽粤军组成东路军讨伐陈炯明，叶剑英在香港得知消息后，立即赶赴福州，投入东路军，被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秘密转入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图为叶剑英和同乡潘君勉在香港合影。

委任为总部参谋，后又任第8旅参谋长，因战功著卓，被孙中山任命为建国粤军第2师参谋长。

1924年1月，叶剑英应廖仲恺邀请，参加筹办黄埔军校工作。5月，军校建立，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同时领

导第2师。他领导的香洲独立营，在平定乱军和广州商团叛乱中屡立功勋。1925年，叶剑英的香洲独立营驻扎在当时的珠海县。4月25日，独立营内部的反动分子发动武装暴乱，25位进步军官惨遭杀害。兵变后，凶手潜逃至

澳门，叶剑英闻讯后，立即赶到香洲，收殓遇害者遗体，并驰往澳门，捉拿叛乱者，将他们从澳门押解回来正法，并营建烈士墓于香洲狮山之阳。他在澳门写了《香洲烈士》一诗，“革命党，当流血，看挽枪满地，剪除军阀”，记颂牺牲烈士的伟绩。

在黄埔军校，叶剑英与周恩来结识，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襟怀和远大抱负，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任北伐“铁军”第4军参谋长后，正逢蒋介石叛变革命，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深明大义，通电讨蒋，“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叶剑英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苏区中央局，同时组成中央苏区军委，叶剑英为军委委员，中央派当时在上海的叶剑英前往江西苏区军委参谋部工作。从上海到江西经香港走比较安全，1931年1月下旬，叶剑英从上海乘船到香港，与他一起到香港的还有参加广州起义的同志聂荣臻。在香港，叶剑英与聂荣臻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成败教训，越谈越投机，常常通宵达旦。聂荣臻深感叶剑英才华出众，分析问题精辟，对同志热情诚恳，从此视为莫逆之

交。这次到香港，叶剑英还找到了弟弟叶道英，叶道英在九龙大埔墟居住。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通缉叶剑英，叶剑英的母亲只能躲到香港，与叶道英住在一起，母子久别重逢，叶剑英的母亲非常高兴，希望儿子能多留在身边过过安稳日子，得知儿子只是路过香港时，心中的担忧溢于言表。叶剑英是国民党黑名单上的人，在香港不得不经常变换住所，等待交通员的接应。不久，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邓发派交通员接叶剑英，从陆路进入江西苏区。叶剑英何尝不想多侍奉老人，但想到革命重任在肩，只好把照管母亲的事委托给弟弟。他嘱咐弟弟叶道英，在思想上要永远相信共产党，跟共产党走，在行动上要做有益于人民的事。回广东后，在国民党统治下只能搞一些财务、税务工作，来养母持家，决不能当国民党的县长、校长，为虎作伥，荼毒人民。叶剑英劝说母亲再苦熬几年，等待革命成功后团聚。母亲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理解儿子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离开香港的那天晚上，叶剑英与母亲、家人共进晚餐话别，谁知，这竟是叶剑英与母亲的最后诀别。1944年，母亲在从韶关回家乡梅县的路上病逝。母亲去世时，叶剑英正在延安，得知消息，悲痛泪流，写

下了“尸骨抛沟曾逆料，阿母生我最艰难”的诗句。为了怀念母亲，叶剑英特意蓄起了胡子，他说，每当我摸到胡子，就想到母亲，我要用伟大的母爱，去爱全中国人民。叶剑英把母亲的相片挂在书房墙上，抬眼就能看到母亲，在母亲的照片旁边，是他写的两行字：“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为人民的儿子而欢心。”

情系港澳人心暖

叶剑英每次到香港，都积极依靠香港的朋友开展工作，为革命积蓄力量。1938年5月，叶剑英因病去香港就医，顺便开展工作。这次，叶剑英到九龙元朗“荫华庐”潘君勉家中小住。潘君勉在叶剑英的启发下，联络了香港商界的许多朋友捐献巨资支持抗战。潘君勉还通过叶剑英，将自己的两位侄儿送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叶剑英在香港，经常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指导工作，与廖承志、潘汉年商讨工作。他指导了在香港的抗战宣传，引发热烈的反响，港澳各界和海外华侨社团支持抗战的热情空前高涨。叶剑英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多次通过书信或电报等方式对港澳各界表示感谢，团结很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到抗战中去。在香港，叶剑英还曾住到老朋友、地下党员柯麟家中，得到了柯麟、柯平兄弟的悉心照

料。

当时，柯麟在香港荔枝湾200号开办南华药房，一方面维持生计，一方面作为共产党地下秘密交通联络站。后来，柯麟主要工作是在澳门联络叶挺，柯平则长驻香港。叶剑英与柯麟、柯平兄弟经常彻夜长谈，展望抗战前景。柯麟曾问叶剑英：“我们还要坚持多久，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叶剑英鼓励他们说：“扎下根子，艰苦奋斗十年，迎接胜利。”在叶剑英的指导下，柯氏兄弟坚定信心，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扩大在港澳的抗日统一战线。

抗战胜利后，柯麟接受党的指示，留在澳门工作，担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又在马万祺等澳门进步人士的协助下，开办新中行，进行党的地下联络工作。

广州解放后，叶剑英任广州市市长，与港澳朋友来往很多，结下了友情。1950年初，广东各地城乡闹春荒，叶剑英在领导群众自力更生渡难关的同时，想到了通过爱国人士经香港“中转”粮食运进广州，解决燃眉之急。叶剑英找到了泰国华侨蚁美厚先生，蚁美厚在泰国主要经营船务和进出口贸易。叶剑英对正好在广州准备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蚁美厚说：“这件事需要你出力，具体办法还要仔

细研究。总之，一是要快，二是要稳妥。广州的人民需要这批粮食。”蚁美厚欣然受命，他赶到香港，电话安排家人在泰国购买大批大米，通过名下的五福轮船公司转运至香港和澳门，又通过港澳爱国知名人士何贤、马万祺、柯平等人的关系，把粮食从香港和澳门分批运进广州。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准备解放海南岛，这批粮食的如期到达，不仅解决了民用之急，还提供了军需。

广州解放后，在叶剑英亲切感人的“儒雅”工作作风的感召下，一批文化界人士满怀信心从香港返回广州。叶剑英立即会见了他们，鼓励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画家关山月等将在香港画好的一幅毛主席巨幅画像送给广东省人民政府，叶剑英代表省、市政府接受，并将此画挂在广州市爱群大厦上。

叶剑英很注重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港澳人士同心同德建设祖国。原广东税警团骨干分子莫雄，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在香港洲兵变时曾参与谋害叶剑英。叶剑英没有因个人的恩怨影响工作的大局，而是充分看到莫雄后来在贵州毕节当专员时曾为长征中的红军部队提供的方便。叶剑英得知莫雄长住香港，便写信请他

到广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莫雄回到广州后，一些同志主张要杀掉他，叶剑英做了说服工作，说：“这个人在历史上有罪也有功，现在表现不错，不能杀，要保下来。”莫雄后来担任了广东政协副主席。

叶剑英在主持华南分局工作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直接领导了香港工委的工作，凡是有关香港的重要问题，他都亲自过问和处理，并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香港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中共澳门工作小组组长是柯平，叶剑英每次去珠海，只要有时间，都要到唐家、拱北邀请柯平从澳门过来，了解情况、商谈工作。有时事务繁多，未及前往，他就派专人去香港澳门沟通联络。

叶剑英与港澳人士建立深厚感情的事例很多，与马万祺的交往就是突出的例子。

“你为祖国做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的”，这是叶剑英对马万祺说过的话。上世纪50年代初，叶帅与马万祺有过多敞开心扉的交谈，或谈形势、或讲建设、或忆往事、或叙乡情。叶剑英对港澳的爱国工作非常支持，同时对祖国建设充满信心，他劝马万祺立足当地、团结大

多数同胞，支援祖国建设。在叶帅的鼓励下，马万祺积极带头推动澳门工商业人士回国参加祖国工业建设投资。凡是马万祺和澳门人士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叶帅都亲自处理，即使办不到，也向他们解释清楚。

1954年后，叶剑英调北京，尽管与马万祺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他没有忘记老朋友，经常捎信问候。

风范长存世人尊

1977年至1983年，叶剑英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对港澳台的回归统一问题倾注了大量心力。

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叶剑英经常挤出时间会见港澳同胞，他多次会见何贤、霍英东、马万祺和曾宪梓等知名人士，热情地与他们交谈，希望他们为统一祖国和支持祖国现代化建设出力。1977年4月17日，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邀请港澳爱国人士共商国是，设宴款待何贤、马万祺先生。马万祺快乐异常，作《欢乐宴》一诗，回敬叶帅，诗曰：“欢乐宴，举酒干杯欢欣遍，万众同心愿；恭祝老师长寿，再颂国家强盛，三愿宏图早实现，壮志如虹练。”

叶剑英在港澳同胞中享有很高威望，有着极大的感召力。



/ 马万祺伉俪看望叶剑英时合影。

1983年5月21日，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部分港澳委员到叶剑英的住所看望他，并带去全体港澳委员给他的致敬信。信中说，半个世纪以来，您在解放祖国的斗争中，在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决心学习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和为革命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为推进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实现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叶剑英对信中赞扬他的话，很是不安，谦虚地说：“我不敢当！”接着，他亲切地告诉大家：“现在的国家正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进行四化建设。在这当中，同志

们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为了使革命事业保持旺盛活力，从党和国家的战略眼光考虑，1985年9月，叶剑英主动请求卸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的全部职务。

叶剑英以其博大的襟怀，给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广大海内外中华儿女以极大的精神感召。马万祺这首悼念叶帅的诗，表达了他对叶剑英人格的敬佩：

安邦定国传千载，厚德真诚载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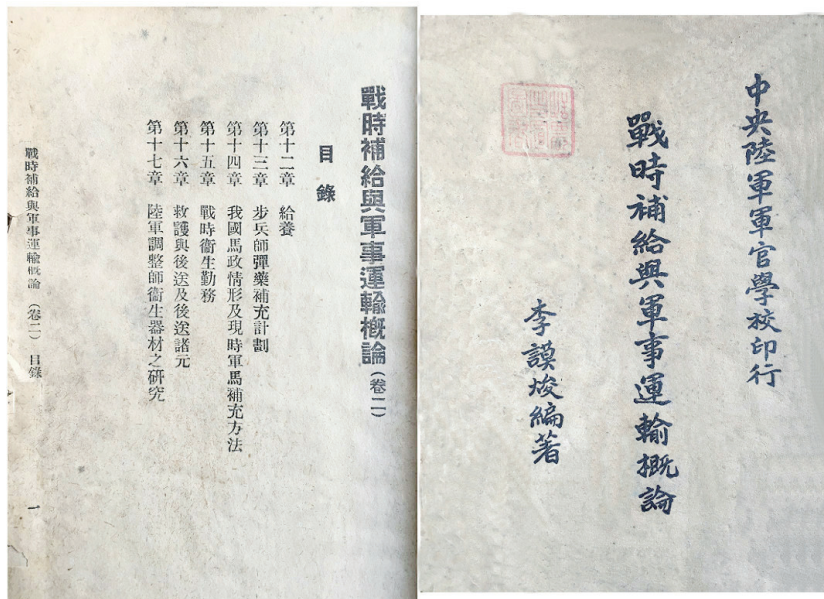
有幸亲情垂四代，长江浪盼后推前。■

浅谈黄埔军校卫生与营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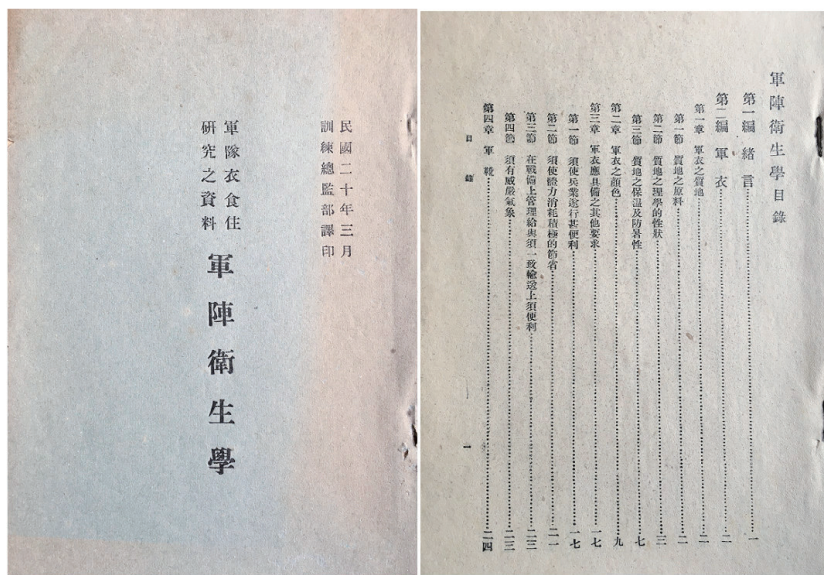
□ 单补生

收藏民国书籍者历来注重版权页，它是鉴定一本书的凭证，版权页的有无决定其价值高低。收藏者尤对有声望出版社情有独钟，其中就包括黄埔军校印行之书籍。

笔者在旧书店淘得一本《战时补给与军事运输概论》，为李谔焱编著，平装32开，1938年（民国27年）6月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出版印行。封面左上钤盖一方鉴藏印“恬农自置图书”，篆体红色印面与楷书黑色文字相映成趣，增色不少。“恬农”何方人士无从查考，从雅号推测应是淡泊名利，清静无为之人。虽然不知“恬农”，但晓得编者简历。李谔焱，湖南浏阳人，1927年清华学校毕业，入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主修商业管理，后以特别生入美国诺维基大学进修军事学，1930年毕业于，获理学学士学位。诺维基大学同学录评价李谔焱：“对军事如此持久的热情，让人望尘莫及。”1938年6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出版了他编著的《战时补给与军事运输概论》，与《军阵卫生学》（军队衣食住研究之资料，1931年3月训练总监



/ 战时补给与军事运输概论。



/ 军阵卫生学。



/ 黄埔军校校医院。

部译行) 同为学生必读军事教程, 其中重视研究战时军队营养和卫生的课题, 强调传染病防治的重要性, 如“1930年中原战役, 我军士兵之就诊及居住中央各陆军医院后方医院者, 计有15945人, 内患传染病者计3204人, 占全病人数18.8%, 按

此项传染病大多数皆可预防而避免, 若能厉行卫生, 从事预防, 则此3000余人, 必可不病, 岂非直接间接增加数团之兵力耶? 故厉行军队卫生, 在世界各国为治军之一重要业务, 而在我国军队尤不能不急起直追以讲究之”。

军校卫生工作

早在黄埔时期, 本校就对卫生工作极为重视。校史记载: 卫生一项, 本校素所注重, 平时致意于清洁卫生之讲求, 以防患于未然, 一旦病患发生, 则有组织完备之医院施行医治, 法令有医疗、卫生规则。1924年5月, 黄埔1期500名学生入校接受训练, 还不到两个星期, 由于地势气候校舍潮湿原因, 加之学生水土不服, 生病的人较多, 病员达20%, 其中不少学生患痢疾、脚气病。校方号召讲究卫生, 同时精神抵抗; 且积极采取避免方法, 除服药治疗, 还设立痢疾厕所, 防止传染; 鼓励南方学生吃麦饭(面食), 以利于治脚气病。1925年7月23日, 蒋校长、廖党代表命令注重清洁云: “暑期最易发生疫症, 军医处长、院长须切实督责各部队军医等, 于清洁卫生认真办理, 尤须于厨房、厕所、暗沟、浴室、仓库、饭厅、寝室等处, 每日派军医轮流检查, 洒石灰粉或避疫水。而对于饮料及蔬菜会同管理处, 切实注意指定总须, 求其清洁, 不发生疾病为度。以后每月将以上各处详细检查一次, 并督责其大扫除为要。此令。” 1926年7月, 又因天气暑热霍乱盛行, 本校恐受传染之危险, 故于17

日公布卫生条例，又于27日公布预防霍乱方法，有注射防疫血清，鱼虾蟹宜暂时禁食，不准与疫者接近实行隔离等项。

南京时期，本校法令较黄埔时期所发布者为多，而于诊疗、调剂、手术、看护、消毒、清洁等项，莫不有单行规则。对于传染疾病，必期遏祸患于未萌，或施行预防注射，或公布预防方法。如1929年4月，南京发生脑膜炎症极为危险，本校军医处奉校令规定防疫办法：有印发预防传单，购置巨量消毒药水，全校每人分发口罩一个，勿到群众集居处所，异常症状应从速治疗等项。

成都时期，1940年10月军训部召开军事教育会议，教育长陈继承介绍本校卫生状况云：本校官生兵伙患病，均由军医处附属医院及队属11个医务所诊治。据8月份报告，全校官生兵伙每日就诊次数约共2500次，赤痢及营养不良较多，练习团患病及死亡率较大，现拟将医务内部调整充实，以期减少病患。其一般清洁管理及预防注射，均照规定办理，现拟办理卫生稽查队，以树立卫生基础。此外材料飞涨且缺乏，影响病人不少，现拟多购必需药械，并增加医药费，以资补救。第6分校主任黄杰述说：本分校卫生设备，原极简单，因



/ 抗战时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军医院。



/ 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医院。

之比较严重病症，常须送省立医院诊治，后以校内官生逐渐增加，卫生设备亟应，力求完全；爰于本年5月特派军医处长毛咸亲赴金华购置器材及药品，现已返校月余。但卫生器材购置不易，仅外科手术用之器材购得一部及普通用之药品而已。

西南步校代表则诉说：现在西南疟疾盛行，蚊帐之购置，刻不容缓。由于步校同时拨到600余人，病人甚多（不能行军赴遵义之士兵），医疗未能中断。

1946年6月，本校军医处军医监处长白鑫（军医学校18期）谨就个人业务范围，在校刊权



/ 抗战时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军医院。

威发文，其中对成都时期本校卫生工作简述如下：

本校为国军干部养成的学校，故本校卫生的设施，消极的是在保持和促进学员生的身体健康，积极的是在教育学员生成对军队卫生之习惯，而谋将来普及部队，藉收“健军”之效。所以举凡保健、医疗诸事项，均遵循陆军卫生勤务实施，并参酌英美军队卫生及各国军事学校卫生行政之优点，采择施行。推行以来，颇著成效，兹缕述如次：

一、卫生教育：为求学员生对于卫生彻底了解起见，特将军队卫生列为必修课目，分别于入伍时期及升学后，讲授军队卫生及卫生勤务。并设置军队环境卫生示范场，以资观摩。每月按

时令需要，编刊卫生壁报，卫生小册等，以为学员生课外军队卫生常识之辅助。此外对于兵伕卫生训练，特加重视，组训全校炊事兵，授以卫生常识及膳食管理方法，并举行兵伕集体卫生讲话，就个人卫生，及公共卫生之浅显者讲述之。

二、保健运动：保健的意义，就是预防。西谚云：“一两之预防，胜于十磅之治疗”是言预防胜于治疗，世界各国莫不努力提倡和空前发展，吾国抗战胜利建国伊始，友邦保健事业之发展，正可以为借镜。保健范围至广，本校所实施者，有防疫、身体检查、营养、环境卫生等四项：

防疫工作——本校于1940年夏秋间，赤痢颇为猖獗，迨1941年严密施行井水消毒及捕蝇运动

后，痢疾及肠胃传染病，遂大幅减少。又1945年7、8月间，成都霍乱流行，死亡枕藉。本校采取紧急防疫处置，结果官生兵万余人，感染者仅十余人。更建立灭捕站，制造蒸汽灭臭虫器等，以消除传染病之媒介。现复请领有效杀虫剂 DDT，以便为全校彻底灭除害虫而保健康。至伤寒霍乱预防注射，种痘，更是每年照例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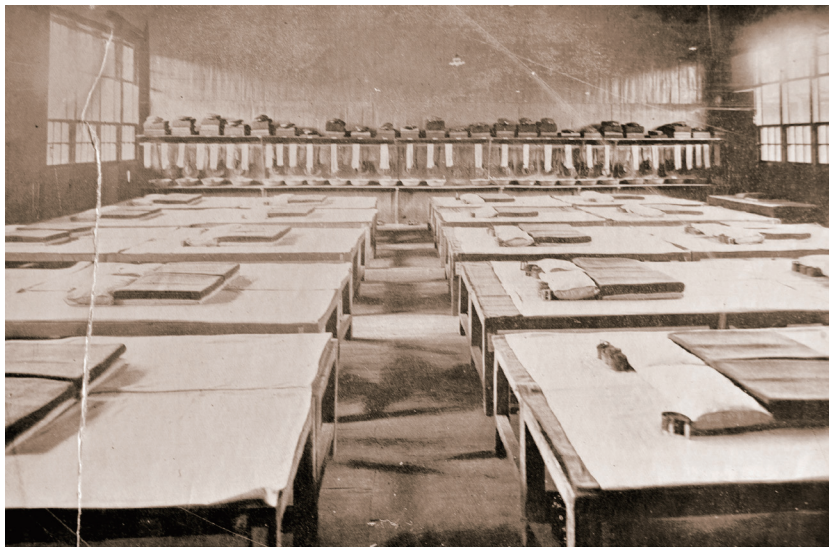
体格检查——本校对于体格检查，素极重视，一年中几乎无月无之。如官生定期健康检查，每年5月及11月各施行一次。学员生体格检查更较严格，于入伍、升学、分科、毕业时，均须受检，藉为健康之测验，缺点矫正之依据。历年来，就本校一般体格检查统计结果，体重（公斤）相当身长减去110之余数，胸围不足身长之半数约差10公分（按英美规定体重应等于身长减去100之余数，胸围应当身长之半），历年来检查甲等体格百分比：1939年9%，1940年8%，1941年6%，1942年5%，1943年7.2%，1944年3.9%，1945年3.8%。综观以上统计，体重胸围不足，是表示国人营养之不足，发育之不良，甲等体格之少，且每况愈下，乃表示国人健康程度之低落。按体检标准，甲等体格方为合格，以此推算，全国军队虽有百万之众，其合乎标准

者，不过数万人，若不力谋挽救，则建军建国之前途，何堪设想，是以全国公共卫生之推进，刻不容缓也。

研究营养——抗战以还，一般学校、军队、机关因物价高涨，薪给菲薄，均感营养不足，本校员生自不能例外，虽极力研究改善，但限于给养的规定，仍难达到营养标准，只能就可能范围内，施行各种改善方法。如编印食谱分发各队，以求营养配合之适当，改善烹调技术，以减少营养成分之消耗，藉资补救。

环境卫生——吾人不能离开环境，故环境卫生对于吾人之健康，居于重要地位。本校有鉴于此，首先成立环境卫生队，以司全校清洁；设置环境卫生示范场，以资观摩。并实行井水消毒，成立卫生考核委员会，使全校官生兵，均知卫生之重要，共同努力实行卫生要则，以养成卫生习惯。

三、医疗状况：本校在南京时，医疗设备颇为完善。迨抗战后西迁途中，逐渐损失，后经努力补充，始恢复旧观。在抗战期间，人才困难，遂与三大学（中央、齐鲁、华西协合）联合医院及公立医院，作技术上之合作，罗致本市各科专家充任本校军医院各科主任。扩充化验室，添置爱克斯光机，设置力求完善。统计去岁一年间，住院人数为



/ 黄埔军校学生寝室。



/ 黄埔军校学生食堂。

1277人，患病率为70.2%，死亡率为3.46%，较其他部队，减低约倍数。此中可注意者为肺结核病，住院及死亡者，均以该病为最多数，蓉市各大学之统计，学生患肺病者占5%，此固受战事之影响，而吾国公共卫生事业之落后，国民卫生知识之缺乏，是其主因，故防痨运动，亦为不可缓

之事实。

以上所述，不过荦荦大者，今日略予说明，以表示过去卫生工作所得到的成果，及今后应努力之方针。并以唤起国人，对公共卫生事业之注意，以臻国民于健康之境域，则建军建国之前途，方有望焉！英国有谚云：“三等国民决不能建设一等强国”，

国人其勉乎哉!

军队营养问题

白鑫的文章中也谈及成都时期本校军队营养问题：

军人抵御外侮，为民族谋生存，为国家保安全，其使命至重，其责任至大，尤其是现代军人，在战争愈演愈酷之际，非有坚苦卓绝之精神，铜筋铁骨之体格，弗能胜此重任。

况其平时受严格之训练，习特别之技术，其工作又较胜于常人二倍；在此种生活中，军队健康，实居至上。欲得到确实的健康，必须得到佳良的营养。如影之随形，无或差异，又况一般营养佳良之士兵，对于疾病之抵抗力增强，而感染之机会亦少。因士兵体力之增强与否，亦视受疾病之侵袭与否为反比例。换言之，欲防疾病之侵袭，必须体格强健，欲求体格强健，必须营养佳良，故军队营养的研讨，应占今日国防科学极重要之一页。

一、军队营养

挽近欧美各国对于士兵营养，均极重视，往往召集若干专家研讨其究竟，而采有效的标准。只有质量上之改进，绝无财力上商酌，故其士兵精神体力，均超越我国。……抗战期间，因物价高涨，营养问题更趋严重，食物之质量与标准数相差甚远，

表一：过去中国军队与各国军队营养比较

国名	蛋白质(克)	脂肪(克)	碳水化合物(克)	热量(卡)
中国	72	12	550	2469
美国	127	121	860	3615
英国	130	136	500	3800
瑞士	112	124	675	3700
日本	100	60	600	2980

表二

军队	蛋白质(克)	脂肪(克)	碳水化合物(克)	总热量(卡)
中国军队改良前	79	17.7	613	3090
中国军队改良后	91	30	659	3400
美国军队	127	121	860	3814
英国军队	130	130	500	3800
日本军队	100	120	600	2980

中间虽经改进，然以限于物价，仍未达到最合理的境域。

观表一可知我国士兵营养值之低落矣。

1939年11月，本校军医处与中央大学合作，请李廷安博士等就第25补训处作士兵营养之研究，得其成果如表二。

改良前，每兵每月所得之总热量，平均尚不足3100卡，改良后，已增至3400卡左右，虽较英美士兵所得之热量低，但已比日本士兵所得热量高，因得决议，每兵每日不能少于下列数量：碳水化合物660克，脂肪30克，蛋白质80克，磷1.3克，钙0.64克，铁0.01克，总热量3400卡。此犹限于经济而作最低之要求，但当时各军队已不能达到此要求矣。

再就本校学生过去及现在营养的研究报告如下：

本校学生过去一般营养，均

感不良，尤于1940年至1941年间为甚，兹就18期2总队学生由入伍至毕业，作一检讨，该队1942年3月入伍，满3个月后调查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257人内，自觉头晕眼花者107人，视力减退者55人，夜间视力减退者81人，患干眼病者12人，乏力者11人，膝盖链反射减退者6人，贫血者25人。诱发肺结核者86人，占全总队6%。体重颇差者563人，占全总队40%。

1942年6月，副食费增加，又因全校普及种菜，至1943年春季检查，每人平均增加体重5公斤。乃蓉市场物价逐渐增高，因之给养又感不足，该总队毕业时，体重减轻者，复达二分之一。此种现象，是不应有的。在此期间（1943年10月）所得营养值为蛋白质64克，脂肪45克，碳水化合物526克，盐类116克，维生素

陸軍軍官學校給養質量標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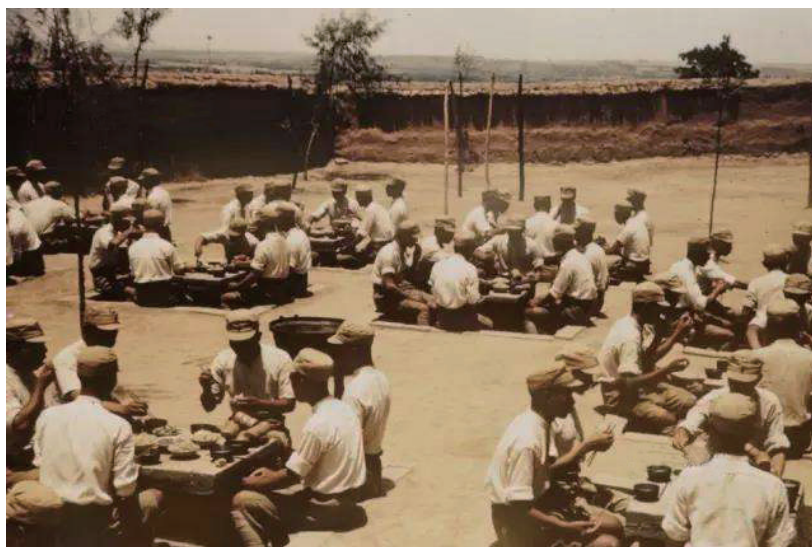
食品名稱及每日用量(公分類)	每日用量所食重要成分	蛋白質 公 分	炭水化 物 公 分	脂 肪 公 分	熱 量 卡	無 機 鹽 類			維 生 素						
						鈣 公 分	磷 公 分	鐵 公 分	甲	己	庚	乙	丙	丁	戊
粗 米 (24兩 750)		54.75	640.25	2.99	2310.00	0.225	2.325	0.0135		十	卅	十	卅		十
花 生 核 (1兩 31.25)		8.06	7.75	12.09	172.00	0.073	0.209	0.0021	十	十	十	卅		十	十
精 油 (0.5兩 28.13)		—	—	28.13	253.17	—	—	—	十					卅	
黃 豆 (2兩 62.50)		24.50	15.88	10.88	259.38	0.178	0.419	0.0042	十	十	十	卅	〇	十	十
猪 肉 (1兩 37.25)		5.44	—	10.13	111.38	0.003	0.053	0.0003	十	卅	卅	卅	〇		卅
蔬 菜 (10兩 312.50)		3.44	7.81	0.31	47.00	0.164	0.106	0.046	卅	卅	卅	十	卅		
合 計		96.19	671.69	64.56	3454	0.643	3.111	0.0252	十	十	卅	卅	卅	十	十

/ 陆军军官学校给养质量标准表。

极少数，总热量为2400卡，比较各国标准瞠乎后矣。至1945年3月，副食费增为2400元，至8月副食费又增为3600元，间配发数种食物，其总热量亦仅能维持3400卡，其原因如下：

蛋白质——照我国士兵平均体重为57公斤，所需蛋白质为86克，原膳食中为70克上下已嫌不足，动物性蛋白质仅占0.79%，量既不足，其质又相差远甚。

脂肪及碳水化合物——脂肪及碳水化合物均为供热之主要素源，原膳食中，碳水化合物有时不能超过600克，此总热量之所以低减也。现在本校副食，均逐渐改发实物，按质量的规定而不受经济的限制，其规定每人每日米24两，黄豆2两，花生米1两，油9钱，猪肉1两，素菜10



/ 抗战时期，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露天食堂。

两，盐5钱，复经本校军医处以标准计算分配，可得总热量如上表。

二、今后军队营养的建议

我国抗战八年，物价飞涨，因之军队营养亦每况愈下，影响健康至深且巨，现在副食费，虽

增为3600元，但大部均尚未能普发现品，除大量之碳水化合物，其他蛋白质及脂肪，多取自植物中，而缺少动物性蛋白质及脂肪，对于健康殊未能达到饱和点，吾人应就其缺点，拟具补救办法，分述如下：



/ 抗战时期,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学生寝室。

(一) 主要缺点:

1. 总发热量不足,不能维持体力之需要。

2. 脂肪不足,蛋白质亦缺乏而恶劣,不能维持新陈代谢。

3. 烹饪法不良,致营养素或受损失,或遭遗弃。

(二) 补救办法:

1. 按部颁标准,一律供给现品。

2. 采用粗米粗面,因米皮及麦麸富于维生素。

3. 多食杂粮,各种杂粮多富于维生素,更可改正因食米面所引起各种不良之病症。



/ 抗战时期,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露天食堂食物。

4. 多食黄豆及其制品,黄豆及其制品,富于蛋白质,如能多食,可补救吾人膳食中蛋白质之不足。



/ 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之学生食堂。

5. 多食动物性蛋白质，动物蛋白质多较植物者为高，故荤食优于素食，在经济可能范围内，希望肉类增加为3两，并每日食鸡蛋一枚，以补蛋白质之生理价值。

6. 增加蔬菜，原规定蔬菜每日10两，似嫌不足，应酌增为16两。

7. 扩充食物范围，如血、骨、肉皮、豆渣等，可补救素食不良之营养。

8. 注意合理烹饪方法。

(1) 焖锅煮饭，米汤不致倾弃，米内之各种维生素，亦可保持于饭内。

(2) 洗菜时应先洗后切，并应尽量利用外层叶菜，以免失去维生素及矿物质。

(3) 作蔬菜时，熟度宜高，时间宜短，并应在可能范围内，以炒法代替熬煮，如事实上非煮不可，亦应先将水煮沸后，再将蔬菜加入。

(4) 煮菜不应弃汤，食菜不应弃渣，以免维生素及矿物质之消耗。

(5) 作蔬菜时，绝对不宜用碱，以免维生素之损坏，亦不可用铜锅，否则两种维生素易于损失。

三、结论

我国军队生活程度，过于低微，不但膳食过于单纯，且几同素食；故其健康不如欧美军队之荤食者，然限于经济，故只能作补救之方法。现在规定每日黄豆2两（若能将黄豆代替米量至四分之一更佳），花生米1两，肉1两，菜油9钱，菜10两，若配合得法，亦能维持总热量至3400卡以上。总之，改良军队之膳食，粗米面固佳，但不能用霉坏及掺沙石者；多用豆类，增加肉类及蛋类，以改良蛋白质；增加蔬菜，以增加各种盐类及维生素；改良烹饪法，以保持膳食中维生素之功用。

保山疫情一则

1942年5月，滇西保山一带发生霍乱疫情，由于军队及时采取防治措施，使疫情得到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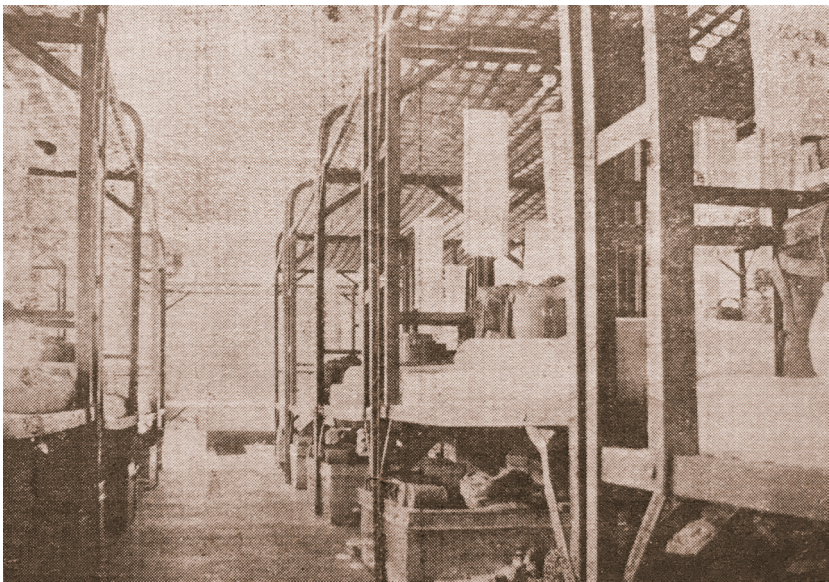
原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埔1期生宋希濂回忆：

1942年5月，入缅军的溃退和日机的滥肆轰炸，给滇西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而热带病‘虎列拉’（霍乱的旧称）的传入，更给滇西人民加上可怕的灾难。保山一带村庄的居民在6、7两月里，死于这个疫症的有1000多人。有的全家死亡，有些村子里一两天之间死了60余人，没有棺材，只好用席子包裹掩埋。我

和当时到了保山的李根源老先生，立即采取了措施。那时军队全部都注射了防疫针，感染情形不严重，当命令部队在所有的村庄里，为居民进行环境的扫除和隔离工作，派出大部分军医人员为居民注射防疫针。由于人员和药品的不足，我和李根源分别向昆明的一些医疗机构发出紧急呼吁，先后得到了帮助。这样到7月中旬，这个疫症才没有继续发展。

原11集团军总司令部军医处二等正军医娄秉文回忆：

抗日战争爆发，我考入陆军军医学校34期，1940年初毕业，分发成都中央军校军医院服务，1942年调11集团军总司令部军医处任三等正军医。保山发生严重疫情时，宋希濂总司令直接命令军医处想办法救治，我当面向宋总司令建议，后方无药可援，只有到前方想办法。当时，有一批药品等物资就被阻截在怒江东岸运输车辆上，但那里被西岸的日军炮火控制，去拿药品好比火中取栗。宋总司令说：‘行，我派特战队，药你负责去取回，战斗你服从特战队，你指挥他们搬运药品。我派参谋负责协调沿路交通，一定要拿回药，其他的就是黄金也不要。’我们在一个有战斗经验的黄姓上校（广东人）的率领下，会同司令部作战参谋杨



/ 南京中央军校学生寝室。



/ 南京中央军校工字食堂内景。

肇骧及20名特战队员一起，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开着车，不开灯，摸黑前行。当慢慢爬上一个山坡时，巨大的引擎声引来了日军炮弹，几发炮弹就在身边爆炸。‘冲！’一声令下，汽车加速，冲过了危险区。沿路都是被击毁的车辆，我下车爬到有物资的车上

去找药，我在车上发现一大批叫‘大健凰’的消炎药，能治疗传染病，就作上记号让特战队员搬走，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次运回的‘大健凰’药品，有效遏制了霍乱传染病的传播，医治了不少患病的军人和居民。不久，我被记功晋升为二等正军医。■



1926年3月24日， 李济深前来黄埔军校参观

□ 贾晓明

1926年3月24日，李济深前来黄埔军校参观。李济深先生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教练部主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第4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共全面合作共同抗战，反对投降分裂，为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关于李济深和黄埔军校的研究，本刊已有文章发表，不再赘述，这里仅选李济深从政生涯中的几个重要片段加以归纳整理成文，呈现给读者。

主持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和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逃到了香港，酝酿筹组新的

政治团体。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策动了所谓“自治”运动。为挽救民族危亡，李济深感到，必须加快建立新的政治团体。此举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中共党员潘汉年、宣侠父等人先后来到香港活动，与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建立了联系。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研究，1935年7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总部机关设在香港。参加大同盟的除原19路军中上层人物外，还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被选举为主席（李济深回广西老家时，由蔡廷锴、蒋光鼐代理主席职务）。同盟的建立，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美联社、路透社等媒体以及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都作了报道。

1935年12月，同盟发表了《成立宣言》，宣布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并提出“对日作战、收复失地”等具体行动纲领。

1936年1月，李济深联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又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南京蒋介石集团对外妥协、对内独裁的政策，指出同盟把抗日和反蒋作为“不可分离的任务”，还提出了“联共”主张，认为“在抗日共同目标下，除积极的亲日派外，任何党派本同盟均可携手”。

在李济深的领导下，同盟采取“宣传工作与群众运动采取公开路线”，以《大众日报》为机关报，后又创办了理论性月刊《民族阵线》，出版了小型半月刊《战线》和《在抗战旗帜之下》。同盟报刊在香港和海外公开出售，同时还寄给全国各地图书馆和各大学的学生团体，以扩大影响。大同盟还在上海设立了一个通讯社，负责内地和香港的联络工作。

同盟极注重征集盟员发展组织的工作。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同盟在国民党军政人员、华侨、文化教育界人士中积极开展活动，其成员迅速扩大，组织活动遍及国内外，在广东、广西、上海等地都建立了分

支机构，并保持与中共以及其他抗日救国团体的良好关系。

1936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为开展统战工作，中共中央派人来到广西，与李济深和大同盟建立了密切联系。在双方交流中，李济深多次表示，“很乐意同中共合作，通过统战关系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积极回应。其间，毛泽东在给李济深的一封信中提到“逼蒋抗日”及“反日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构想深深吸引了李济深，通过认真思考，他决定接受这个建议。为此，李济深一面和中共加强沟通，一面指示大同盟放弃过去坚持的反蒋抗日的口号，接受中共的方针。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电全国，反对讨伐张、杨，申明西安事变要用“政治解决”；同时致电张学良，希望他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他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希望她们共同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还给张群、吴稚晖写信，陈述要以团结抗战大业为重，避免内战。虽然李、蒋矛盾由来已久，但李济深摒弃个人恩怨，对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表示完全赞同，此举得到了同盟成员的支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方面派人向李济深和同盟主要成员介绍了中共对国内形势的看法和国共合作的主张。李济深感到此内容十分重要，指示通过《大众日报》向外界进行广泛宣传报道。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蒋介石也不得不对昔日的国民党内反对派做出和解姿态。9月21日，蒋介石特任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军事委员会参议官。为了表示团结抗战的诚意，同盟声明全力拥护抗战，对蒋介石已不作公开批评。此时，有人认为“现在环境已改变，要求一致团结抗日之目的已达”，提议解散同盟。虽然李济深认为解散同盟“等于自己解除武装”，主张暂时保留，但也表示愿意服从多数意见。10月25日，同盟最高会议决定正式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并于30日发表《解散宣言》，表示“所有力量，自当贡献政府，效力抗战”。

协同王葆真主持军事策反工作

王葆真（1880—1977），又名凤玉，字卓山，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期曾策划组织滦州起义。民国建立后，王葆真积极参加倒袁、护法运动，为维护共和做出了贡献。1924年

国共合作开始后，王葆真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参加北伐。蒋介石主政后，王葆真对蒋排斥异己、屠杀共产党人的做法深为不齿，愤而辞职，后前往广州等地，进行反蒋活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葆真在国民政府担任第五战区顾问、参政员等职，与共产党人往来频繁，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团结抗战。

1939年，为“加强对战地工作的领导，协调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3月，战地党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李济深任副主任，主持工作。为团结各方爱国力量，李济深将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安排进入战地党政委员会及其各地分会任委员。经李济深推举，王葆真被任命为总会委员和冀察分会副主任。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为调解矛盾，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在李济深的指示下，王葆真通过各种关系与八路军领导人朱德等取得联系，并率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一行30人与朱德、彭德怀等人进行会谈，更促成了朱德与卫立煌的会晤，后双方达

成了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战的协议，使晋东南两党两军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悍然挑起内战。李济深更清楚地看出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也更坚定了联合国民党内民主力量、开展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决心。他在中共的帮助下，积极开展反蒋军事策动（简称策反）工作，策动他的旧友、部下认清形势，转变立场，以各种方法起来反对内战、等待时机举行起义。李济深特派王葆真等人去进行具体联系工作。在李济深、王葆真等的不懈努力下，军事策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先后举行起义，加入人民阵营。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在香港成立，李济深任主席，王葆真任中央常委。民革成立后，加快了军事策反工作的步伐，为此成立了军事小组，由李济深兼任组长，王葆真等担任组员。5月，王葆真受李济深派遣，以军事特派员身份赴沪主持策反工作。他积极联络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很快建立上海、南京地下民革组织（王葆真任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积极开展情报搜集和宣传活动，并掌握了一批武装力量。12月，王

葆真赴香港向李济深汇报请示，但此时李济深已应中共之邀秘密北上。在和民革其他成员商议后，王葆真于1949年2月初仍回上海继续进行策反工作。

为配合解放军即将到来的渡江作战，王葆真领导的团队计划策动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军警发起武装起义。不幸被国民党特务侦悉。1949年2月，王葆真被捕。王葆真在狱中受尽折磨，伤势严重，但仍坚持斗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发动内战，祸国殃民。

王葆真被捕后，各方积极予以营救。中共方面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和谈期间逮捕民主人士，应即予释放”，要求恢复王葆真的自由。李济深托人转告李宗仁：“王葆真先生在沪被捕，当德邻兄力主和平，解决国是，并释放政治犯以取信于国人之时，尚有此违反人民意志之行动，闻之不胜愤慨，望即电知德邻兄即饬上海军政机关迅予释放。”南京一些国民党要人本着良知也为王葆真求情。迫于各方压力，上海国民党当局虽然判处王葆真死刑，但缓予执行。

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由于王葆真等人的策反工作，国民党淞沪警备副总司令兼第51军军

长刘昌义等起义，使上海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未遭重大破坏而获得解放。王葆真出狱后，于6月中旬受李济深的邀请，前往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和李济深一道参加了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葆真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民革组织，做出了贡献。

从香港登船秘密北上解放区

1948年底，李济深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结束他在香港的活动，北上前往解放区。为使李济深安全、顺利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

早在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前后，周恩来就曾通过有关方面探索顺利进行这项任务的方法和道路，特别布置了钱之光，积极探索和打通从解放区通往香港的通道。因为当时，虽然解放军在军事上连连取得胜利，但解放区对外的海上通道，仍然只有当时还在苏联红军管辖之下的大连这个唯一的港口。而且，此前苏联的船只也从来没有同香港通

航。在周恩来的关怀和钱之光
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摸
索，终于打通了从大连到香港的
航道，并迅速与香港开始了经济
贸易和人员往来的联系。

由于前两批民主人士的北上
已引起外界的注意，再加上李
济深的身份特殊，为保证他去
解放区的行动绝对安全，周恩
来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

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
有关指示，地下党驻香港工作
人员考虑到当时香港的政治情
况，从安全角度出发，整个工作
是秘密进行的。有关行动的每
个细节，都经过周密的安排。

由于李济深的特殊身份，
港英当局在其寓所的马路对面
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
员住在那里，名为保护，实则
监视。中共地下党组织经过研
究，决定在12月26日的夜间
护送李济深登上停靠在维多利
亚港内的苏朝合营货船“阿尔
丹”号，12月27日凌晨随船
离开香港。同时，对李济深的
家属也做了妥善安排。

为了转移港英当局的注意
力，1948年12月25日圣诞节
当天，李济深还特意发帖邀请
港英警方人士来家欢度圣诞，
并找了一些人作陪，摆出一副
在家安度圣诞和新年的架势，
使负责人确信李济深在近期
没有离开香港的打算。实际上，
此时李济

深的行李已经被中共地下党
成员秘密取出，存放在位于湾
仔海边的六国饭店里。

12月26日，港英当局人
员都沉浸在过节的气氛里，“
保护”人员也松懈了不少。当
天晚上7点钟左右，在李济深
的寓所里举行了宴会。李济深
家居打扮，身穿一件小夹袄，
和来宾推杯换盏。晚宴开始不
久，李济深借口去洗手间离席，
随即穿上早已挂在门口衣架
上的外套，从另一侧的楼梯悄
悄下了楼，迅速钻进一辆刚刚
停在他家门前的小轿车。小轿
车很快把李济深送到被称为“
红屋”的邓文钊（《华商报》
董事长）寓所，中共方面的
方方、潘汉年、饶彰风等早已
在此等候，同船北上的民革
要员朱蕴山等人也已到达，
何香凝和陈此生也赶来为大
家送行。

两个小时后，饶彰风借用
邓文钊的两辆轿车，将李济
深等人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
小汽船的岸边（此时，李济
深的行李已经被放置在汽船
上）。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彭泽民等民主人士也按时赶
来会合。一行人登上小汽船，
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
“阿尔丹”号货船驶去。整个
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李济深等上船后，发现章
乃器等十多位民主人士已先行

登船。考虑到当时的出港检
查，也考虑到海上航行可能
遇到国民党海军的活动，在
中共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李
济深等人都化装成坐船到东
北去做买卖的商人，每人口
袋里都装着一套货单，并把
货单背熟，“即使遇上检查
盘问也丝毫不露破绽”。为
保证李济深的绝对安全，中
共方面还选派专人随船护送。

27日晨，港口人员上船
检查，船长把李济深暂时安
顿到最底层的舱房里。不久，
检查结束，“阿尔丹”号驶
出维多利亚港，李济深等民
主人士顺利离开了香港。

12月31日晚10点，李
济深和同船的所有民主人士
包了饺子，并拿出各人携带
的食物和水果，请苏联船长
和全体船员同席聚餐，共度
除夕。席间，李济深即兴写
下一首诗以抒发感情：“同
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
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
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
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
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
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
前进！努力！努力！”

1949年1月7日，经过
10多天航行，“阿尔丹”号
顺利抵达大连。李济深等人
受到中共中央代表李富春、
张闻天，中共大连市委负责
人，和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
等人的热情迎接。■